

社論

戒嚴體制和 戒嚴體質

1950年韓戰爆發，1945年日本敗戰前後登場的全球性冷戰到達它的高峰。美國當局從援軍經援助迫使國府進行民主改革以建立「統一、自主」的中國這樣一個政策，一變而為放棄國府，對中共觀望，終於大轉變為積極支援退守台灣的國府以對抗蘇聯及中共的政策。

美國全球性抗共戰略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表現，是美國扶持日本，促使日本再武裝，建設日本戰後資本主義；是韓國之一分為二，是台灣海峽之武裝封鎖，是亞洲太平洋地區與東南亞的美國勢力範圍的建立以反制中共……。

1949年，國府頒佈全國性戒嚴。這戒嚴令一直在台灣島上執行了38年，直到今年7月15日始正式宣佈解除。這長達38年的戒嚴令，和1945年以後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升高的冷戰對立，和1950年後台灣與中國大陸國土分裂，當然有歷史的、政治的密切關聯。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是戰後世界冷戰、中國國土分裂這樣一個全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1951年，美國片面支持日本和各資本主義系同盟國訂立和約，結束日本在戰後無主權一戰敗國地位，以利美軍駐日的條約化、便利促成日本再武裝，促成日本編入美國在遠東的抗蘇戰略……。在美國的唆使下，戰敗國與國府訂定的金山和約中，悍然主張兩個中國論，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為造成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陰謀「法理基礎」。1950年中期之後，美國把大量軍經援助從歐洲投入台灣和中南半島，在英、法帝國主義殘存勢力不得不撤離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中南半島時，美國升高在這一地區的干預行動，結成東南亞公約組織，從阿留申群島、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和泰國、越南，結成太平洋防衛綫，包圍中國大陸和亞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體系。

在這樣的世界冷戰背景下，中國在內戰和外力干預下，被迫造成國土和民族的分裂。反共、防共的「安全」體系，在國際上有各種協防和安全保障條約，在島內，則是以戒嚴令為主軸的國家安全體制。

在戒嚴令下，入出境有嚴格管制，海岸有軍方管制，山地有各種禁制，非軍人得受軍法審判，人身自由受到大量限制，集會結社自由、言論、思想的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工人的團結權、爭議權被取消……。

然而，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却恰好在這「世界反共軍事基地」的政一經條件中，因大量美國軍經援助，奠定了60年代加工出口經濟的「冷戰—國家分裂—戒嚴體制—對世界體系依附」下的快速發展。

這「戒嚴下的發展」，至少付出了這些代價——資本的附庸化，使獨立的民族資本無從發展。台灣資本的非官僚化或買辦化無以壯大。

- 民族資本之脆弱，使民族主義，特別在「冷戰—國家分裂」下的資本主義條件下，難以發展，而發生主張國家永久分裂的非民族主義或反民族主義的思惟。
- 「冷戰—國家分裂」下發展的台灣資產階級，因為在50—60年代受到美國開發總署、國府財經官僚的哺育而長大，沒有革新、獨立的個性。
- 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文化（由國際行銷管理、商品性大眾文化促成）的破壞。人的破壞……
- 國家、民族的長久分離，使同民族間視同異族，互相猜忌、敵視和蔑視，使全民族的智慧、創意、和平與團結長期遭到破壞。
- 為了服從「自由陣營」，即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邏輯，台灣的社會發展、政治制度、意識型態、民族發展、學術和文化，受到制度性的歪曲。

這些戒嚴體制下所滋生的戒嚴體質，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主體性的、盲目的反共，並且從這非主體性的反共熱情、延長為反中國，甚至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嚴重歧視；是對美日帝國主義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圈構造非但沒有批判，反而亟欲成為這構造的一員；是對國際霸權干涉中國內政，欲使台灣與中國永久分裂的陰謀非但不加撻伐，反而公開呼籲國際霸權侵犯中國，使台灣與中國長期分離；是公開反對中國民族主義，在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提倡具有國際背景的「台灣化」和「台灣主義」……

研究戰後冷戰歷史的學者，把一九四五年到韓戰結束的一九五三年定為「第一次冷戰」。一九五三年到六〇年代後半，規定為時而冷戰、時而談判的過渡性的、兩極間「不確定的對立」時代。六〇年代後半到七〇年代中期，是兩大陣營和解、談判的「底蘊」期。七〇年代末，以美國雷根總統當選為象徵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意識型態的右翼回潮後，被定性為「第二次冷戰」。

但是，在這一世界強權、地緣政治的重組過程中，尤其一九七一年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廢除日本與國府間的和平條約；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中共建交，自然廢除「中美協防條約」後，至少在理論上，台灣已經被世界體系的全球反共冷戰大戰略所拋棄。但是，國府却依然以五〇年第一次冷戰的「反共—國土、民族分裂—冷戰」安全體系，繼續以戒嚴令支配台灣。國府這「時代錯置」的冷戰的心智與政治的延長，是把冷戰體制所衍生的冷戰體質固定化。而解嚴之後，繼續以「國安法」維持台灣的一切冷戰結構與冷戰體質，從而維持反共、國土分裂的基本架構。

在長達38年的台灣戒嚴體制下，觀察執政的國民黨與新近成立的在野黨間之體質，可以發現兩者間有驚人的雷同。這客觀呈現的「戒嚴體制」的雷同，說明了兩者間之階級代表性及在同一個「冷戰—國家／民族分裂」結構下，社會階級基礎的同一性。

這樣的分析，或者可以初步解釋某些人和宗派近年來的「自決論」和「獨立論」的真正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認真、細緻、誠懇、嚴肅地研究「冷戰—國家分裂」結構下戰後的台灣歷史、文化史、文學史、資本主義發展史以及民族史，應該是今後清談無根地談論著歐美進口的進步的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們要逐漸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吧！

海峽

雜誌

The Channel

第三期

民進黨何去何從？——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
 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
 台灣民衆黨——從成立、分裂到解散
 火燒島人權宣言
 中共要封鎖台灣？
 台灣與南韓的比較
 世界體系、階級與國家
 ——詹明信與伊戈頓
 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雙壁

民衆黨創黨六十周年紀念特輯：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台灣民衆黨創黨六十周年紀念

主辦： 晨潮聯誼會 協辦： 人間雜誌 前方雜誌 海峽雜誌 遠望雜誌



發行人 / 盧思岳

社務顧問 / 王津平 王杏慶 王義雄 李榮武
周合源 林孝信 林宗男 洪銘水
許登源 許達然 莫宗堅 陳映真
張曉春 黃溪南 蘇慶黎 寧明杰
楊祖瑤 蔡仁堅 葉芸芸

社長 / 王拓

總編輯 / 杜崇仁

編輯委員 / 本刊編委會

主編 / 林新莊

執行編輯 / 彭知度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11 號 10 樓之 1

電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新台幣900元 · 半年450元

國外：空運全年歐美地區美金60元

亞太地區美金51元

港澳地區美金45元

海外通訊訂閱處：China Tide Association,

P.O.Box 1724 New City,

N.Y 10956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Tide Association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登誌字第伍捌伍伍號

經銷處	台北	聯宏書報社	(02)5620282
	基隆	宏恩書報社	(032)316843
	內壢	國華圖書供應局	(03)4553456
	中壢	志昇書店	(03)4251897
	新竹	文強堂	(035)253101
	苗栗	英華書局	(037)320810
	台中	全元書報社	(04)2700617
	嘉義	嘉聯圖書供應社	(05)2354993
	台南	永茂書報社	(06)2642655
	高雄	麗志書報社	(07)3849410
	屏東	環球書局	(08)7323071
	宜蘭	民生書店	(039)323765
	花蓮	花蓮文具店	(038)322941
	台東	徐氏圖書文具行	(089)322267

目錄

海峽(76年 8 月號)

〈社 論〉

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

〈專 輯〉

台灣民衆黨 創黨六十周年紀念

爲什麼我們要紀念台灣民衆黨？

- 夏聯會 4
- 記「民衆黨六十周年紀念活動」
- 本 刊 6
- 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
- 王曉波 11
- 抗日運動的社會·經濟基礎
- 蕭友山 / 平民譯 17
- 台灣民衆黨——從成立、分裂到解散
- 蕭友山 / 平民譯 19
- 那一個是蔣渭水真正的遺囑？
- 周穎君 28

-
- 《海峽論壇》 民進黨何去何從？——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 ●張大林31
- 《人權專輯》 火燒情更熱
——記六月下旬火燒島政治大絕食及“火燒島人權宣言”的來龍去脈 ●夏 嬰35
- 火燒島人權宣言
絕食備忘錄** ●起草人劉國基37
●劉國基38
-
- 《海外傳真》 暴力和哭泣之後的反省與團結 42
- 《世界體系》 **世界體系、階級與國家** 金會典藏
——台灣與南韓的比較分析 ●Hagen Koo / 林新莊譯44
- 《文化批判》 **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雙璧**
——詹明信與伊戈頓 ●樓亮·李克55
- 《香江話題》 九七過渡期內的台港關係
中共要封鎖台灣？ ●韋 名60
●韋 名62
- 《歷史》 **日據時期勞工運動初探** ●王宏仁64
-
- 《勞工廣場》 解嚴後的工運
——從新玻事件談起 ●張力雁75
- 這樣的勞工委員會為能為勞工謀福嗎？ ●張 望78
- 《世界思潮》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導論(上) ●Anthony Brewer / 陳宗文譯80
- 《世界之窗》 請聽，尼加拉瓜婦女解放運動者的呼聲
美國華爾街的醜聞 ●Magda Enriquez / 曾喜珠譯90
●黃 雁94
- 《文 藝》 錢，可不是白來的 ●張辛欣·桑擘95
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中) ●高 準99
- 《來函聲明》 黃武雄教授來函·游賢達道歉 110

讓海峽成爲你和朋友們 共同的精神食糧

透過海峽，你們的友情更踏實翱翔的天地更遼闊

優待本刊長期訂戶：

● 每本訂價90元，全年十二期特價900元

掛號每年另加120元

● 國外一律航空郵寄：

歐美地區 \$U.S. 55元

亞太地區 \$U.S. 51元

港澳地區 \$U.S. 47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第 1 1 3 4 1 5 1-2 號	郵局郵票
盧思岳	戶名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	郵局郵票
	住址 □□□	
	電話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	---	---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第 1 1 3 4 1 5 1-2 號	郵局郵票
盧思岳	戶名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	郵局郵票
	住址 □□□	
	電話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次	元
-----	---	---

●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請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加填明，以免誤寄。
- 二、紙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主管： 經理員： 郵政儲蓄金會 郵政儲蓄金會

主管： 經理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朋友！你關心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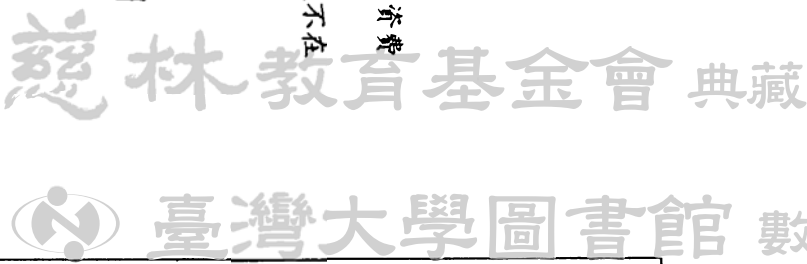
請閱讀最具前瞻性、進步性、思想性、批判性的

海峽雜誌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為親友訂閱



《海峽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 新訂戶 續訂戶 電報掛號
 從 年 月起訂閱海峽雜誌，至 年 月止。
 訂閱(贈)人(請用正確姓名)
 姓名：_____ 先生/小姐 電話：
 地址：_____ 郵區□□□□□□

通信欄
 郵寄方式： 平寄 掛號(每年加120元)
 年 齡： 25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職業： 公教 工商 金融 服務業 製造業
 建築業 自由業及專業 學生 其他
 教育程度： 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之選應以關於該次訂閱事項為限，否則應按寄另寫。



上香

墓碑就立在城市近郊
我們前去為他上香
一位日據時代的抗日英雄
所有的先輩也都來了
他們年幼時進過私塾
又被逼到公學校學日文
今天，統統用漢文寫日記
上台時，則操流利的閩南語
日記裡說，過去坐牢數十回
合起來總共是兩個寒暑
終戰後，一坐便是二十年
寒風中，在街頭演講
憶記的，總是死難的同窗
還有那響過牢房的腳鐐聲

殺戮與牢禁，雖難忘懷
却也並不那麼難以釋懷
回家後，妻子端來豬腳麵線
吃完了便出門找工作
夜夢時，偶而也哼起
那首令人哽咽的安息歌
只希望驚夢初醒
不是走向霧茫的廣場……

倒是墓碑就立在近郊
最老的先輩都前去獻花
身後却不見身著白色港衫
凝視南方晴朗天空的青年
想起這些，不免感到悲哀
是那麼巨大，似乎，在夢中
遑遙的大陸又退得更遠了

87.7

文·鍾喬 圖·蔡明德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仄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

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

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

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

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劃撥 8 折

台北，台北！

王拓 / 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

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

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鍊，

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

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

鬭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劃撥 8 折

郵政劃撥 0784418~8王拓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爲什麼我們要紀念 台灣民衆黨？

■夏潮聯誼會

六十年前，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在台灣歷史上，第一個代表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主政黨—台灣民衆黨，正式誕生，在殖民統治的高壓下，他們堅決宣稱：『本黨之目的在於提高台灣人民之政治的地位，安固其經濟的基礎，改善其社會的生活』，並且，『如有阻碍我等政治地位之向上，威脅我經濟的生活，阻止我社會之進步，則我等不辭以合法的手段與之周旋到底。』終至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遭受「結社禁止命令」，歷時三年六個月。

民族運動亦是階級運動

台灣民衆黨的性質簡言之，乃是在殖民地以上以農工階級爲中心的民族運動的政黨。誠如民衆黨領導人蔣渭水所言：『本黨的基礎，是要建設在民衆，民衆的主要成份是農工階級，所以本黨以農工階級爲中心勢力』，並且，『本黨要集中勢力，須注重民生問題，實行階級運動』。其實在殖民地上的鬥爭，民族運動亦階級運動，階級運動亦民族運動。所以民衆黨是一個民族運動的政黨，也是一個階級運動的政黨。

台灣民衆黨在三年六個月的奮鬥過程中，其意義厥爲三端：

一、反帝的民族主義：亦即『反對帝國主義

的政略及政策。』『反對對華干涉政策。』『反對殺戮民衆以肥資本家之帝國主義政策。』『反對一切阻害蕃人種族的自由發展之措施。』『撤廢一切民族的差別待遇。』並且，台灣民衆黨領導人蔣渭水先生在「同化」政策下，不避統治民族「非國民」的壓迫，昂然的在統治民族的法庭上宣稱：『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實。』勇敢而堅決的在異民族統治下捍衛了台灣人的民族真理和民族尊嚴。

二、反專制的民主主義：其爲『反對總督府專制政治。』『反對總督府評議會。』『獲得民衆自主之地方自治制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絕對自由。』『壓迫殖民地民衆之諸惡法要即時撤廢。』『剝奪總督之法院監督權，主張司法獨立。』『獲得自主的政治機關，十八歲以上男女皆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勇敢而堅決的爲爭取總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奮鬥。

三、人道的階級運動：亦即民衆黨的三大綱領：『一、爭取勞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政治的自由。二、擁護勞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日常利益。三、努力擴大勞



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組織。』勇敢而堅決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工農民和無產市民無私的奮鬥。

雖然，台灣民衆黨的奮鬥功敗垂成，但是「不以成敗論英雄」，台灣民衆黨捍衛台灣民族真理和尊嚴的奮鬥，爭取台灣人民民主權利的奮鬥，和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台灣勞動無產大眾爭自由的鬥爭，將永遠成爲後代台灣子弟的楷模和典範，而永垂不朽。

蔣渭水先生雖不幸以四十歲的英年逝世於一九三一年的八月五日，但是，台灣民衆黨的同志，不懈其志，直至台灣光復。但在台灣光復後，不懈其志的台灣民衆黨同志和蔣渭水先生的後人，竟慘遭超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殘殺的殘殺，監禁的監禁，流亡的流亡，甚至將渭水先生的遺著，在日據時代遭查禁，光復後也遭查禁。唯獨蔣先生的一塊靈牌在忠烈祠中寂寞而諷刺的，在每年的節日裡，接受迫害他同志和後人的台灣新的統治者鞠躬如也。

繼承蔣渭水未竟志業

以光復後的台灣而論，自「中美協防條約」後，台灣在政治上形同美國的保護國；與美國斷交後，竟依賴一個美國地方法院的「台灣關係法案」，以維持其政治地位；又與作爲美國的自治領地何異？七十年代後，台灣經濟又成爲日本的「經濟殖民地」；台灣婦女更成爲

「經濟動物」的日本男人的買春對象。四十年來，全島充滿著崇洋媚外之風，台灣人的民族尊嚴又何在？甚至於在國民黨的隔離政策和反華教育下，造成台灣青年的一代以同文同種的大陸和大陸同胞為「匪區」為「共匪」，以致形成民族認同的「異化」。

以民主主義而論，光復後的改變，只不過是將「六三法案」變成了「戒嚴令」，「法三號」變成了「臨時條款」，「匪徒刑罰令」變成了「懲治叛亂條例」，將「警察治安法」變成了「國家安全法」，將日本人異民族的專制變成了國民黨同民族的專制而已，但是，其專制的本質則一。光復後的台灣人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民主權利，台灣人民要求「出頭天」的民主意願並未達成。

以階級運動而言，光復後，一紙「戒嚴令」就剝奪了勞工階級唯一的自衛武器—罷工。至今台灣勞工除了國民黨操縱的「御用工會」外，並無屬於勞工自己的獨立工會，以至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勞工階級的福利竟被忽視。在社會良心家和學者專家的呼籲下，台灣也有了一個七折八扣的「勞動基準法」，但又因國民黨偏袒資方的政策，以致窒礙難行。又在新殖民主義的經濟政策下，引進污染工廠，引進公害，破壞了勞工階級的勞動環境，也破壞了全島的生態環境，而威脅到台灣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所以，蔣渭水先生和台灣民衆黨的志業並未實現，今天我們要紀念台灣民衆黨建黨六十周年，是紀念台灣民衆黨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勇敢而堅定的鬥爭精神，也是表示台灣子弟將繼承蔣渭水先生和台灣民衆黨未竟之志業，而繼續奮鬥的決心！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記「民衆黨六十周年紀念活動」

■本社

今年六月初，「夏潮聯誼會」即計劃要辦「台灣民衆黨六十週年紀念會」。及至六月中旬，「夏聯會」預訂自立晚報的廣告版後，欲邀請民進黨立委康寧祥爲紀念會演講人時，始知民進黨亦有意舉辦，於是雙方口頭同意合辦，康寧祥同意「夏聯會」先登廣告，迨其向民進黨中常會提出合辦之議通過後再登合辦的廣告。6月28日「夏聯會」欲舉辦「民衆黨六十週年的紀念會」的廣告在自立晚報登出。6月29日下午，「夏聯會」會長王拓與主任秘書盧思岳等人至立法院與康寧祥、尤清洽談合辦事宜，康寧祥仍主張合辦，但尤清認爲如與「夏聯會」合辦；恐遭民進黨內部批判，合辦之議遂作罷，改爲各自舉辦，互相支援，即王曉波參加民進黨7月5日於老松國小舉辦的座談會而康寧祥參加7月10日「夏聯會」舉辦的演講會。

爲紀念台灣民衆黨創黨六十周年，由「夏潮聯誼會」主辦，「人間」、「海峽」、「前方」、「遠望」四雜誌協辦的一系列活動，在七月九日上午至台灣民衆黨領導人蔣渭水先生墳墓上香致敬之後，又於十日晚上在台北市金

華國中大禮堂舉辦了一場紀念大會，吸引了約五、六千民衆的參加，全場爆滿，操場上也聚集了許多民衆聆聽。

人間劇團演出報告劇

這場紀念大會由「夏潮聯誼會」副會長黃溪南及「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王曉波聯合主持。簡短的開場白之後，燈光全暗，在舞台上揭開一齣由人間劇團演出的報告劇——台灣民衆黨的歷史證言。該劇以幻燈片配合旁白介紹台灣民衆黨的黨綱、黨旗及成立至結束的經過，中間並演出短劇——臨床講義，原文爲蔣渭水先生所著，主要內容是爲日據下的台灣把脈、診斷、開藥方。整齣報告劇中，並兩度由趙天福先生配合肢體語言用閩南語朗誦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宣傳歌曲和蔣渭水先生的遺囑。結束前，夏聯會的成員約二、三十名上台扮演臨時演員，在漸亮的聚光燈中由舞台後慢慢走出，齊聲朗誦蔣渭水先生的遺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燈光由暗而亮，聲音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低沉而高昂；台下觀衆也受到感染，逐漸出聲應和，滙聚成一股巨大的聲浪



• 台灣民衆黨六十週年紀念大會現場

。最後，台灣民衆黨的黨旗由觀眾後方進場，登上舞台，掀起全場的高潮；此時，坐在前排的幾位抗日老前輩眼淚早已奪眶而出了。

戲劇節目結束之後，主持人介紹八位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老前輩上台接受夏聯會年輕朋友的獻花，以表示後輩崇高的敬意，並有傳承反抗精神的意義。這些前輩包括：前台灣民衆黨秘書長兼組織部長陳其昌，前台灣農民組合同志王文明、伍金地，前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周合源、會員潘陳火，前台灣民衆黨同志陳隆發，前台灣工友協會婦女部長許月里，及九十幾歲的前台灣重義會副會長劉明。

「台灣人也是中國的主人」

獻花之後，由陳其昌先生上台致詞，他就自身的經歷，對日據時和光復後台灣人民所面臨的種種迫害做了一些比較；並對因空間的隔離與歷史的斷層所造成的台灣分離主義感到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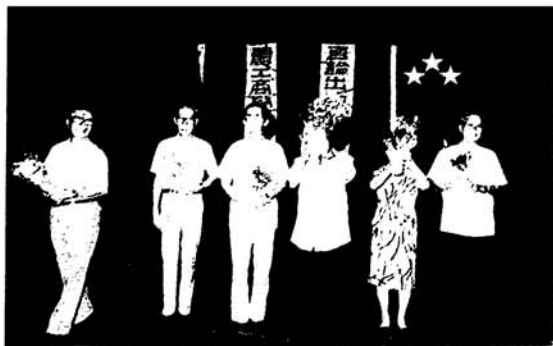
憾。最後，他認為「台灣人也是中國的主人」，並期勉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輕易拋棄了對全中國、全民族應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接著，由甫獲釋不久的前立法委員、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黃信介上台演講，主要內容是談政黨問題。他認為一個政黨，最重要的目標是如何為大多數的人民謀福利，而不是如何取得政權；也批評國民黨把整個中國的民主政治扭曲得不成模樣。

台大教授楊國樞則表示老前輩們的人格、風範值得我們這一代的人學習，他們是真正的政治家；而當前的台灣則政客充斥，真正的政治家幾乎已經變成一種稀有動物了。

輔大尹章義教授則就「台灣民衆黨組織的歷史」作一番詳細的講解，並認為該黨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而言，其實就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

隨後，由楊祖 及夏聯會合唱團演唱「安



息歌」和「坐牢算什麼」，向所有為理想犧牲、奉獻，甚至赴死的前輩們致最崇高的敬意，並藉以激勵新一代的接棒人。

演唱畢，主持人王曉波表示，楊祖瑤的丈夫林正杰被國民黨以不公平、政治化的司法先後判刑二次，刑期加起來二年二個月，現在人正在獄中服刑。想不到七月三日，國民黨再度藉「誹謗」之名加判林正杰一年的徒刑。而楊祖瑤在這種狀況下，還能強忍悲痛，到此為大家演唱，激勵大家的志氣，實在難得。主持人說畢，全場爆出熱烈的掌聲，楊祖瑤再度上台答謝。此時台下有人帶頭喊出「楊祖瑤加油」，聲音慢慢地由小而大，配合著有節奏的拍手聲，持續不斷，一直到楊祖瑤淚水盈眶地鞠躬下台為止。

向民衆黨學習反帝與支持農工的精神

接著，由夏聯會評議員王義雄立委演講。他認為台灣民衆黨主張以農工作為中心勢力，這點對現存的反對勢力有很大的啓示。台灣的農民雖然已日漸減少，然而勞工在人口中的比例却已突破百分之五十（含眷屬及一般靠薪資維生者）。四十年來，國民黨為了凝聚資本，穩定其缺乏民意基礎的統治，勾結本國和外國的資本家來剝削台灣的勞工；因此，台灣的反對黨要能夠凝聚廣大勞工的力量，得到他們的認同，才有足夠的資源來對抗國民黨，這正是台灣民衆黨給我們的最大啓示。

夏聯會評議員林宗男省議員遠從台中霧峯趕來參加盛會，他表示從歷史和語言上來觀察，可知台灣人是中華民族中優秀的一支，因此我們更不能忘記：必須負起整個歷史責任和光大全民族的使命。



隨後，夏聯會評議員、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先生上台致詞。為了表示尊重少數不懂閩南語的觀眾，他首先用普通話對他所要講的內容做一概略的介紹，才開始用閩南語演講。陳映真演講的主題是「向台灣民衆黨的歷史學習」，他認為我們這一代該向民衆黨學習的主要有下列五點：一、民衆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所高舉的中華民族主義。這一點在新帝國主義時期，尤其給今天的民主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啓發。



● 夏聯會會員高舉台灣民眾黨黨旗，齊呼“同胞須團結，團結具有力”

三、民眾黨抗議日本當局用鴉片毒化台灣人民的政策，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終於迫使日本政府採取漸進的方法廢止了鴉片在台灣的公賣。這一點對於遭受外國輸入的公害、污染、環境破壞中的台灣，實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和啟發。

三在一九二八年，日本人為建體育場，預備毀去三萬座我們祖先的墳墓，台灣民眾黨會率台南市民反對。最後終於迫使日本當局退讓

，停止建造體育場。這件事的意義在於高舉自己民族的傳統，保存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價值，這一點也值得今天的民主運動做為重要的參考。

四、民眾黨公開提出「以農工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這種對於底層民眾的關懷，是今天的民主運動值得學習的一點。

五、在一九三〇年霧社事件時，日本帝國主義當局使用毒氣、毒瓦斯攻打山地少數民族。



• 6月9日，向將渭水上香致敬

民衆黨公開向國際機構抗議這種違反人道的做法。民衆黨把少數民族的鬥爭看成是自己的鬥爭，這種寬闊的胸襟也應該成爲今天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啓示。

做個有志氣的台灣人

陳映真講畢，康寧祥立委接著上台演說。他表示，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才產生了一個民衆黨；國民黨統治台灣四十多年，台灣社會的力量才培養出一個民進黨，所以他認爲大家要珍惜台灣人所凝聚的心血，全力支持民進黨，使它有一天變成台灣的執政黨，真正爲台灣人而奮鬥。

隨後，蔣渭水先生的女兒蔣碧玉女士上台致詞。她對主辦單位「夏潮聯誼會」表示最大的感謝，並認爲蔣渭水先生和台灣民衆黨諸前輩爲台灣所做的犧牲和貢獻終於再次受到肯定。

最後，由本次盛會的主人——「夏潮聯誼會」會長王拓致詞。王拓表示，夏聯會主辦這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有二點：

一、將被國民黨所掩蓋、所歪曲的歷史翻轉過來，不但要還給抗日前輩們一個歷史的、公道的交代，更要給台灣人民一個公道的交代。

二、現在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很多人忘却過去的歷史，不懂得尊重我們過去的歷史，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爲有許多事不斷地重覆發生，所以讀歷史才有其意義；因此，希望舉辦這次活動，能給當前的反對運動相當的啓發。

最後，王拓希望大家繼承前輩的香火，負起歷史使命，做個「有志氣的台灣人」，爲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謀取最大的幸福。

望著舞台上懸掛的六幅黃色布條，夏聯會一個工作人員感嘆地說：「只有一個字寫錯了，總督府的『督』。」記者一下子悟不過來，於是他又補了一句：「六十年來，台灣人民所面對的困境和基本要求竟然一點也沒改變！」仔細一看，那六幅布條的內容全部摘自台灣民衆黨當年的主張或口號，內容依序排列是：

- 反對帝國主義
- 反對對華干涉政策
- 反對總督府專制政治
-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 農工商學聯合起來
- 勞動階級覺醒吧！

這些六十年前台灣人民的泣血呼喚，實在值得活在歷史斷層下的新一代沉思再三。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 合與分

■王曉波

爾璇秘書長鈞鑒：

承蒙貴黨中常委康寧祥先生邀請，參加七月五日「紀念民衆黨成立六十週年座談會」，並面交講稿《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

茲見貴黨黨報《民進報》（七月二十三日）已將講稿發表，亦甚感謝，惟未經本人同意，原稿竟遭刪節拼湊，而與本人對台灣歷史之理解有所出入。為嚴肅學術之誠實，本人除將該講稿另行發表外，特據「出版法」第十五條，煩請鈞座能將此函刊載於次期之《民進報》。不情之請，還請見諒。 順祝
暑祺

王曉波 啓
1987年7月20日

祖國派與台灣派

日據時期，活躍在台灣歷史舞台上的政治人物，根據不同的意識型態和階級認同，大致可分為四派，即「御用派」、「台灣派」、「祖國派」、「無產派」。

除「御用派」無條件的降伏於日本殖民統

治外，其他三派都是認同漢民族而與居統治民族的日本有一定的對抗關係，雖有程度上的激進和溫和之別，但都是屬於抗日陣營的。

或以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來區分，「台灣派」和「祖國派」被視為民族運動，「無產派」被視為階級運動。

有關「御用派」、「台灣派」和「祖國派」，光復後，蔡培火曾經指出：『所謂御用派就是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與力量失了信心，而死心塌地地順服異族日本政府的台灣人，無庸說就是與日本政府一樣，主張同化于日本。』反對日本同化的台灣人中，又分為兩派：即一派為「祖國派」，『對於民族文化有信心，但是在力量上，以為在台灣絕對不能與日本相抗衡，而將其希望放在祖國的力量上面。』另一派為「台灣派」，『這派的台灣人絕對多數，當時台灣的人口號稱三百五十萬，這許多人，必須生於斯死於斯，無論如何，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有極大的信心，對台灣的一切都熱烈地愛護，只要在台灣能得維持固有文化與生活，他們無論如何困難，如何犧牲，都是悉力以赴，絕不退縮。』

另外，在日據時代列入機密的台灣警察沿革誌上，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份子的思想傾向曾作一分析謂：『渠等多以中國之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林少貓遺體，林少貓被殲滅後，台灣武裝抗日遭到撲滅。

觀念為中心而活動，同時依其見解之差異而異其思想與運動之傾向。』根據日本警察的調查，民族運動中也有二派，一派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為首；另一派則以林獻堂、林幼春、蔡培火、林呈祿為首。其差別不過是，前者『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而後者『不務排斥日人，而堅持台灣為台灣人之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之利益與幸福』。簡言之，前者傾向「體制外改革」，後者傾向「體制內改革」。因此，前者的犧牲也就大於後者，至於蔡培火之言，當僅為「台灣派」立場的觀點。

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聲

另外，據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把抗日台胞分成二大派：一為穩健派，為『不談論帝國之統治權，專努力於改良統治，撤除內台差別，以增進島民之利益幸福者』，包括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蔡式毅、王受祿、韓石泉、謝春木、鄭松筠、楊振福、黃岡；二為激進派，則『奉行民族自決主義或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動輒有反抗帝國國權之傾向者』，包括連溫卿、蔣渭水、鄭明祿、王

敏川、邱德金、高兩貴、白成枝、王萬得、洪朝宗、蔡孝乾、莊泗川、彭華英、楊良、潘欽信、吳廷輝、洪石柱、黃達元。

可見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是將「台灣派」視為「穩健派」的，而把「祖國派」和「無產派」視為「激進派」的。或以左右來分，右派當為「台灣派」，左派當為「祖國派」和「無產派」。再以左派而言，「祖國派」當為中間偏右，而「無產派」才是真正的左派或極左派。所以，「無產派」的連溫卿才會批判「台灣派」的林獻堂是「沒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

「無產派」後來又分裂為「黑派」和「紅派」，「黑派」者乃無政府主義，「紅派」乃馬克思主義。「紅派」又有台灣共產黨，和非台共的自由左派。台共中又有「國際派」，和以上海大學學生為主的「上大派」。

除了這些派系的分化外，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這些派系分化的過程。

一九〇二年，林少貓在「後壁林之戰」被殲滅後，台灣的武裝抗日運動基本上遭到鎮壓而撲滅。台胞不能不在承認日本殖民統治的前提下，尋求自己的出路和前途。時中國變法派領袖之一梁啟超，變法失敗後，流亡到日本繼續鼓吹，影響所及包括台灣。所以，一九〇七年，林獻堂赴日訪梁啟超，梁啟超即授以愛爾蘭人結交英國朝野抗英的策略，這是改良主義的策略，而非革命鬥爭的路綫。

一九一四年，林獻堂糾集台灣士紳，而有台中中學創立運動，雖然台中中學創立成功，却終為日人接收，然畢竟是矢內原忠雄所謂之『台灣民族運動之先聲』。

同年，十二月，林獻堂與坂垣退助在台組織「同化會」，欲求台灣人地位與日本人平等，以減輕台人所受殖民統治之酷烈，然翌年元

月即遭總督當局取締。

關於台中中學和「同化會」，「祖國派」的蔣渭水會有以下的批評和理解——

『從前林獻堂所做的台中中學校設立費的募集。及同化會的提倡，我在學窗裡看了，實在很難同意的，因為當時的督府，必不許可我們島人自設中學，若提供金錢請政府設呢，這不過是發現和台北國語學校相似的一個變態的——畸形兒——中等教育機關罷了，不如將這所募的二十數萬圓，用做獎勵留學的資金，那麼不知道多養成許多的人物哩！至於同化會呢，這是大不通的行動，我們本要出來反抗，後來我們幾個學生同志，去鯤溟會館詰問某幹部，才知道是一時的方便，所以我們守著沈默態度。』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民族自決」；一九一九年，日本學者組織「黎明會」倡民主主義思潮；一九一九年，朝鮮發生「三一運動」。這些國際間的事件，也衝擊到日愈衆多的台灣留日學生。

「台灣議會」的聯合陣線

一九一八年八月，林獻堂赴日，與留日學生組織「啓發會」並任會長，林呈祿為幹事，且置「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六三法」為殖民地台灣的特別法，取消「六三法」，亦即使台灣之地位與日本相同。故「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實與「同化會」之意義如出一轍。

「同化會」和「六三法撤廢」雖為殖民地鬥爭之策略亦即將渭水所言『一時的方便』，但却與民族運動的基本精神反逆。台灣必須與

日本國內有民族的差別，才有台灣民族運動的可能，一旦差別消除，亦即台灣果真遭受「同化」，也就是民族運動的結束。

雖然，林獻堂一派主張「六三法撤廢」，但是林呈祿一派則主張設置台灣議會，保持台灣特性，以能爭取自治。兩派意見不合，而導致「啓發會」無疾而終。至一九二〇年秋，林獻堂再赴日，經過長期的辯論，林獻堂終於接受了「台灣議會」的觀念，並於十二月接受「新民會」會長之任。

不贊成台中中學和「同化會」的激進的「祖國派」蔣渭水，却對台灣議會熱烈的支持，他說：『大正十年春，在宴席中由林瑞騰氏介紹，才識得林獻堂氏。——瑞騰氏是台北的朋友介紹於我的——並聞獻堂氏是要上京去替台灣人謀福的，所以我隔日就特地要表敬意去太陽館訪問他。那時有種種關於台灣政治上的議論了。後來獻堂氏到東京和留學生連絡，做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運動，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朵，此請願趣意書，映入我的眼裡，我覺得這真是台灣人唯上無二的活路啊！那時我就逢人便說，一台灣議會的設置，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有偵探對我說，稻江人士濟濟，人人都不敢表示贊成台灣議會請願的意思，獨你一個人，大呼特呼極力贊成，我說人人都是怕著政府的威嚴——壓迫——不敢多言，設使能將全島台灣人，——施以催眠術，使其脫離督府的脅威，我想則人人都現出真情，來表示贊成啦，他語塞辭去了。（中略）及至這次提倡台灣議會的請願，和我的主義上，大有暗中相合，我感覺著這種辦法，才是台灣人唯一要走的一條生路！爾來我的同志漸漸地增加了，我的活動的機會，慢慢地成熟起來了。』

由於林獻堂的抉擇，而展開了歷時十四年

-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團結了台灣抗日民族運動陣營。

(一九二一～一九三四)，共計十六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台灣議會不能成功，但是，却團結了台灣的民族運動陣營，帶動了各種政治、社會運動，而使得這十四年中，成為各種運動的蓬勃時期。

在蔣渭水等人的努力下，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也成立了，成為同胞民族運動的一個重要機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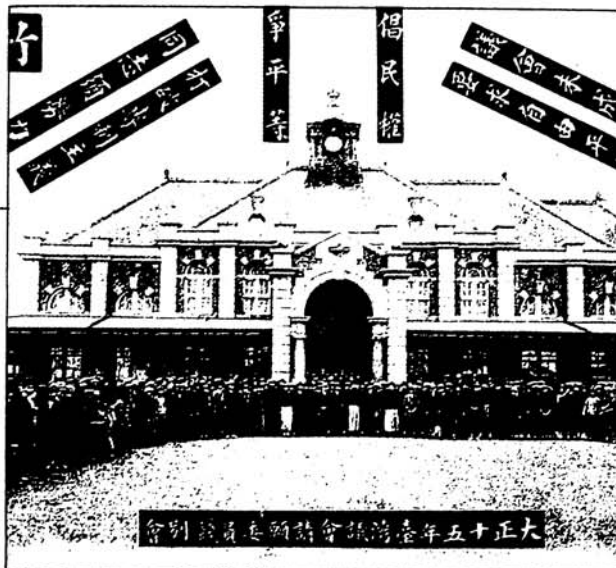
雖然，台灣的民族運動在二十年代一起步，就有「台灣派」和「祖國派」傾向的分歧，但却能以「台灣議會」，形成聯合戰綫，這是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人，不能不特別注意的。

左右之爭和「文協」分裂

但是，蘇聯革命成功的影響逐漸擴大，中共成立，日共也成立，孫中山又於一九二四年宣佈「聯俄容共」政策，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召開。斯時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籠罩著極為樂觀的氣氛。台灣民族運動中開始了左右之爭，而漸形分裂。

一九二六年十月，就有「無產青年」向林獻堂、蔣渭水、謝春水等聲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實屬不可能實現的妄動行為，假若能實現也非為台灣人謀幸福之途，此運動的效能不外是承認並加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因此，我等無產階級黨反對如此不徹底的妄動行為，這必須立即中止。』

東京的社會主義派青年亦聲明：『台灣議會的哀願叩頭式請願運動，與其說推行台灣解放工作，毋寧說是破壞台灣民衆的英勇鬥爭及延長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支配。因此，莫不成為台灣解放運動的障礙，絕不可能完成解放



台灣的任務。』

「台灣議會」的聯合陣綫，於是開始破壞。

當時台灣的「無產青年」也效法中共和日本左翼的辦法加入「文化協會」，據謝春水在《台灣人之要求》一書中說：『一來藉以日本社會主義的左翼份子企圖打進右派團體裏而想獲取右派群眾支持的戰術；二來是仿效在中國國民黨採取容共政策時的中國共產黨所站的立場，即在中國國民黨裏發展其本身的組織。』

「無產青年」除了抗議「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外，在「文化協會」方面，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文協」在新竹舉行第六次年會時，為修改章程，首度發生分裂。十一月在霧峯舉行修改章程起草委員會上，連溫卿即向蔡培火抗議。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文協」在台中公會堂舉行臨時大會，左右派正式分裂，連一向包容「無產青年」的蔣渭水亦遭排斥，逼使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宣佈辭去中央委員而退席。

退出「文協」的舊幹部，遂於同年七月十日成立「台灣民衆黨」。新「文協」則指責民衆黨為『違背台灣民衆利益，破壞共同戰綫的台灣民衆之叛賊，本會決極力加以翦除』，並

對舊「文協」幹部辦的《台灣民報》發起「台灣民報不買同盟」，而迫使「文協」舊幹部於十月一日發表《脫離文化協會聲明書》。取得新「文協」領導地位的連溫卿，也有《一九二七年的台灣》一文，說明「文協」的分裂，乃『因無產階級、農民及都市勞動者的利害關係，終是無法和彼等少數地主資本家一致』。

新「文協」則連續發動了尖銳的新竹事件（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台南墓地問題（一九二八年五月）、台中師範事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等爭訟。而在這期間，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也秘密的在上海一家照相館二樓成立了。

林獻堂與「祖國事件」

「文協」分裂後的民衆黨這邊，由於蔡培火與蔣渭水長期的不合，也由於林獻堂和蔣渭水出身背景的不同，林是嘉峯大地主世家，蔣是出身寒微的典型小資產階級醫生，又由於民族意識的激進和總樞，遂成「台灣派」與「祖國派」之對立。

一九三〇年初，穩健的「台灣派」所醞釀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逐漸具體化，而於八月十七日正式宣佈成立。「台灣派」逐漸脫離民衆黨。

雖蔣渭水一再隱忍，然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終致決議除林獻堂外，其他參加「自治聯盟」的跨黨份子，一律開除黨籍。在這種情形下，身為「台灣派」領導人的林獻堂也不得不發表談話，辭去民衆黨顧問之職。

至此，民族運動先遭受了左的分裂，現在又遭受了右的分裂，其實力的削弱亦可想而知。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民衆黨舉行第四

次黨首大會，會中，台北警察署長突然出現，向民衆黨主幹陳其昌交付「結社禁止命令」，理由是『如斯階級鬥爭加味民族運動為目的之結社難以容忍』。並當場逮捕蔣渭水等十六人成立了三年半的台灣民衆黨於焉結束，蔣渭水本人亦於該年八月五日逝世，享年僅四十。

取得「文化協會」之後的「無產派」，也產生不斷的分裂。首先是「紅黑之爭」，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無產青年」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成立「台灣勞動互助社」；「紅派」內又有王敏川與連溫卿之爭，新「文協」第三次大會，「農民組合」即於會中提出《指斥連溫卿一派反動抗議書》，並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召開之中央懲罰委員會，通過開除連溫卿、李規貞之會籍。

一九三〇年，台共秘密傳達《台灣農民組合空前任務的綱領》，要求『對楊貴（遠）、連溫卿派展開激烈的暴露鬥爭』。「農組」亦秘密議決『向楊貴、連溫卿進行鬥爭，淘汰組合內部的機會主義與中間動搖份子』。

「淘汰」完了「機會主義與中間動搖份子」之後，「無產青年」就幾乎只剩下台共了，但台共內部又有「上大派」（中共）與「國際派」（日共）之分。

一九三〇年七月，林日高即寫信給謝雪紅表示脫黨，莊春火亦退出台共；另外，在上海的翁澤生、潘欽信亦遭受島內台共中央除名；一九三一年，在台共「第二屆臨時大會」上，謝雪紅又被開除，同年，謝雪紅即被捕入獄，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中，台共黨員及同路人被一網扣盡，被捕共一百零七人，起訴者七十五人，處刑者四七人，其中處刑十年以上之幹部計十一人，且黨員劉縱周遭酷刑而死，犧牲不可不謂慘重。



●抗日運動中「台灣派」領袖—林獻堂。

「祖國派」與「無產派」到了一九三一年，均遭消滅。

至於「台灣派」，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請願，亦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宣佈停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於參加了第一次「改正地方自治制度選舉」後，趨於沈寂。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望重全島領袖全台的「台灣派」領袖林獻堂，亦因「祖國事件」遭台灣軍參謀長所嗾使的浪人賣間兵衛當眾毆辱於台中公園。

至此，台胞抗日運動中的三派均遭消滅，次年（一九三七）發生「七七事變」，再至一九四〇年受到「皇民化運動」之後，「御用派」便成了一枝獨秀。

來之視今與今之視者

台胞的武裝抗日和非武裝抗日先後都失敗了，這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宿命，但是，「一切的存在皆合理」，我們後人必須要了解其失敗的「合理」在那裡，歷史才能成為我們的教訓，茲願簡單作以下幾點的探討：

一、日據五十年，從明治到昭和，正是日本資本主義興起擴張的時期，其內部的社會矛盾並未能尖銳化的暴露和分化，除非外力，是無以摧毀其在台之殖民統治的。事後的歷史證明

，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人民八年抗戰才被摧毀的，所以，當年「祖國派」的判斷是符合客觀歷史發展的。

二、台灣的資本主義由日本移植而來，其產業資本佔絕對壟斷之地位，反之，無產工人則是台胞佔絕對之多數，故當年台灣的民族鬥爭即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亦民族鬥爭，昧於實況而以少數的台籍地主和資本家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而失去民族鬥爭的聯合陣綫，不能不令人遺憾。

三、未能正確估計第一次大戰及「十月革命」後，對帝國主義國家的衝擊，及正確估計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並錯誤估計中國民族主義，及對統治民族的善意給予了過高的估計，故怯於聯合工農大眾展開對統治民族的堅定的民族鬥爭，而使得分裂之後的聯合陣綫，再形削弱，以林獻堂之聲望竟不免於遭到當眾毆辱，能不令人不遺憾嗎？

四、從光復後才發現的當年總督府秘件《文化協會對策》可知，日本當局的分化政策亦在抗日陣營中發生作用，收買穩健派，極化激進派。

五、除了階級認同、意識型態和運動路綫外，宗派主義在台胞抗日民主運動的陣營中，也發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

以上所述，或有疏漏，或有對台灣先輩微詞之處，還請指教和海涵。

今天我站在民進黨的講台上，把這段台灣先人痛苦而寶貴的歷史，還給各位台灣的子弟們，作為一個台灣歷史的研究者，我更期望今後台灣歷史的發展，不要「來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才好。謝謝大家。

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于老松國小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抗日運動的 社會 · 經濟基礎

■蕭友山著 · 平民譯

日本帝國主義佔有台灣後首先着手的是土地和山林的掠奪。

明治廿八（1895）年總督府公佈「凡無確實所有權證明書之土地山林原野，均收歸為官有」的法令，然後下令人民申報土地所有權。然而，由於許多土地缺少完整的所有權證明書，有些人懼怕申報後的重稅，更有許多人不懂申報手續，最後，這些土地山林原野盡歸日帝所有。一般人民爲了抗拒掠奪，只好不斷地「作亂」，而因申報而獲得保障的土地所有者，却經常以旁觀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抗爭。

日本掠奪土地，獨佔經濟資源

近代帝國主義的剝削需設立新的資本主義企業，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所設立的新企業就是製糖工業。製糖工業需要廣大面積的土地，但從前的掠奪方式並不能滿足製糖公司在必要的地方擁有所需土地，因而也就需要採取強制手段收購土地，此後在各地都發生過反對強制收購土地的抗爭事件。

對抗日運動一直採取旁觀的態度的封建地

主，當他們本身的土地也成爲日帝強制收購的對象時，有些人開始直接參加抗日運動，另一些人則暗地支持運動。這些抗爭事件發生的時間自明治四十五（1912）年到大正末年，而大正末年文化協會抗日運動之所以能夠包羅各階層人民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對土地山林原野的強奪告一段落，且近代主要企業和金融的獨占也大致完成後，由於已能控制台灣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蠢動」，總督府開始解除不准本島（台灣）人投資自組股份有限公司的禁令，而採取「承認只有本島人股東的本島人公司，並勸告本島人投資於政府所獎勵的半官營、民營公司，以便吸收本島人資本，且將其置於支配下」的政策（參考：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此後，封建土地所有者開始投資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諸企業，並分享利潤，因而逐漸隸屬於日帝，與日帝共享利害關係。台灣民衆黨的脫離文化協會以及自治聯盟一派之離開民衆黨，就是發生於這段期間。

由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必然導致統治民族政治、經濟地位的優勢、反抗帝國主義剝削的鬥爭，也必然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因此，在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中，民族鬥爭就是階級鬥爭，



• 抗日前輩為歷史做見證，第一排左起：周合源、許月里、陳其昌、伍金地、劉明、王文明、李清增

兩者之間具有極密切的關係，故在解放運動的某一階段，於一定條件之下，兩者可極為融合，能夠形成統一戰綫。

在民族鬥爭中，又由於各階級、階層與帝國主義統治者間利害關係的深淺程度不同，而產生目標、手段的差異，因此也可能發生分裂

階級利益不同導致抗日陣綫分裂

不過，到了封建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統治者之間產生共同利害關係後，統一戰綫就分裂為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兩者之間甚至還會發生對抗現象。

初期的文化協會包羅各階級，到了後期，先是有人脫離文協另組民衆黨，然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治聯盟又脫離民衆黨。這些事實，足以證明階級和運動間的互動關係。

- 日本帝國主義者大量掠奪土地以建立製糖工業，圖為甘蔗園

同樣是台灣人，但封建地主階級和日帝統治者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另一方面，勞動者、農民與日帝的利害關係正完全相反；而小資產階級則站在兩者之間。



各階級均依照其階級利益，也就是依照其經濟利益觀點所產生的政治要求，而形成不同的團體——心甘情願做日帝走狗的「公益會」；肯定日帝統治，只盼望在其憐憫下實施殖民地自治的「自治聯盟」；主張民族自決的「民衆黨」；堅決主張打倒日帝統治，以革命手段實現台灣解放的則有：轉向後的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左派工會、反帝同盟、台灣共產黨及其他革命諸團體。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台灣民衆黨

——從成立、分裂到解散

■蕭友三著 ■平民譯

對於台灣民衆黨的分合歷來已有頗多論述，本文用前所未有的觀點作了深刻的剖析。

台灣民衆黨組黨經緯

文化協會轉變方向後，為實現其新綱領、政策而不斷奮鬥。由於新綱領不合台灣封建地

主及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利益，而不為他們所接受。

關於這點，文化協會的「政治運動方針」

●台灣民衆黨第一次磋商大會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指出如下：「雖然現階段的台灣革命是屬於民主革命，台灣資產階級階級却無法擔負任務。因為台灣資產階級的資本，如不是融於於日本人資本之內，就是屬於進出口商的貿易資本。民族資本的企業規模極為微小，且依賴於日本的金融資本。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都兼有地主的身份而在農村進行其封建剝削。因此，以反帝國主義、廢除封建殘餘勢力為任務的革命，對台灣的資產階級構成直接或間接的打擊。因此，台灣的資產階級不欲與帝國主義脫離關係，只想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要求地位的改善和榨取機會的均等，只想在帝國主義庇護下隨著帝國主義的發展而發展」。

這就是說，介於台灣的勞動者及農民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是與帝國主義更為一致的。因此，當文化協會站在無產大眾的立場，開始發動反帝國主義運動時，我們不難理解：在民族主義的假面具下暗地裡一直意圖改善自己地位並取得與日本人均等榨取台灣下層人民機會。如此，文化協會向無產階級運動轉向後，幾乎所有舊幹部都脫離隊伍。這些脫離文協的人就組織了台灣民衆黨。但我們應該注意：民衆黨是由二個利益不盡相同的集團所結成，即代表封建地主、本土資產階級利益的蔡培火派以及代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民族主義者的蔣渭水派。

封建地主的經濟立場前已提過，所以現在稍談小資產階級的經濟立場。小資產階級徬徨在無產階級和封建地主二大階級之間。其經濟地位並不如工農階級那樣處在絕望和窮困狀態；雖然其經濟地位日趨於沒落，却仍然掙扎、抵抗命運，而且仍然幻想著總有一天能夠改善經濟地位，因而下不了決心參加工農的革命陣營。在另一方面又不像地主那樣和日本帝國主

義擁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也就躊躇於參加他們的陣營。於是，有時候爲了想利用封建地主的財力而試圖接近他們；有時候也想利用勞動者、農民的革命勢力而接近他們。當他們想接近勞動者、農民時，就會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鎮壓、壓制。所以，雖然民衆黨是在當局默許之下成立的，但當蔣渭水、謝春木等人於民衆黨的後期意圖積極接近工農陣營時，就被命令解散。

當我們瞭解到成員之間不同的經濟利益時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自文化協會集體脫離的舊幹部所組成的民衆黨，會有人再度分裂而另組自治聯盟。經濟立場的不同必然導致政治立場的不同，不同經濟立場的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目標、手段以及最後目標都有不同的看法。這種目標和手段的差異在組黨前就存在著。蔡培火所代表的封建地主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其最後的目標是依照合法的方法逐漸獲得地方自治權。另一方面，蔣渭水所代表的，以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者意圖組織全台灣人，兼作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甚至想聯合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以便達到台灣民族自決的最後目標。

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結合

爲了共同對付文化協會，脫離文協的舊幹部無暇顧慮內部意見的對立，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2月10日，在霧峰林猷堂家召開組黨籌備會，並將黨名決定爲「台灣自治會」，而後又改爲較穩健的「台政革新會」，由蔡培火提出申請。不過，5月29日舉行組黨典禮時，又把名稱改爲「台灣民黨」。6月3日，新黨被禁止成立，理由是：故意使用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之口號，顯有



●工友聯盟成立大會

挑撥民衆的反感，有妨害日台融合之虞，甚至使人懷疑抱有民族自決之意圖。

台灣民黨被禁止後，於昭和二年6月17日，在台中市榮町東榮名產株式會社開善後對策會議，就新黨的組織問題交換意見。共集合了蔡培火、蔣渭水、邱德金、陳旺成、陳逢源、陳炳、洪元煌等共廿五人，洪元煌做司儀，報告了新黨被禁止的經過後進入討論。葉榮鐘、李應章、林糊、邱德金等的一派主張「玉碎論」——「倒不如各人回到地方，組織當地民衆，繼續連絡，以從事運動。此時再與當局妥協，而昧於大眾，將非常不利。故我人徹底覺悟『寧願玉碎不願瓦全』，而打消妥協的念頭。」但「組織絕對需要論」則以「如無組織的連絡與統制，將是散漫而脆弱的運動，所以絕對需要組織」的論點反擊。結果，出席者中的多數贊成「組織論」，遂指定黃周、彭華英、陳逢源、陳旺成、謝春木等人為創立委員後散會。之後，昭和二年7月10日，在台中聚英樓舉行組黨典禮，參加者共六十二名。在蔡式毅司儀之下，由謝春木報告創立經過，推薦洪元煌為議長，然後無異議通過綱領。由於在籌備工作中有關當局暗示「只要不讓蔣渭水參加就可准許組黨」，蔡培火提出：「蔣渭水應自動拒絕就任委員」的報告。對此，蔣渭水則責備說：「蔡的意見是當局所授意的」。在這裡雙方

不期而暴露出意見的分歧。所幸，廖進平予以慰撫，陳德成也提議「是否要讓蔣渭水當委員，應由黨員自由判斷，即使為此而遭受禁止組織的處分也在所不惜」而解決這問題。審議宣言案後閉會。

由於以蔡培火為中心的妥協分子的主張佔了上風，該宣言附了前所未聞的如下注釋：「如在綱領政策上所明示：本黨之目的，在於提高台灣人民之政治的地位，安固其經濟的基礎，改善其社會的生活，決不做民族鬥爭」。所謂綱領政策就是：本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由於該綱領過於抽象，可能有幾種不同解釋，倘若任各黨員恣意解釋，恐會導致黨活動的混亂，所以決定編「解釋書」。中央委員會討論了蔣渭水和彭華英等兩個提案。最後決定以彭華英案為中心，參考蔣案，在第二次大會做如下決定：

- 一 確立民本政治：根據立憲政治之精神，反對總督專制政治，使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完全分立，應予台灣人享有參政權。
- 二 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提高農工階級之生活程度，縮小貧富差距。
- 三 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改革社會之陋習，實行男女平權、確立社會生活之自由。民衆黨對階級問題的指導精神是：
 - 一 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同時併行。
 - 二 擁護農工階級即實行階級運動。
 - 三 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造成全民運動之中心勢力。
 - 四 圖謀農工商學之聯合，造成全民運動之共同戰線。
 - 五 本黨關切農工階級之利益，應加以合理的階級的調節，俾不致妨害全民運動之前進。
 - 六 台灣各階級民衆集結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全民之運動。

民衆黨組黨前後

此外，主要的政策尚有：以普選選出自治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機構；集會、言論、結社的自由；改革學制；廢除保甲制度；改革稅制；節省不必要的開支；金融、農會、水利會的改革；廢除中間剝削機構；禁止人身買賣等等。

當時的中央委員有：蔣渭水（財政部）、簡來成、楊連樹、彭華英（秘書長）、謝春木、盧丙丁（宣傳部）、陳旺成、吳海水（組織部）、洪元焯（社會部）、王鍾麟（政務部）、王受祿、林迫延、黃運元、黃賜、林火木、許嘉種（調查部）、蔡少庭、蔡炳焯等人。另外，林獻堂、林幼春、蔡式毅、蔡培火等人就任顧問。

扶持工農團體以發展全民運動

如在「階級問題的指導精神」中所示，民衆黨是從扶助工農團體的發展，以便做爲全民運動中心勢力的立場，來處理階級問題。因此組黨後乘文化協會內部糾紛的機會，收編既有勞工團體的一部分，然後利用其勢力從事評議會反對運動、地方自治改革運動、確立本島人在產業組合的自主權以及其他的宣傳運動。民衆黨在組黨前後所辦的演講會共有 211 場，聽衆估計共有八萬六千人。其他的政治演講會共有 50 場，聽衆超過三萬人。在此間，蔣渭水派的勢力以所屬勞工團體爲背景而日趨增大。此後，蔣派受到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進展及中國革命的躍進等影響，開始主張較進步的政策，於是先將第二次黨員大會準備提出的改正案由中央委員會審議。結果被視爲反動派的彭華英表明辭職，使得黨內的矛盾表面化。

對這件事情，當時以彭華英發表如下感想：「文化協會分裂之後，則有計劃組織民衆黨的意思，遂廣爲網羅地方有資產、有學識人望的人士，組成有力的團體。正值本島施行完全



- 台灣民衆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 吸食鴉片的台灣人民





強調說：「我人所處之社會環境。不僅是惡劣黑暗，而且我人所持有之勢力亦極其微弱；一方面乃由於我人遭受當局賦課之誅求、金融之宰制、交通運輸之獨占、土地之收奪、言論之不自由、人權之蹂躪等暴行……，因此，我人爲求 台灣人之解放，『對內須喚起並動員全體台灣人，對外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國際無產階級互相 連絡、共同奮鬥、始能達其目的』。吾人熟知 上述解放運動的原動力、係肩負於多數民衆之 雙肩、我人理當『喚起民衆』、『鞏固組織』以完成對內的基礎之事。全民運動爲台灣解放 運動之一過程，不但係先人之遺教，實示極其 合理適當之途徑。我人必須發展各種團體之組 織與聯合，以發揮民衆之威力。」

反對日本鴉片特許證

大會後，決定將「台灣地方自治改革運動」做爲當前的主要政治運動，因此準備介入保甲幹部選舉，讓當選黨員從內部破壞保甲制度。另一方面，爲引起列強注意台灣問題，特提「鴉片新許可問題」向國際聯盟打出了如下的電報：「日本政府有計劃地准許台灣人吸食鴉片，違背國際條約且有悖人道。代表台灣四百萬人民之台灣民衆黨」導致國際聯盟派委員來台調查。然而，由於民衆黨員中（以封建地主爲主）有一〇二名原來就獲准吸食鴉片，另有二四二名正提出吸食申請書，由此這次行動在黨的鬥爭上未能步調一致，遂成爲後來分裂的一個原因。此外，最重視的地方自治改革運動，也由於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的攻擊說：「即使成立台灣議會，也是資本家和地主的代辯機關，鐵定會變成將壓迫我們無產階級的法律合理化、剝削合法化的機關，對我們不僅不利，更是有害。我們應該集中無產階級的力量，顛

自治之際，做爲權威團體的民衆黨，當使之在本島施政上扮一重要角色，此乃本黨的理想。但見一些有勇無謀之徒，輕舉妄動，徒以矇昧無知的農工階級爲黨政策的中心。目前此輩橫行囂張，實令人深感遺憾。」蔣派則以「彭已反動化，成爲總督當局的走狗」指出其反動性。

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

組黨一年後，昭和三年（1928）7月15日在台南「南座」開第二次大會。議程包括針對過去一年的檢討、黨規則的修正以及補制「勞動立法、佃耕立法」政策。會後通過宣言却 被禁止頒佈。該宣言的要點爲：開頭述明各國無產階級的抬頭及各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進展，主張和日本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拚著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覆日本的統治權，逐出日本人在政治、經濟的地位，否則要實現我們最後的解放，實有困難」，使得該運動的成績大打折扣。

差不多從這時候開始，封建地主以及其代表人對於民衆黨的左傾甚感不安，又看出將要提出民衆黨第三次大會和大會宣言、改訂綱領，和他們的利益相左，因此有不少人開始動搖。

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

時間：昭和四年（1929）10月17日。

地點：新竹公會堂。黨員一六九人，來賓卅一

●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事件入獄紀念



人，以及甚多旁聽者參加之下，由司儀宣佈開會。之後，拿出黨旗——青地、左上方長方形紅地內有三顆星代表三大綱領——供審查。經全場一致議決通過。蔣渭水講開會辭，指定陳旺成爲議長，陳天順、張晴川爲書記。繼黨務報告後，審議各支部的提案，最後通過宣言。這次宣言超過七千字，其要點爲：首先說明世界情勢和帝國主義的矛盾，英法的對立，蘇聯的成長，殖民地民衆的自覺；再說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進展。其次，分析日本的情勢，闡明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高潮以及台灣的現況。最後指出：使全島之開爭份子集中本黨而受本黨之指導、整理陣營、統一陣線，以擴大開爭力量，齊一步調。領導台灣民衆而使其知所適從，俾能達到大眾政黨之目的。對外聯絡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參加國際解放陣線，期與世界之解放潮流匯合，實行本大會所定之政治決議，努力謀其貫徹。尤須致力完成地方自治制度，廢止台灣現存之諸惡法，爭取人權，擁護諸法律之實現，今後應傾全力促使達成目的。即在最短期間實現本黨之綱領政策，達成人類解放之目的。」

由此可知，蔣渭水認識到台灣革命的主力在於工農階級，爲了使這股力量成爲全民運動的中心勢力，儘力將工農階級置於他自己領導之下。以所掌握的工農階級力量爲背景，逐漸掌握民衆黨的領導權。因此，至少要擁護工友總聯盟的工人的利益以及反農民組合的農民利益，在綱領政策上便不得不能反映工農階級的要求。但這些要求或多或少與佔民衆黨老幹部大多數的封建地主發生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於該等要求的公然提出，蔣氏似乎尚有點猶豫。當民衆黨的實權完全落入蔣渭水派後，終於在昭和五年（1930）1月7日提出改訂綱領

，供中央委員會審議。改訂綱領的論爭終於使自組黨以來一直存在的兩派對立表面化，導致全面性衝突。舊幹部企圖將本部移至台中，以便牽制蔣派的活動，但由於缺乏對抗力量，不得不被迫放棄幹部地位。

改訂綱領比第一次綱領進步許多，有如下主張：

- 一、廢除政治、經濟、社會的束縛。
- 二、擁護並伸張民衆的日常利益。
- 三、反對特權政治，爭取普選權。

開除黨內封建地主階級

• 民衆黨被解散前留念

封建地主及其代表人不滿於民衆黨的左傾化，企圖展開有關「地方自治改革問題」的單一目標運動。因此由楊肇嘉、林獻堂、蔡培火、蔡式毅等人計劃設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蔣渭水派瞭解這一活動將導致民衆黨的分裂，為封鎖其活動，計劃發動大規模的自治促進運動，乃以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決議召開全島巡迴演講會，並集一萬多人簽名提出地方自治建議書。蔣派這一攻勢雖暫時封鎖了舊幹部的活動，但已無法左右大勢。此因封建地主們聯合的氣勢漸告成熟，自治聯盟的組黨行動還算順利進行，也開始活動，而且大多數中產階級以上的



被械東者在台資民衆黨本部為最後紀念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黨員也爭著加入該聯盟。於是民衆黨下決心將主謀者蔡培火以及其他十六名自治聯盟幹部悉數開除。

這一年民衆黨重要活動，除了前述的地方自治促進活動外，還有始政紀念日反對運動、總督評議會反對運動、減稅運動、盜犯防止法反對運動等等，尚呈活潑。

較富裕的黨員大量投向自治聯盟，造成民衆黨財務漸難以維持。蔣渭水、謝春木私下研討打開困境並謀進取之道，結果認為應以工農階級為黨的基礎。昭和五年（1930）12月28日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審議秘密作成的綱領、政策。然後決定將說明書附在該案，送至各支部，供支部黨員大會審查。

綱領（禁止頒佈）

- 一 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的政治自由。
- 二 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的日常利益。
- 三 努力擴大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以及一切被壓迫民衆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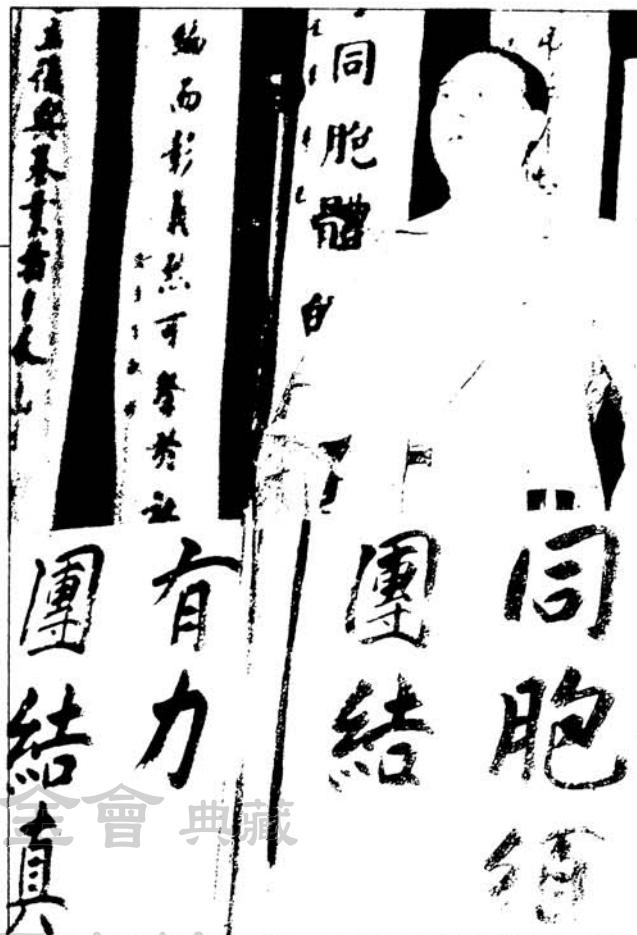
政策

一 政治政策：

(一) 反對總督專制政治。(二) 反對總督府評議會。(三) 爭取自主的政治機構，十八歲以上之男女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四) 獲得民衆自主之地方制度。(五)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絕對自由。(六) 即時撤廢壓迫殖民地民衆之惡法令。(七) 取消總督之法院監督權，主張司法權獨立。(八) 反對對華干涉政策。(九) 廢除一切民族的歧視。另有十八項，未及備載。

二 經濟政策：

(一) 遺產稅、所得稅、地租稅的高率累進課稅。(二) 廢除無產階級者負擔之消費稅及關稅。



(三) 制定工會法，確立團結法、罷工法、團體契約權。(四) 實施八小時勞動制，制定失業保險法、失業津貼法。(五) 制定佃耕法，確立耕作權。(六) 將官公有地放領農民。及其他卅項。

三 社會政策：

(一) 撤廢對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之歧視。(二) 禁止人身買賣。(三) 確立學術研究之自由及校內的自由權。及其他五項。

如綱領、政策所示，民衆黨終於接近了無產政黨。此案交付各支部討論，但並未能獲得全體的贊同——新竹支部的陳旺成極力反對，台北支部的李友三也聲明反對修改案。最後在中央委員會交付表決的結果，反對者除陳旺成外有十一人，贊成者十六人，棄權十人，於是決定向第四次大會提出。

第四次代表大會及民衆黨的解放



● 蔣渭水逝世紀念大會

結社的命令交付議長，同時下令解散大會，並拘捕在現場的蔣渭水、許胡、盧炳丁、陳晴川、黃江連、楊元丁、蔡小庭等十六人。2月16日，蔣渭水、謝春木等主要幹部聯名發表對禁止結社的聲明書。其中一節說：「此次當局違背立憲精神，無視人民的結社自由權，而橫加暴壓、勢必挑激大眾的抗議。此次當局無謂之挑戰若能激發大眾的鬪志，則民衆黨雖慘遭折殺，亦無憾矣！」台灣人的解放不可能僅靠知識階級和有產階級來完成。全體台灣人的自由必待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奮鬥，如此解放運動才能獲得完美的結果。我等當今之急務在擴大並強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組織，進而促進解放運動戰線之統一，以期早日達成解放運動之目的。」

蔣渭水病逝

由於這次的禁止結社，蔣渭水體會到在帝國主義壓制下解放運動合法性的界限，此後一面與台灣共產黨保持聯繫，繼續展開運動，但8月5日下午七時四十分因傷寒去世——一直到死前，仍然堅信無產階級的勝利，並留下如下遺言：「台灣社會運動既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眼前，凡我青年同志應極力奮鬥，舊同志亦須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

見證人：羅萬偉、杜聰明、賴金圳
李友三、蘇竹南、蔣渭川

蔣渭水死後，再也無人能統轄民衆黨，繼續領導解放運動，周圍環境也不利於島內運動的推行，主要幹部又遠走中國大陸，民衆黨旗下幾個團體遂逐漸陷於停頓狀態。

(譯自「台灣解放運動の回顧」，
1946年9月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昭和六年(1931)2月18日，蔣渭水以下的左派幹部不顧一切反對，在民衆黨本部召開第四次黨員大會，共有一七三名黨員參加，由李友三擔任司儀，推薦蔡年享、蔡少庭為正、副議長，指定書記、記錄六人，報告本部、支部情況，然後蔣渭水提出了綱領、政策改訂案供審議，也做了大致如下的說明：「本黨在這四年中循著殖民地解放運動一般發展模式而發展」……「一般大眾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愈來愈趨於尖銳化」……「島內大眾的生活鬪爭趨於激烈化，而黨內資產階級、地主、反動知識份子却逃避、後退」……「本次的綱領應該在組黨時就提示，却由於周圍的情勢而一直拖到現在。因此，改訂綱領政策實為建黨精神的切實表現」。然後在陳旺成等人的反對下徑付表決，只做了二、三句修整，即依照原案通過。

此時，一直在旁等待的警察當局，將禁止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那一個是蔣渭水 真正的遺囑？

■周穎君

七月十日是台灣民衆黨建黨六十週年，夏潮聯誼會、民進黨分別舉行紀念會，參與民衆反應熱烈，台灣民衆黨一時成爲熱門話題。

台灣民衆黨的創黨人蔣渭水曾參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又是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衆黨的創黨人、理論家。他的一生經歷了台灣重要的政治、文化、社會的抗日運動。此外他和抗日運動中右派地主階級的林獻堂、蔡培火，左派的連溫卿、王敏川等人皆有來往，在抗日運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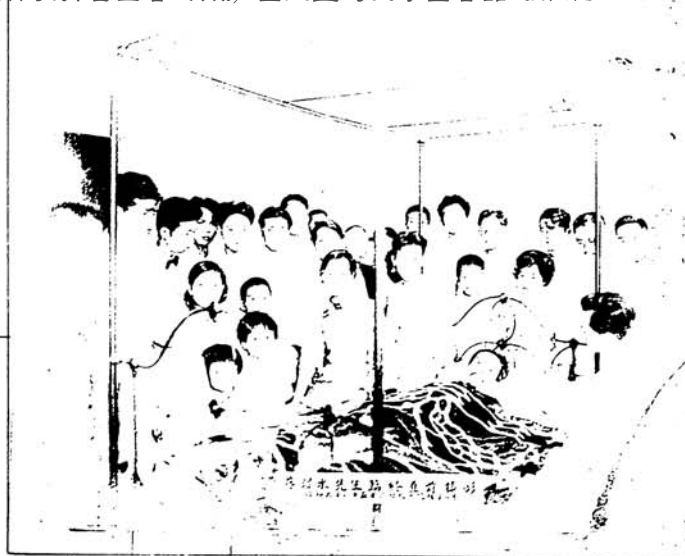


●蔣渭水像

蔣渭水遺囑衆說紛紜

台灣史的研究長年來受到政治上的壓抑或歪曲，異說多端，真偽難明。蔣渭水的遺囑就有多種版本，現將各不同的遺囑內容依時間次序，排比於下：

時間	出處	內容
1 昭和 6年 (一 九三 一) 8月 13日	新高 新報	台灣社會運動確已進入第三期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眼前。凡吾青年同志務要極力奮鬥。而舊同志須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
2 昭和 9年 (一 九三 四)	台灣 總督 府警 察沿 革誌	台灣的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強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努力於同胞之解放、實所至望。 見證人：羅萬傳、杜聰明 李友三、蔣竹南 賴金圳、蔣渭川



● 彌留中的蔣渭水

3 民國 41年 (一 九五 二)	六張 犁蔣 渭水 墓碑	台灣革命運動業已進入第三期吾人預期之勝利迫在眉睫凡我同志必須不屈不撓極力奮鬥以竟全功舊同志尤須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鞏固吾人精神力量為同胞解放而努力 盧丙丁筆錄於台北醫院
4 民國 43年 (一 九五 四)	黃師樵，「蔣渭水及其政治運動」；『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一期。	台灣革命運動，已進入第三期，台灣人的勝利，已經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 在場見證人：羅萬傳、杜聰明、盧丙丁、蔣渭川 筆錄：黃師樵
5 民國 65年 (一 九七 六)	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蔣渭水』	台灣革命運動，已進入第三期，台灣人的勝利，亦經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 盧丙丁筆錄於台北醫院
6 民國 74年 (一 九八 五)	丘秀芷，『民族正氣——蔣渭水傳』（近代中國社出版）	台灣革命已進入第三期，台灣人的勝利，已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

這幾種不同的遺囑中，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時間上可以國民政府遷台為界線，(一)第一～二項，其中第二項是以日文記載，譯成中文後，與第一項的內容相符，故可歸為同類。(二)第三～六項，雖然在行文的遣詞用字上有點出入，但是內容是一致的。兩者間最大的歧異在於前者指出蔣渭水當時致力於台灣的「社會運動」，並預期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眼前；而後者指稱蔣渭水所努力的是台灣的「革命運動」，並期盼「台灣人」或「吾人」的勝利迫在眉睫。此外，有關遺囑的見證人，墓碑及黃師樵的記載顯然與警察沿革誌有很大的出入。可見其中頗有文章。

新高新報是最早出現的史料，距蔣渭水逝世僅隔8天而已。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係日本官方史料，而新高新報是台灣民間的史料，兩者內容雷同，在史學方法上，兩種異源史料相同，則史料的可信性愈高。

蔣渭水晚年思想日益左傾

另從日據時期政治、社會背景來看，在政治上，日本人是統治民族，在經濟上，大資本家又都為日本人，因此台灣人與日本人既有民族矛盾，也有階級矛盾。因此抗日的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是一體的。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隨著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條件的轉換，蔣渭水的政治思想也在早年的民族主義之外，又

◎台灣民衆黨紀念特輯◎



●大直山虎頭埤——蔣渭水原理葬紀念碑（照片由蔣渭水長公子蔣松輝先生提供）

逐漸加重了左翼思想。

昭和六年（1931）初，蔣渭水有鑑於「世界經濟的恐慌，造成失業者日益增加，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又陷入老衰的時期」，同時「蘇俄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正在新興勃起」（見台灣新民報 347 期），他認為有必要修改黨綱及政策，以確立以後行動的方向。

昭和六年 2 月 18 日的第四次全島黨員大會正式通過由蔣渭水起草的三大綱領：

- 一、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政治的自由。
- 二、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日常的利益。
- 三、努力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組織擴大化。

由此，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台灣民衆黨是朝著無產階級的運動向前邁進。

台灣民衆黨被解散後，蔣渭水、謝春木、陳其昌、李友三等人於昭和六年（1931）2 月 23 日發表「共同聲明書」，說明今後努力的方向：「台灣人的解放不可能只靠知識份子及有產階級促成之，台灣人全體之自由，必待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奮起戰鬥，如此方能收穫解放運動之美果，……本黨之再建抑否，首先須取決於諸君之意志。我等當今之急務在擴大並強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組織，進而促進解放運動戰線之統一，以期早日達成解放運動之目的。」（台灣新民報 353 號）

同年 2 月 28 日，蔣渭水再度在民報上發表談話，指出：「今後的方針，依我個人意見，是認定無再組織像空殼的政黨的必要，……且根據正確理論，在現階級的運動方針，須用全力組織訓練農工大衆，推動農工大衆之進出，養成堅固有力的農工同盟，造就解放的基礎

部隊，這才是正確的方針。我很希望島內同胞提起從前信賴民衆黨的精神來繼續支持和援助我們。照我們所提示的方針，對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青年婦女方面，盡全力去做組織和訓練的基礎工作。」（台灣新民報第 353 號）

足見，蔣渭水的思想至晚期日益左傾，且以無產階級及農民的解放為台灣人民解放的先決條件。新高新報、警察沿革誌與其晚年思想甚為相符。

政治禁忌諱言左翼思想

第三項的碑文頗有可疑之處，因六張犁的蔣渭水墓，並非原始埋葬處，根據日據時期台灣新民報的記載，昭和六年（一九三一）8 月 23 日蔣渭水的遺骸是埋在大直山，如今六張犁的墓是在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8 月 15 日遷葬的，而碑文則是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重修的。

原台灣民衆黨幹部黃師樵在戰後，無論是在公開的著作（見第五項）或私下語人均認為後者才是蔣渭水真正的遺囑。所以如黃煌雄在『台灣的先知先覺—蔣渭水』，丘秀芷在『民族正氣—蔣渭水傳』，均採信後說。

值得注意的是，蔣渭水墓碑重修的年代與黃（師樵）文出版的時間，恰是處於全球冷戰、台灣厲行反共的恐怖年代，就墓碑而言，當局或有意於割斷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傳承，就黃師樵老先生同時代的人而言，在二二八事變，及經歷五〇年代恐怖鎮壓的年代後，在餘悸猶存的驚恐中被迫掩飾帶有濃厚左翼色彩的歷史，是吾人可以理解的。

◎海峽論壇◎

民進黨何去何從？

——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

■張大林

民進黨成立將及一年，卻尚未建構一套政策理論，黨的基本綱領混合了自相矛盾的理念，迄今未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等重大問題發表全盤的政策宣言，而中央領導階層亦未建立其領導權威，黨內山頭林立，存有嚴重的歧見，充滿分裂的危機。本文深刻的剖析了民進黨的困境，並為其借箸代籌。

去年九月廿八日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是近四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具體成果，然而民進黨成立還不滿一年，卻外有國民黨虎視眈眈，刻意以特別立法的方式為日後取締民進黨留下伏筆，內有嚴重歧見，充滿了分裂的危機。

本文主旨在就民進黨之黨章、黨綱以及近十個月運作的結果，作冷靜的分析，提供關心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及民進黨領導諸公參考。

承繼黨外成果及包袱

民進黨實際上承繼了台灣黨外運動的成果，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接收了黨外運動的包袱。

近三十年來的黨外民主運動，至少做到了，第一，解除台灣人民從「二二八」事件以來的政治冷漠心態，建立了人民問政的正當性，第二，為政治運動塑造了理想楷模，黨外人士成為政治理想的化身。

然而就以一個成熟的政治反對勢力應有的標準來衡量，黨外運動無疑的仍有一些不易克服的障礙。一是黨外發展到了後期，山頭林立，各自為政，只有在選舉時，才能夠勉強成立類似於統一戰線的組織，協調及策劃選舉訴求的主題及策略。其次，對於台灣前途何去何從

，只有空泛的自決理論，並沒有一套公共政策替代方案。第三，黨外發展的空間走到了瓶頸，百分之卅的選票力量維持一段很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夠有所突破。

要克服這些障礙，捨建立政黨之外別無他途。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反對政黨，尤其是面對國民黨這樣一個強勢的執政黨，必須具備：第一，具有權威的領導中心，第二，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能夠分析台灣內外局勢及其變化的趨勢，然後根據這一套理論，擬就行動綱領，以黨的力量逐步付諸實施。第三，正確地選擇支持黨的社會力量。

黨中央領導不當

如以上述三個標準衡量，民進黨顯然形式多於實質。按照現行黨章所呈現的結構，所有權力均集中於由十一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但這只是紙面上的權力而已，實質的領導權威必須從實際的行動中逐漸培養才能成形，尤其是以山頭林立的黨外為基礎的民進黨，如何謹慎而適當地運用領導權以建立其權威性，更是當務之急。

回顧民進黨成立以來所經歷的各種大小運



• 「六·一二」事件民進黨陷入國民黨的圈套。

動，可以知道，中常會運用其領導權，不是操之過急，就是失之保守，因此，成立將近一年來，中常會的領導權威，不但未有絲毫增進，反而陷入半癱瘓狀態。

要建立領導的權威性，必須選擇明確而有限度的目標，在內部取得共識的前提下，傾全力以達成，這是極平常的組織理論，當然也適用於在建黨初期的民進黨。罷選監委事件，目標明確而有限，可惜領導層未從建立共識方面下功夫，以致事敗垂成。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目標明確，行動的內容亦僅在激起台灣人民對此一事件的回憶，目標有其限度，但民進黨中央反而退居幕後，失去了培養領導權威的機會，令人費解。

而如五一九及六一二事件，反對制定國安法的目標雖極明確，但是其範圍廣泛，而且非民進黨的力量所能制止，以此為目標發動運動，徒然耗損人力，國安法仍如期通過

，民進黨發動的示威遊行反而遭反愛陣線的反制，致多名幹部官司纏身，成為國民黨壓迫民進黨就範的籌碼，無補於領導權威之建立。

因此，民進黨中央亟待抓住時機，選擇明確而可達成的行動目標，以培養其領導權威，然而在建立領導權威之同時，還須講究行動方向，這就牽涉到建構一套詮釋台灣內外局勢理論的問題。

理論架構尚待建構

嚴格來說，民進黨建黨迄今，建構理論的工作，尚未完成。眾所皆知，在黨外時代，運動的目標側重於如何開拓反對勢力的基本活動空間。換言之，其成就主要是表現於消極地破除國民黨所給予反對勢力發展的束縛，而不在於積極地以預備執政的姿態正面建構一套施政理論。



• 中智階級是
民進黨的骨
幹。

然而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當年黨外所挑戰的各種禁忌，如戒嚴、黨禁、箝制言論、國會的代表性等，除了後一項之外，其他都已逐步鬆動及解體，黨外階段性的任務初步完成，台灣政治體系正式進入政黨競爭的時代，如何形成一套解釋台灣內外局勢的理論便成爲民進黨所面臨的一項新的挑戰。

基本綱領欠明確

要而言之，建構一套完整的理論必須考慮下列要素：第一，這個黨主要是以社會那一群人爲主體力量（姑且稱爲主體群）。第二，它所要團結的對象是那一群人（姑且稱爲團結群），第三，根據主體群的要求制定長遠目標及爲達到該目標的階段性目標。

從民進黨現行基本及行動綱領來看，我們看不出它的主體群及團結群之所在，也沒有長程及近程階段性的目標。

傳統黨外是以中智階級爲其骨幹力量及號召對象，以勞工爲團結對象，依靠大量勞工「賭爛票」，才能在歷次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卅的選票。民進黨繼承黨外而來，但黨綱並未把支持黨外的主體群及團結群的經濟、政治及社會

要求予以明確化，反而滲入一些與黨外主體群格格不入的社會主義概念，而成爲一種包含互相矛盾理念的混合體。

猶疑於大中小企業之間

譬如，基本綱領乙項第一款揭示「尊重私有財產」，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的基本出發點，由是而衍化爲政府不得干涉或最少干涉的自由放任經濟原則。但是在同項第二、第四款卻賦予政府以促進充分就業及扶助中小企業的重大任務，顯然與自由經濟格格不入。

更有進者，第四款既然要扶助中小企業，但在第七款又規定公營事業開放民營，在現實上只有大企業主有能力承接開放民營的公營事業，如此主張顯然會達到扶助大企業的效果，這與扶助中小企業顯然互相矛盾。

再者，第三款所說促進充分就業，實際上只有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才有此構想，在資本主義體系裏，儘管各種學說不同，但卻容忍一定程度的失業率，無意做到充分就業，也不可能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

再就基本綱領兩項來說，其所揭示的「公

平開放的福利社會」原則，在政治上很難與乙項同時並行。

福利國家代價高

該項第二、第三及第四款所主張的「追求福利國家更高境界」、「實現全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勞工保護標準」等，在在需要龐大的稅收支持。但是稅金從那裏籌措呢？通常的情形當然是企業的大小及所得的高低與繳稅的能力成正比，而要納稅能力高者多納稅，低者少納稅或不納稅，這是政治問題。如果代表納稅能力強的一方掌握決策權力，他們不可能制定出高所得高納稅比例之類自打嘴吧的稅率，反之，代表納稅能力低的一方掌握制定稅率的權力，才有可能以課重稅的方式，籌措福利社會所必須的經費。

任何民主政黨不能同時執行上述兩種不同的稅率政策。歐洲國家但凡工黨或社會黨上台執政，其社會福利項目總會增加，而相對地，稅負也會加重。反之，若保守政黨上台，總是以減稅及拆除福利制度為號召。民進黨綱要同時兼顧中小企業及建立福利國家制度，到了一定程度，必定會發現處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窘狀。

民進黨主席江鵬堅七月初訪問美國，在公開場合說，民進黨將在五到十年內上台執政。這固然是一種鼓舞士氣的說法，但也顯示民進黨領導層具有執政的雄圖。

若此，則民進黨必須先在台灣社會中找到定位，如果仍繼承黨外所原有的社會力，則現行黨綱必須大幅修改，否則執政遙遙無期。

中智階級的基本綱領

民進黨成立即將滿一年，但迄未發表一篇對台灣時局的全盤性政策宣言，這比六十年前的台灣民衆黨隨時針對時局以宣言的方式提出看法還不如。唯有政策性宣言定案之後，才能根據宣言制定切合時局的基本綱領與行動綱領。

假使民進黨以包括中小企業的中智階級為

其主體群，我們為民進黨借箸代籌，這篇尚未問世的政策宣言至少應為下列重大問題之解決提出理論性的詮釋：

一、中小企業的經營方式是否優於大企業？

按照南韓、日本、美國的經驗，都是朝向以大企業為主的經營方式，中小企業在這些國家已趨於式微。民進黨在台灣要反其道而行，扶助中小企業，必須在理論上證明這種經營方式切合台灣需要並能在國際上與先進及實施大企業制的同類型國家展開競爭。

二、開拓中小企業的外銷市場問題。

對外貿易是台灣經濟的生命線，而市場的開拓及保有則是維繫生命線之首圖。但作為台灣產品主要市場的美、日、歐洲等國，由於保護主義政策造成關卡重重，對台灣中小企業威脅極大。

國民黨的解決方式是以派出採購團做政策性採購的方式討好美國，冀求台灣產品免於設限，這不是長久之計。

民進黨應能注意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台灣產品潛在替代市場，民進黨若能在這方面下功夫，提出一套開發這些國家市場的理論及行動綱領，當能博取中小企業的衷心支持。

三、根據開拓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需要設計一套新的外交政策綱領，當比現行基本綱領戊項第四款「終止台海兩岸對抗」的說法來得有號召力，也比行動綱領第一、第三項：與海峽對岸進行所謂和平競爭及重返聯合國來得實際。

四、根據前三項綱領，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結構應作如何的因應調整也是民進黨必須解決的理論問題。

結語

基本綱領中甲項「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是任何現代民主國家所必須有的準則，予以維持，再加上根據前述四原則制定的基本綱領，則民進黨必能確切掌握其主體群，進而號召全民支持，此時再來談執政的時間表，就腳踏實地多了。

◎人 權◎

火燒情更熱

■夏嬰

——記六月下旬火燒島政治大絕食及 “火燒島人權宣言”的來龍去脈

抗議「國安法草案」太過霸道

在本次立法院延長會期開始審議「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時，火燒島國防監獄內的政治受難人的不安與忿懣也達到空前高潮。鑑於去年十二月政府所公佈的國安法草案太過霸道，不只扼殺了解嚴效力，未回歸憲法，更斷絕了許多軍事審判冤錯假案受害者的上訴或再審權利。尤其可愛的是此法對於海峽兩岸中國人民和平整合的羈絆，對台灣內部民主改革的限制與對人民憲法權利之公然桎梏均有長遠不利的影響，一些在監的政治犯不願眼睜睜地看著此一惡法強行通過，便緊鑼密鼓地策劃了一次火燒島開監以來最悲壯的政治大絕食。

六月四日王幸男母親過世，六月八日陳菊和王幸男太太來火燒島，準備絕食的政治犯預料王幸男應可返家奔喪，可藉此管道傳遞消息。等到國安法草案在立法院內政、國防、司法三委員會連席會議強行一讀通過時，原先觀望，以為該草案第二條、第九條可能會“搓圓仔湯”解決的人也失望了。政治犯的情緒更為奮激。

六月十三日王幸男突然返家參加其母告別式，恰巧當晚的電視新聞也報導了立法院內國安法的爭辯及國民黨的無理堅持。鄭文王看完電視就破口大罵，表示非要抗議不可。

六月十四日賴明烈、王幸男、劉國基、鄭文王、黃世梗等在閱報室商談，乃原則性決定絕食一週。鄭文王主張乾脆不要飲水以加強壓力，但因顧及參與者的動員能力，改為“只喝水，不吃任何食物”而定案，隨後，劉國基請張化民通知在三區被隔離的白雅燦。

人權宣言、三易其稿

他們本來準備在國安法二讀時開始絕食至三讀通過為止，拖多久就幹多久，但因要等王幸男太太再來接見以帶出消息，於是等。劉國基開始起草“火燒島人權宣言”，表達他們共同的政治見解。草稿完成先送去二區給王幸男、賴明烈參考，另份複本送去三區給張化民、白雅燦參考，再回收整理修訂稿，然後送交各人提供增刪意見，終於在6月22日定稿。“宣言”總共有九人簽署，依入獄時間先後簽字。另外有九人也口頭贊同，但因恐監方報復不敢簽，特准保留至獲得“沒有恐懼的自由”時再簽。

絕食行動因王幸男太太遲遲未來而延期，劉國基乃建議最慢在六月廿四起行動。恰巧六月廿三日立法院開快車，二讀三讀一天通過。也恰巧六月廿二日王幸男太太就來接見了，在六月廿三日第二次特別接見時王幸男將紙條偷傳給太太而完成了對外通訊工作。六月廿四日凌晨行動開始，共有十三人參加，乃當時全監

受難人之半數。

絕食一天者：張化民、蕭棟欽。

絕食二天者：林崇曉、徐叢宏。

絕食七天者：白雅燦、王幸男、賴明烈、鄭文王、莊安田、顏正惠、劉國基、黃世梗、郭祥興。

六月廿五日開始監方出動副分隊長、分隊長、隊長、輔導長、保防官、感訓官、監獄官、主任、副監獄長、監獄長等數百人次威脅、利誘，搞車輪大戰，企圖瓦解絕食陣營，但全部無效，在有關政治與法律觀點之理論鬥爭過程中，監方節節敗退。

堅持到底，無人屈服

六月廿八日監獄長到劉國基房間長談3小時，兩眼通紅，因他已被上級“撤職”，六月廿九日他去王幸男房間承認“打敗了！”但要問究竟如何把消息傳出去的？（因接見時王幸男並未用口說此事也）他們在個人的絕食聲明書中均有各種大同小異的訴求，鄭文王、莊安

田、顏正惠、郭祥興等主要是要求司法上訴權。他們在海峽兩岸做藥材生意竟被判叛亂罪，顯然是冤錯假案。其他人均有政治性見解而與國民黨平行乃至對立者，可詳見各人所提聲明書。

在絕食第三天他們知悉消息可能已上自立晚報，因有些當說客的官兵溜了口風，但據說國防部發言人說這是民進黨造謠。

從絕食第三天起，他們每人房間內都有一位憲兵當班，三餐都故意在他們房內吃，監方又特別每餐加菜，甚至給他們或護士吃牛肉麵當宵夜，並命令他們要在絕食者面前吃，副分隊長對劉國基說：“要利用你們的原始食慾逼你們屈服！”

但絕食七天的那九條好漢沒有任何人屈服！火燒島上的最後一批政治犯並沒交白卷，在國安法審議期間他們印證了保羅的一句話：“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了，那當守的道我也守住了！”

火燒島人權宣言

■起草人 劉國基

6月24日綠島的9位政治犯，聯合著名發表了「火燒島人權宣言」，消息見報後，國防部發言人旋即否認。本刊特將「宣言」全文刊佈。

起草人報告

台灣地區人民的經濟生活漸入小康階段之後，政治發展也面臨了脫胎換骨的境界；更多的自由與人權、更落實的民主與法治是大家奮鬥的目標；而理性的溝通與寬容代替暴力的壓制與反抗，應是政府和人民共遵之原則。如何以和平方式促進台灣的政治改革，如何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想必是海內外關心台灣現住民權益者討論不休的話題。

我們一群關心上述問題的政治受難人，在火燒島國防監獄酷熱的押房內焦急地探索、激情地思辯可行的解決方案。在顧慮到國際與國內各種政治和法律的現實條件下，我們於是有了這份「火燒島人權宣言」的簽署，宣言內容先由本人起草，再交由白雅燦、王幸男、賴明烈、張化民、黃世梗、鄭文王與徐叢宏各位先生提供刪改補充意見之後整理完成，三讀通過。

現在特將本宣言呈交監方，請代為影印十五份郵寄左列各單位，其費用由本人負擔為荷。謝謝！

(一)國民黨、民進黨、青年黨、民社黨各中央黨部。

(二)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台灣時報、自立晚報、民衆日報各報社。

(三)世界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黨外編聯會及關懷中心等單位。

火燒島人權宣言

我們，火燒島上的政治受難人，共同關切台灣地區的人權狀況與政治局勢，誠摯地呼籲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當局放棄制訂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利用解嚴的神聖時刻，破除所有民主障礙回歸憲法。本諸“向歷史交待、向人民負責”的開闊胸襟，全心全力完成下列各條建議，以落實人權具體內容：

(一)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恢復平時憲政，揚棄一切不合時宜的非常時期法令與特別刑法。

(二)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一律以台灣地區合格公民，按直接、普遍、公開方式投票圈選。廢除職業代表制，保留少數民族、婦女同胞及大陸省民的保障名額，但其總數不得超過全部應選名額的五分之一。

(三)改選後的國民大會應即選舉下屆總統、副總統，然後立刻進行修憲活動。在暫時接受“分裂國家”的現狀基礎上，起草制訂國家基本法，在基本法序言中宣示將來追求民族的和平統一，但現階段整合初期，海峽東岸中國人民採取“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之前瞻性積極立場，任何影響台灣現住民權益的法律文件，台灣人民應有複決權利，同時台灣人民應可創制具有拘束力的相關法律確保自身安全，並規範軍隊、憲兵、警察、特務等力量之行使條件。

(四)除刑法有關條文外，人民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活動不受任何強制性的意識型態約束——因為台灣人民有權建立一個多元價值的、多重

利益組合的開放社會。人民不受性別、宗教、種族、階級或黨派的歧視，一律平等。

(五)台灣地區向世界各國人民開放入境，台灣人民也可前往世界任何地區。在此「出入境完全自由」的原則下，流亡海外的台灣同胞可以無條件進出故鄉，而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三通四流」自然達成。

(六)有關二二八事件與長期戒嚴下冤、錯、假案的受害人或其家屬有權要求政府公佈真相並得以上訴平反，凡無辜受害者，不論省籍，均應依法從寬賠償或撫卹。政府應由法官及民間律師團，按黨派比例均等原則，合組一調查委員會審議處理。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受軍法審判之一般刑事犯正服刑中的應准其上訴或抗告，至於涉及懲治叛亂條例判決確定者，不論是否執行完畢，均應予以特赦及復權。

(七)原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人民之權利，內容相當周延，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中有關國民經濟、社會安全及教育文化等方面也合乎世界進步潮流，因此可在國家基本法內予以保留，以實現人民的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等。

蔣經國先生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但我們相信宇宙間唯一不變的可能是人類追求真、善、美的那份執著。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終將解除，我們即成為國民政府在台實施軍事統治下的最後一批政治犯。不論是為了追求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抑或是為了探索台灣的前途與未來中國的統一，我們都付出了自己的心力和熱情。長期禁錮在這悶熱狹隘的火燒島上，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思念那“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以及島上誠懇勤奮的鄉親們——我們的入獄，希望能為台灣人民帶來建設性的貢獻。我們樂意追隨古今中外歷遭迫害的人權鬥士，用血和淚來灌溉民主的幼苗。我們從不猶疑地扛起人權的十字架，無畏無悔地邁向台灣的未來……如果自由之火不滅，如果民主之花必開，我們一定很快回去。啊！美麗的台灣！心愛的故鄉！

以下各政治受難人簽名順序依入獄時間先後

起草人附註：另有九人因恐監方報復不敢簽署但已口頭贊同本宣言。

簽名人

- 白雅燦（1975年10月22日入獄）
- 王幸男（1977年1月7日入獄）
- 賴明烈（1977年11月1日入獄）
- 劉國基（1977年11月2日入獄）
- 張化民（1979年9月4日入獄）
- 黃世梗（1983年10月18日入獄）
- 鄭文王（1984年3月6日入獄）

絕食備忘錄

■劉國基

因1977年「戴華光案」而繫獄十年的劉國基，在獄中進行了多次的絕食抗議行動，這裏選刊的幾份備忘錄，表露了他對中國統一的热切期待與積極支持難友施明德的人道精神，從中也可見出政治犯監獄中，主管人員虐待受刑人的違法濫權行為。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劉國基在綠島官兵餐廳前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五日
于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備忘錄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在司法判決方面能夠自詡絕對公正廉明。

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在覺悟到此方面的必然錯誤後，依然執迷不悟，依然拒絕各種可能的救濟途徑，以紓解受害人及其親友之痛苦，而能長治久安，大享「好官我自為之，笑罵由他」者。

現在，我們不想追究特務機關與軍事法庭共謀推翻「中華民國憲法」、枉顧「刑事訴訟法」及「軍事審判法」造成累累冤獄，其對政府威信與社會治安所造成的顛覆效果等等。我們只想在「既成事實」的前提下，希望在本監服務的軍、政幹部，本其「愛黨愛國」的精神和「人道主義」的良知，向上級反應「冤錯假

案」受刑人的情況，迅速解決國民政府身上的毒瘤，以免病入膏肓，親痛仇快。我們也相信英明仁慈的蔣總統 經國先生樂意平反及改善受苦受難的綠島受刑人之案情及生活。（他當然不希望受到蒙蔽）

- 一、對任何未獲合法拘、訊、審、判之冤、錯、假案受害者，應成立專業法庭，完全依照「刑事訴訟法」及「軍事審判法」重新認定，儘量予以平反，其確為冤獄者應予賠償復權。該專業法庭需由司法院選任合格法官組成并公開審判。
- 二、所有受刑人有權接受「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處遇，不應受到差別或歧視，何況並無明文規定政治犯不得假釋之但書。
- 三、對已服刑達三十年之無期徒刑受刑人，且民國六〇、六一、六四三次減刑均無緣獲赦者，應立即無條件釋放，并輔導其成家立業。
- 四、受刑人之醫療、保健、娛樂等應特別加強，不得以行政命令干涉醫學治療，有重病及精神失常者應送專門醫院診治。
- 五、凡未經有關單位查禁之各種中外文合法出版物，無論報紙、雜誌或書刊均應允許受刑人購閱，政戰系統之檢查人員不得託辭「內容不妥」或「檢查不易」拒絕，而應引述該查禁物所觸犯之法條。（書刊申購亦不得以「免議」推拖）

絕食聲明書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大燒島政治犯監獄

- 一、嚴重關切本監難友施明德所受不公平待遇，其精神與肉體均面臨崩潰邊緣。
- 二、相信其悲慘待遇不應由本監許監獄長單獨負完全法律責任，但本監有義務反應上級改善此種不近情理的違法狀態。
- 三、本人遵照良心命令，特地絕食乙天，提醒監方至少：（一）替施裝配假牙，使能進食，（二）結束施與神經病、精神病者之共區隔離，讓施得與一般受刑人同等待遇。

上呈

監獄長

絕食聲明書

鑑於台灣地區立法委員改選在即，少數候選人提倡「分離主義」謬論，遂令憂時愛國之士感慨忿怒，故特絕食抗議並聲明如下：

- 一、台灣人民之命運乃中國人民命運之一部份，台灣之前途也與中國之強大統一不可分離。不論就血緣、地緣、文化傳統，目前台灣地區之居民均為大中華民族神聖家庭內之同胞兄弟。
- 二、「台灣獨立」乃國際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領土之餘毒，乃國際資本主義者迷惑台灣人民之幻覺。「台獨運動」乃缺乏歷史知識與世界眼光之自殺行為，只會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與死亡。
- 三、我們期待「血濃於水」之民族情感有助於溫和地解決台灣海峽之內戰對峙。我們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於「大一統中國」之政治與經濟制度之辯論能以「軍事手段」之外的方法解決。事實上，世界「新殖民主義者」鼓動台灣同胞妄搞分離主義，正緊急提醒海峽兩岸之中國執政者加速民族統一，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以免骨肉相殘，浪費了可貴的人力物力，大傷民族元氣。
- 四、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任何內容之台灣獨立或割據。

呈

監獄長層轉
中國國民黨主席 蔣經國先生

絕食聲明書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大燒島

- 一、茲聲明本人自本日起絕食一週，嚴重關切本監難友施明德之生命安全，他已絕食十天，迄未獲得應有之任何答覆與照料。
- 二、本人無意過問施明德其絕食之動機或目的，本人乃基於人道立場以及血濃於水之同胞愛做此關懷。

呈

監獄長

• 1985年，
劉國基父喪，
經絕食七天及監內外
朋友的努力，始得返家
奔喪，彼時
手上仍戴著
手銬。



絕食聲明書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
於火燒島政治犯監獄

- 一茲聲明本人五月一日起絕食七天，以抗議本監違法濫用戒具、亂關禁閉、意圖製造恐怖活動；事後且未依法追究行政過失及追訴刑事責任。
- 二為恐監方本次再重施故技，故先鄭重聲明本人絕不願被隔離去醫務所，本人本次絕食期間絕不接受任何醫療；本人絕對抗拒任何違法私刑或濫用戒具，除正當防衛之外，並依法進行逮捕「現行犯」送交本監駐監檢察官一一為捍衛民主法治，不惜一死。本監若施用暴力，本人將無限期拒飲開水至死。
- 三副本抄送各區關懷之難友，為歷史做見證。
- 四「抗議內容」另見「絕食報告」。
- 五本人另備遺囑一式數份，分交妥當人士之處，若意外死亡，可由檢察官會同家屬一併索閱，屆時自然有人提出。
- 六特此聲明。

絕食報告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
於火燒島政治犯監獄

一四月十日因嚴重關切本監難友施明德先生之性命危險而絕食七天以呼籲執政之台北當局重視此一事件，以免鬧出人命而「親痛仇快

」。 (本人向來政治立場乃「誓死反對任何形式與任何內容之台灣獨立或割據」，此在列次絕食報告中均曾再三聲明，並「號召海峽兩岸之執政黨超越個別政黨和個別政客之既得利益」，勇敢誠實地謀求「台灣問題」之和平解決，促進民族統一大業，避免全國同胞又在內戰中毫無意義地流血犧牲一一此乃全世界各地中華民族兒女之共同願望，也是我台灣同胞自甲午戰爭割台至對日抗戰光復後之一貫立場與心聲。)

二本人雖反對施某之政治立場，但基於「血濃於水」之同胞愛與民族感情，依然關懷其生命安全。希望他在痛定思痛之後，放棄各種化粧的台獨謬論，而回歸中華民族懷抱一一斯乃我慨然為其絕食之真正旨意。

三不料本監主管却不問原由，公然違法濫權，在本人「和平絕食祈願」聲明一始，即上腳鐐、關禁閉室，並隔離監禁。甚至在執行過程，且由科長、隊長、副隊長帶了十餘位戒護士準備暴力私刑。幸好本人發揮「和平抗議者」之大無畏精神，冷靜溫和寬容地接受一切，才未造成監方各級主管之進一步更嚴重錯誤，否則在國民黨內政外交連串措敗的局面之下，又多一條「劉國基命案」，不知道執政當局能否不像「汪希苓情報局長共同



● 劉國基在押房內

殺人罪」而撤辦本監各級主管乎？

四本監主管亦知此一行爲乃違法濫權，故於四月十日當晚十時解放腳鐐，搬出禁閉室，可惜改過向善仍不徹底，却仍將本人隔離拘禁於「病監」，更向押區各難友說說欺騙，說什麼乃係我本人志願留在彼處，又說什麼我有病，可以加強照顧，更荒謬者乃輔導長竟說「留在那邊可以加強劉國基的絕食意志……」。（註：人證至少有三人，必要時可對質。）

五按「監獄行刑法」規定只有暴動、打架等嚴重破壞秩序者才能施用戒具或收容於鎮靜室。至於疾病隔離以「法定傳染病」爲限。本人既無任何傳染病，或未因精神疾患而干擾押房安寧，監方絕無理由動用戒具及鎮靜室。而在所謂「加強照料」之名義下，醫務人員卻從未主動親臨視診，只有在我三番兩次要求下勉強過來看病，何況所處方之醫藥均由我所建議，且有打折扣，未全按本人需求。（註：此方面之過程，四組戒護人員均悉。）更何況原先在鎮靜室中頭昏耳鳴心跳極速，吼叫敲門，無人理睬，真不知監方所謂「加強照料」是否「加強修理」之同義語。我更要追問何以其他人絕食不需「加強照料」，我本人前幾次絕食亦不需「加強照料」

？

六聽監方各級主管口氣，此番故意整我乃「意圖報復」。我不懂身爲公務人員有何私恩私怨而需要動用私刑報復？按公務人員一切作爲均需遵重憲法、法律及因此而派生之上級行政命令，否則即爲「私人行爲」，理應自負責任。上級長官應依職權施予行政處分，司法單位亦應就其違法濫權部份，主動提起公訴——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七在醫務所隔離期間，我曾向輔導長、分隊長、副分隊長及副監獄長當面表示，願意息事寧人、止痛療傷，不願依法追訴此一事件，但監方關起門來開會應確實檢討，誰錯誰對，應予處分申戒。這在我乃一本政治犯之高貴良心與胸懷，寬宏大量，饒恕無知與愚行，不料迄今已逾十天，監方主管尚未向本當事人交待，究竟違法失職人員做何處分亦不得而知，本監駐監之監察官亦未與問，代表國防部軍法局駐監之副監獄長，職務上可代理軍事檢察官，亦未依法查辦，怠忽職守，蔑視法令莫此爲甚。

八按個人道德修養，有此度量原諒這次暴行，但公務人員犯法乃公訴罪，非個人所能私了，本監代理檢察官有義務起訴，本人可以放棄民事責任之賠償索求，但揭發罪行，檢舉犯罪人（現行犯）乃國民應盡之義務，權利可以放棄，義務不容規避。

九本人並不一定要各級違法失職人員都送軍法審判，但至少本監最高主管應依各級人員涉案之深淺予以處分，追究行政責任，尤其「始作俑者」——首先倡議上戒具之暴徒，又使執政黨「恐怖活動」出現，更應嚴加制裁，以謝國人。

十本人自五月一日起絕食七天，督促本監主管確實依法究訴，否則勢必被逼提出「軍法訴狀」，並即刻要求家屬另提「司法訴訟」，請本監職責攸關人員依法「加強照料」爲荷。

呈

監獄長

◎海外傳真◎

暴力和哭泣之後的 反省與團結

7月初，台灣原住民詩人莫那能至美國為「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募款，並以「湯英伸案」為例向海外同胞報告了台灣原住民的苦境，獲得熱烈的迴響。



- 湯英伸之死隱含了台灣原住民的深沉悲苦。

近年在台灣文壇崛起而聞名海內外的台灣原住民詩人莫那能，應美國「台灣民主支援會」之邀參加今年的夏令營，在夏令營所舉辦的「莫那能之夜」，為喚起海外同胞關心原住民問題，並為「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進行募款，而舉辦了一場由他一人擔任演講、演唱、朗誦詩歌的別開生面的活動。「民主支援會」為了辦好這場活動特別請來了長期關心台灣原住民問題，並和莫那能長期並肩作戰而有著深厚情誼的蘇慶黎小姐來主持這個晚會。

蘇慶黎推介，拉開序幕

晚會由蘇慶黎推介莫那能拉開序幕。她說莫那能的詩歌以熱烈明朗的風格，及深刻雋永的內涵，徹底揭露和控訴台灣原住民被壓迫的事實，並表達了他們追求光明、尊嚴的強烈願望，及堅決鬥爭的意志；因此蘇小姐推崇莫那能不只以他的行動成為台灣原住民運動的先驅，而且他所創作的詩已成了喚醒族人、洗滌台灣社會心靈的珍貴文學；他是台灣原住民的代言人，他的詩歌的出現是台灣原住民爭取人權運動的里程碑。

高亢歌喉唱出秀麗原野

在蘇小姐推介之後，莫那能即以台灣原住民特有的明亮高亢的歌喉唱出卑南族的民謠——美麗的稻穗，來展開他的演說活動。這首歌曲將聽眾帶到那遙遠的寶島上雄壯秀麗的高山原野，也讓人感受到台灣原住民在美麗豐富的大自然熏陶下所具有的樂觀、質樸的心靈。但是唱畢這首美麗而歡樂的歌曲之後，莫那能立即將觀眾拉回到殘酷的現實來——他以最近發生的原住民知青湯英伸殺人案為引言，道出台灣原住民被踐踏在社會最底層，而輾轉不得超脫的悲慘處境。他說，對於湯英伸的死，身為同樣是原住民的他，感覺的不是悲哀而是抱歉，因為他早已預期到在極端的壓迫下，被壓迫的台灣原住民遲早會以暴力來加以反抗；他曾和湯英伸一樣經歷過職業介紹所及各種小老板的欺騙和壓榨。在許多時候，當他的尊嚴和肉體受到不堪忍受的壓迫時，他也曾起過「與汝偕

亡」的念頭，但幸運地他沒有讓他的衝動變成事實，因此他僥倖地活下來，而不必像湯英伸一樣，在以暴力反抗壓迫之後，以自身的生命付出代價。莫那能說，也許如果他或其他的族人先湯英伸付出這個代價，也許湯英伸將不必付出他美麗青春的生命，為此他深深感到抱歉。

面對衝突期待社會反省

做為詩人和鬥士的莫那能在冷靜地預期，面對衝突和廝殺之後，他仍然熱烈地期待，台灣這個社會能夠透過反省，重新團結建立一個有尊嚴而和諧的社會。講到此，他即演唱一首在湯英伸被執行槍斃之後所做的一首詩歌：「在一陣槍聲之後，在一陣哭泣之後，讓我們一起像春天的蝴蝶一樣飛舞……。」就這樣，莫那能在演講當中，隨著主題的展開，時而夾帶演唱和朗誦相關的歌曲和詩歌。於是嚴肅的社會性講題，在詩和歌的同時演出下，知性和感性交相運用，使得原住民的問題得以劇力萬鈞地展開，也使得這個複雜萬端的問題，它的廣泛性和深刻面得到全面的關照。

這場美國華人社區難得一見的活動深深吸引和感動了在場的觀眾；當莫那能在台上因為講到悲傷和憤怒之處不能自己而淚流滿面時，台下許多觀眾也為之一灑同情之淚。

氣氛熱烈感人

莫那能演講演唱完畢，隨即由蘇慶黎小姐主持為「原權會」的募款義賣活動，由於受到前場熱烈感人氣氛的影響，義賣活動也在極為興奮熱烈的氣氛下進行著，許多聽眾紛紛以義購行動來表達他們對台灣原住民爭取權利運動的支持，而為晚會帶來再一次的高潮。晚會最後在莫那能帶領聽眾合唱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創作的「為什麼」之後結束。莫那能為了進一步宣揚原住民運動，已應紐約地區「台灣社會研究社」之邀請，將於七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專辦另一場演講、演唱會。



• 沒有美國力量的干預，國民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一、世界體系

台灣、南韓被納入世界體系，肇始於十九世紀末期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為止，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韓國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時間則自1910年到1945年。就在這段時期，這兩個地區的經濟一起被編入了以日本帝國為核心的區域性分工體系。殖民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提高農業的生產量，工業發展並不受重視或鼓勵。拿台灣、南韓的殖民地經驗與拉丁美洲、非洲作比較，最大的不同是：在拉丁美洲及非洲，主要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集中在殖民資本圈定的農作區，以外的地區主要是糧食農作生產。但是，在台灣及南韓，經濟剩餘的榨取不是透過大資本家，而是經由殖民政府官僚來執行與完成的。換言之，經濟剩餘的榨取對象不是殖民資本在那些小型出口經濟農作區所雇用的農業工人，而是無數零細化的小農及佃農。這種剩餘榨取的模式似乎能夠緩和殖民經濟結構上常見的斷裂現象。

爲了不斷提高經濟剩餘的絕對量，日本殖民政府在農業部門引進了不少科學技術，同時大量投資以改善基礎結構，包括引進改良的肥料及新品種，更進步的灌溉系統等等。爲了軍事上的用途，以及有效率的輸送榨取來的剩餘

◎世界體系◎

世界體系、

——台灣與

■林新莊譯

■Hagen Koo著

從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國土的分裂、軍事的激進化，台灣、南韓經歷了極為類似的歷史發展。但必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過去、面對未來。

本文一反過去片面強調比較利益的經濟分析方法，提出區社會政治的力量、中心—邊陲的關係結構，力求對附庸發
細閱讀。

本文譯自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編按

，他們還建築鐵道，並大力改善交通運輸系統。到了1930年代末期，日本在台灣及南韓的殖民經濟政策開始有了轉變。與戰爭有關的工業物資的生產，快速增加。雖然這項工業化政策由於日本戰敗而中止，但一般相信，日本殖民政權在上述兩個地區，實際上已爲後來的工業化留下了堅實的基礎。

美蘇對抗的冷戰體制， 塑造了台、韓的社會構造

二次大戰結束，朝鮮半島38度線以南成立了南韓政府，台灣則成爲中華民國政府的所在地。這兩個國家又重新被編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國家由過去的日本改換爲美國。

美國之所以捲入韓國事務，主要是爲了對

階級與國家

南韓的比較分析

化統治、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附庸發展的中進國，乃至民主運動者之間又有若干差異存在。針對這兩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作比較分析，

家、社會階級及世界體系三者之間交互作用的分析架構，同時考慮了展的機制，作整體的、動態性的理解，值得關心台灣發展問題的人仔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1987,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幕前幕後，美國都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抗蘇聯在遠東勢力的擴張。在1940年代，美國對韓國經濟並不感興趣，因為當時的韓國物質窮困，資源缺乏，鮮有利益可圖。戰後，取得獨立的南韓被美國軍事管轄了三年。美軍監管時期的主要成就是摧毀了當地的共黨及左翼勢力，建立了一個由李承晚領導的極度保守、反共的政府，以及新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同時，爲了緩和民衆強烈的不滿情緒，以建立一個最起碼的社會秩序，在美國軍管政府的壓力下，南韓開始實施土地改革。雖然這項改革措施要到朴正熙上台之後才完成，但對南韓的階級結構，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當國民黨政權剛撤退到台灣的時候，美國並沒有協助防衛的興趣。但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在遠東的戰略隨之改變，華盛頓變得更積極地涉入台灣事務。沒有美國積極的支持，一般相信，中華民國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因此，當我們討論台灣、南韓在世界體系中的角色時，首先必須考慮的，不是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位置，而是它們在全球政治、軍事對抗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兩個國家多少是美國爲了防止共黨革命在遠東地區擴散而採取強有力的軍事干預底下，創造出來的產物。因此，與其說是國際資本在這兩個經濟地區的直接經濟利益，還不如說是兩個超級強權對抗下的地緣政治，塑造了這兩個社會內部的社會構造。

先被納入世界政治體系， 再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做爲反共鬥爭的堡壘，台灣及南韓得到了美國大量的經濟、軍事援助。從1953年到1958年，六年之間南韓每年平均接受了2億7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相當於每一個韓國人得到12美元左右的美援。這個金額佔南韓國民生產毛額的15%左右。台灣在1951到1965的15年之間，共接受了15億美援，平均每年大約是一億美元，相當於每人得到6美元。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軍事援助金額大約是經濟援助的兩倍，遠超過其他國家或地區。在美國強

力援助底下，李承晚及蔣介石得以維持基本的社會、經濟秩序，並且能夠在基礎結構，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進行實質的投資。

因此，台灣及南韓是先政治上被編入了世界體系，並且是在五〇年代，經歷了不太成功的進口替代工業的實驗之後，在60年代初期改採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策略，才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不過，60年代經濟發展策略的轉變，本身也有它經濟上的因素及前提。因爲美國經濟援助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在這兩個地區奠下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在這當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個機構運用它可能的資源及影響力致力於改善私人企業的投資環境，並推動私人企業的成長。沒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影響與積極干預，私人企業部門就不會成爲推動台灣經濟成長的最有力來源。「國際開發總署」爲了不斷地向台灣及南韓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減少對經濟的控制，並限制軍事國防經費，經濟援助的額度就成爲它運用的一個手段。由於50年代末期，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明顯地失敗，而且美援逐步削減，迫使兩國政府積極尋找出路。1958年，台灣開始實施一系列主要的經濟政策改革計畫，包括獎勵投資條例的制定、多元匯率制度改爲單一匯率、放鬆貿易及外匯管制、並修改繁複的商業法規，加上後來的一些政策改革，大大地改善了外國投資的環境，因此從60年代初期，外銷輸出開始急速增加。

南韓由於內部政治不穩定，因此要到1962年才開始實施類似的經濟政策改革計畫。1960年4月，學生革命運動推翻了李承晚政權，第一次以民主的方式成立了共和國政府。但是由於張勉政權過於脆弱及短促，因此根本談不上任何重大的經濟成就。朴正熙在1961年5月發動軍事政變奪取了政權。朴正熙與李、張不同，他有強烈的意願想推動經濟發展。明顯地，他把經濟上良好的表現當作建立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手段。不過，朴正熙與李承晚的差別不僅僅是性格上的不同，更可能的是它反映了他們執政時期社會、政治環境的差異。如果說李

承晚時代的主要問題是政治性的，焦點在於政治權力的鞏固與民族國家的統一，那麼在朴正熙剛奪取政權之前的那個時期面臨的，主要是經濟性的問題。正如 David Cole 和 Princeton Lyman 指出的：「1950 年代中，經濟的重要性日益為人所認識，使得經濟發展成為 60 年代任何一個想獲得成功的政權必須面對的課題。」朴正熙上台不久，就開始大力推動一系列的改革。不過要到 1964 年，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策略才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礎。如同在台灣，「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及世界銀行也積極推動南韓制定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策略。

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 時機是重要關鍵

台灣及南韓走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的時間領先了大部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是在 70 年代才姍姍來遲地加入這一行列）。時機是很重要的關鍵。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正邁入高度繁榮的階段。核心國家渴望對外投資，歐市美元借貸便利、利率偏低，而且對第三世界國家工業製品少有貿易壁壘，也較少有其他擁有同樣充沛勞動力的開發中國家加入競爭。最後，越戰有助於兩國商業的發展。單就時機因素而言，我們很難想像台灣、南韓（也包括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的成功故事，還有可能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發生。如拉丁美洲依賴理論經濟學者法朗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說，這幾個國家在世界貿易的零合（Zero-sum）世界中的成功，排除了其他地區獲得同樣成功機會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將兩個世界體系區別開來：一個是建立在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與軍事對抗的國際政治體系，另一個是在全球資本積累主導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兩者緊密相扣在一起，但如美國歷史社會學者 Theda Skocpol 所主張的，把兩者分開有助於分析具體的社會—經濟轉型。

台灣及南韓的附庸性是先被編入了國際政治體系，然後才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界定他們的位置。在被整編的過程中，這兩個國家得到了若干利益。最主要的，由於他們在圍堵遠東地區共黨勢力上，具有戰略價值，因此在外國私人資本進行經濟滲透之前，他們都獲得了美國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當外國資本到來時，他們在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源方面早已奠立良好的基礎，而且經濟緊緊控制在政府當局手中。因此，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先被編入世界國家體系，使他們後來在經濟上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時候，緩和了不少緊張與痛苦。

二、階級結構

如果單以世界體系來說明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或低度發展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將流於過度簡化。世界體系只是透過它與內部力量的交互作用來影響經濟的變動。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台灣與南韓的階級結構，以及階級結構與世界體系、國家（State）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南韓現有的階級結構，有其實質的影響力。日本人的基本政策是發展一個榨取經濟剩餘的系統，這個系統就只建立在國家官僚機器的基礎上。對於當地既有的階級結構，他們只作輕微的改變或調整，然後再納入殖民政府的官僚系統之下加以控制。不過，日據時期，階級結構仍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雖然地主階級並沒有完全消失，但大地主階級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二、國家與階級間的關係重新作了調整。日本殖民統治以前的台灣及南韓，國家相對於農業上層階級而言是比較微弱的。但到了日據時期，國家官僚機器蛻變為凌駕在階級結構及整個社會之上的支配勢力。即使二次戰後，這兩個地區都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獨立，但這一模式依然持續，沒有太大改變。

土地改革改變了階級結構



● 全斗煥：從軍事集權到民主的過渡？

二次戰後，成功的土地改革使這兩個地區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變化。南韓在 1948 到 1950 年間開始實施土地改革計畫。由於李承晚政府是建立在舊地主階級的基礎上，在舊地主階級強力的抗拒下，南韓的土地改革並沒有像台灣或日本那樣成功。不過，仍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成就：據報告指出，70% 的可耕地被重新分配，二百萬農戶中超過一半以上分享到改革的利益。依其政府的規定，每一農戶擁有稻田的面積，不得超過三畝。就土地改革的整個效果而言，是摧毀了舊的大地主階級，並重建了一個以零細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村結構，因此也同時消除了鄉村地區政治不穩定的根源。1950 年爆發的韓戰終於徹底地瓦解了南韓階級結構中的舊式農業精英階層。隨著戰爭的結束，南韓轉變為一個貧窮，但具有高度流動性及均等化的社會。

在台灣，由於國民黨政權與島上的地主，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因此能夠推行遠為徹底的土地改革，台灣的農業改革從 1949 年的三七五減租開始，到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條例為止，經歷了三個步驟。當土地改革宣告大功告成的時候，舊有的大地主階級大部分已被瓦解。如同南韓，台灣也變成為一個零細化自耕農的社會。

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及南韓，另外一個共同的特色是都缺乏一個足以引人注目的買辦階級，在日據時期，許多台灣人及韓國人藉著他們與日本殖民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累積了不少財富。不過，他們是否真正構成一個強有力的買辦階級呢？這是令人懷疑的。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戰後，由於他們與母國資本已無法維持緊密的關係，因此他們的階級基礎已不復存在了。另外，戰後的第一個十年之間，美國介入台灣及南韓的事務，主要是政治上的考慮。因此，幾乎沒有什麼私人資本隨著進入這兩個地區，因此，新式的買辦階級也沒有產生的機會。美國對蔣、李政權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只是強化了國家（State）的地位，並且確保國家對經濟的宰制及支配的地位。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1960 年代，台灣及南韓進入經濟起飛的發展階段時，都有一個高度流動性的階級結構。既沒有舊農業上層階級，也缺乏買辦資本家。因此當這兩個國家走向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策略時，也就沒有遭遇有力的階級抗拒力量。當時，商業資本本位居主導地位，不過 60 年代期間，在國家的發展策略以及協助之下，很快地改變為工業資本。總而言之，隨著舊階級體系的破壞，以及戰爭、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造成了社會的崩解，台灣及南韓

很快地轉變為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社會。傳統的束縛力量，身份地位的封建意義大致上已消失殆盡，社會中小商人充斥，他們永不疲倦地尋求新的賺錢機會。所以，在這兩個社會裡頭，舊農業社會階級結構殘餘下來的抗拒變革的力量，十分薄弱，而且還儲備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以供利用。

不過，台灣與南韓在早期的階級經驗上，仍有重大的差異。與南韓政府不同的是，國民黨政權經歷過大陸時代農民革命的痛苦經驗。南韓雖然在1940年代同樣面臨了嚴重的農民問題，但連串的農民鬥爭並沒有導致成功的革命，或者造成南韓權力結構的大幅度轉變。明顯的，不同的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對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各別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朴正熙政權為了追求快速的經濟成長，似乎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蔣氏政權不太相同，他比較敏感，也比較關切物價的穩定與農村的發展。

南韓的工業化比台灣付出更高的成本

對朴正熙政權的經濟政策影響較大的政治運動是1960年代的學生革命運動。這一次暴力的政治運動結束了李承晚執掌了12年的政府。學生運動是屬於都市的，而且主要（雖然不是完全的）是中產階級性格的。這一歷史事件似乎只是更加強化朴正熙固執不移地追求驚人的經濟成長率的決心，甚至是要付出高通貨膨脹率的痛苦代價，同時有意忽視農村地區的發展。以台灣而言，農業提供了工業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但是在韓國，工業化的成果是以犧牲農業部門為代價的。整個看來，南韓工業化的過程所付出的成本，顯然要比台灣高。

台灣、南韓與拉丁美洲有一點相當不同。台灣、南韓開始進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之前，都沒有民粹運動成功的動員經驗。如果有任何這樣的運動發生的話，那就只有1940年代的一個短暫時期，當李氏及蔣氏政治權力尚未完全鞏固之前。這兩個國家對群眾暴動（南韓在1946年秋天爆發群眾暴動，台灣則是1947年的大屠殺）的殘酷鎮壓，造成了往後民衆的

政治冷感症。因此像拉丁美洲需要把被動員起來的群眾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或者需要去摧毀那些反抗性強烈的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台灣及南韓就不太有這種需要了。拉丁美洲的官僚—專權式政權是有這樣的一些政治條件作為它產生的結構性因素。不過，台灣及南韓的情況就不太相同。民衆被排除在政治活動的參與之外，已有長久的歷史，因此我們不能把這個因素與經濟上的附庸發展，作因果上的關聯。

三、國家 (state)

在台灣及南韓，世界體系與社會內部的階級結構共同地創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結構。戰後獨立之後，在政府重建的那一段動蕩時期，美國在1940及1950年代大量軍事、經濟援助，加上日本殖民政權遺留下來廣佈的警察機構，對政府權力的鞏固是十分重要的。殖民時期大地主階級趨於瓦解，及缺乏一個與殖民母國資本維持緊密關係的買辦階級，也使政府不受階級力量的干預，而具有較充分的自主性。另外一個可能具同樣重要性的因素是這兩個國家都具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官僚體系。

政治的分裂、與共黨長久的對抗，永遠給政府一個使用暴力與壓制的藉口。這些因素也導致過度的軍事化，並且經常維持一個龐大的情治安全系統。正如一位美國學者 Jon Halliday 指出的，台灣與南韓不只是軍事化的政權，也成了軍事化的社會。由於政府權力的最根本的基礎是建立在行政官僚及情治安全系統之上，因此，社會過度軍事化的結果，必然增強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量。

政府權力過度膨脹

就台灣及南韓而言，政府權力不只是相對地龐大，而且對經濟發展也採取主動干預的策略。南韓對經濟管制的緊密程度，在資本主義世界當中是數一數二的。私人企業部門的每一項重要投資幾乎都是由政府策劃、推動的。南韓的經濟發展也通常被界定為「政府領導的工

業化」。

政府透過了對銀行的控制，來管制金融資本的流通。它還控制了國外貸款的額度及用途，並且有檢查、監視跨國企業及其他投資活動的權力。它甚至對各別企業有關投資、生產、定價等決策，也有所干預。但是，南韓與其他經濟發展不如南韓的開發中國家的真正差別，不在於政府干預到了那一個層次，而是在於它執行經濟決策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南韓政府是一個強硬且有高度魄力的政府。

台灣的經濟計劃沒有南韓那麼走極端，不過，政府在經濟發展當中扮演的角色大抵是相同的。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擔任經紀人，把台灣的經濟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同時運用強大的影響力，將本地資本與國際資本結合起來。雖然國民黨政府沒有對私人企業進行直接控制，不過，它仍透過了關鍵工業部門的許多國營事業對經濟進行干預。

在南韓，對銀行的控制，以及與外國資本的特殊緊密關係是政府控制經濟的主要手段。由於它握有分配銀行低利信用貸款的絕對權力，政府隨時可以切斷任何一家企業的血管動脈。台灣的銀行在政府權力的強化上，並沒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銀行仍然是政府控制經濟的重要工具。台灣及南韓在金融體系的運用方式上有一些差異，比如說，南韓政府就比台灣對大型企業有更大的偏愛。不過，就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來看，這兩個國家基本上是很類似的，而且自1960年代到70年代，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蔣介石及朴正熙時代的台灣及南韓政府都被形容為強硬的政權。從階級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政府都享有充分的相對自主性，不受主導階級的干擾。不過，它們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不能單從它們具有的強大勢力或相對自主性來解釋。這兩個政府的一個共同點是它們都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意願。在南韓，朴正熙與李承晚在推動經濟成長的意願與決心上，極為不同。李承晚關切的主要是政治問題，朴正熙則把經濟發展列為第一優先。在台灣

，蔣介石自1950年代以來即集中全力搞經濟發展，大抵上，這種強烈的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心，都來自這兩個政權的領導人想增強其政治合法性的強烈慾望。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明顯地都認為經濟發展進而改善福利是鞏固其統治權力的最佳手段。

政府的另一個層面——官僚系統，在經濟發展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如許多外國觀察家經常指出的，台灣及南韓都擁有經過良好訓練、有效率、而且比較不腐化的官僚系統。科技官僚的核心包括受美國教育的經濟學者、美援管理委員會的行政官員、國際開發總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外國專家等。由於政府頂峯階層給予無條件的支持，這些科技官僚得以在一個非常有利的環境下設計一條邁向資本主義積累的大道。加上，這兩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政治、軍事地位，而且與共黨國家接壤，因此不論在台灣或南韓，都少有意識形態上的自由。結果是，政府官僚系統內部意識形態的一致，大為提高其運作的效率。

勞動關係體現了國家的階級性格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僅止於擬定經濟計劃或控制金融機構。產業勞動力的訓練與控制，其重要性絕不在前兩者之下。由於台灣及南韓的經濟所具有的比較有利的地方是擁有品質較高、工資又低廉的勞動力，因此，輸出導向兼勞力密集的工業化策略要獲得成功，就有賴於能夠維持低廉工資且有良好訓練的勞動力。為保證這種有利的條件，台灣及南韓政府採取的策略是「軟硬兼施」，雙管齊下，一方面透過個別公司廠商控制工會活動，二來採取壓制手段。在這兩個社會，工會是虛弱無力的，它的存在只是政府控制勢力滲透的一隻手臂。罷工是違法的，勞工抗議事件會遭到嚴厲的懲罰。這是邊陲國家為了提供有利的投資氣候與環境以吸引外資、增強本地資本的經濟信心，必須製造的一個條件。

從政府在勞動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夠清楚地看見這兩個國家的階級性格。就它



• 民主統一黨與民進黨：新興中智階級力量的興起，有其社會經濟基礎。



們所擁有的強大勢力，以及對經濟的指揮權，毫無疑問的，台灣及南韓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們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個別的資本家的利益，那也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兩個國家，政府有賴於資本家的，不在政治上的支持，而在於經濟上的表現。在台灣，由於失去了全球大部分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資本家提供了一個與國際社區保持連繫的重要管道。整個說來，台灣及南韓政府，相對於主導階級，享有的自主性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它們可以不受個別資本家或某一小集團的資本家

的直接影響，但它們不能超越資產階級——包括本國的與外國的——的集體利益。最重要的，這兩個政府非常成功地運用了它們享有的相對自主性，助長資本家的利益。藉此，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地區，創造了高度的經濟成長率。

談到此，我們把上面的要點作個總結，並從政治經濟學上的幾個主要層面，對台灣、南韓與拉丁美洲國家作個比較。一東亞這兩個國家在二十世紀中葉後被納入了世界體系，政治因素是超過經濟因素的。台灣、南韓是在東、

西冷戰體制下形成的。美國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及經濟上的援助，為的是它們的戰略價值。外國私人資本是在政府及階級結構已調整到足以有彈力，且積極地適應它們在世界體系的新位置之後，才進入這兩個國家。因此，跨國企業在這兩個地區——尤其是韓國——扮演的角色以及握有的勢力是遠不若拉丁美洲的。三比起其他大部分開發中國家，台灣及南韓的政府是比較強有力的。而且相對於主導階級，它們享有較充分的自主性。政府內部的這種強勢力量，一方面是建基在世界體系之上的力量（美國軍事及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從日本殖民政府承繼下來的一套成熟的官僚系統），二方面是階級力量的結構相對地薄弱。台灣及南韓政府，與拉丁美洲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差別，不僅在於它們與內部社會階級相對照之下，具有較強勢的力量，並且在於，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強烈意願，以及擁有高度效率及良好紀律的官僚系統。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國家機器的行政管理者與技術官僚之間擁有一套共同的意識形態。台灣及南韓政府在三角聯盟——政府、外國資本與本地資本——中的地位，要比拉丁美洲國家強有力多了。四台灣、南韓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鬥爭與拉丁美洲國家有巨大的差異。這兩個東亞國家剛開始推動附庸發展時，它們都擁有一個相當均等、流動性高的階級結構。當時社會內部瀰漫著一股往上社會流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濃烈慾望與企業家精神。日據時期，屬於主要農產品輸出的階段，既未產生強有力的農業主導階級，也沒有產生買辦性格的商業階級。相反的，日本殖民主義以及獨立後政治的動亂，却有效地摧毀了舊式的農業階級結構，創造了一個高流動性的社會階層化。要言之，台灣及南韓的附庸發展之所以有如此順利的經驗，大部分要歸因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它們擁有一個非常有利於附庸性資本主義積累的階級結構。沒有一個階級足以阻礙外銷導向的工業化策略。當政府嘗試將經濟推向附庸發展的新模式時，當時主導階級的反應是合作、支持的態度。

四、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政治後果

過去廿五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給台灣及南韓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遷。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不但已有所轉變，而且可以預見的，未來的經濟發展將要遭到新興的階級力量以及政府與社會之間新的關係模式所決定。此外，這兩個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位置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對發展策略因而產生了新的結構性的壓迫力量。對這些變化作有系統的分析，實已超出本文的範圍之外。不過，我將針對若干最具實質意義的變化，作一些檢討。

經濟成長造成階級結構的轉型

一快速的經濟成長，可以觀察到的一個最重要後果是階級結構的轉型。台灣、南韓追求工業化的結果，促使資本主義社會裡頭兩個主要階級——資產階級及產業勞工階級——的興起。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是隨著國民經濟的擴張，作同比例的成長的。在這兩個國家，資產階級是政府創造出來的產物，因此在政治上，它保有了順從、附屬的地位。但是，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這樣的關係已產生了若干重大的改變。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一個社會階級的經濟力量是不可能不對它的政治力量起一定作用的，即使必須經過比較長的時間。在這兩個國家，尤其是韓國，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緊張，已是與日俱增。昔日在政府保護下得以成長的大資本家，已不會再對政府過度的干預表示歡迎，現在他們反過來向政府施壓力，要求放鬆對經濟的控制。來自本國資本家及國外的雙重壓力，迫使韓國在一九八〇年之後採取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自由化。台灣及南韓的企業領袖比以前更有勇氣對官僚機構作業遲緩、缺乏效率的老大作風，率直地批評。在這兩個國家，大企業的階級力量早已擴張到政府在制定主要經濟決策時不能加以忽視的地步。

不過，台灣及南韓的資產階級之間仍有一些有趣的對比。在南韓，資本集中化的程度遠勝過台灣。結果是，南韓的經濟控制在少數幾

個大資本家手中。台灣的經濟則提供眾多的中小企業者較大的生存空間。韓國資產階級的核心是三十到五十個之間的關係企業集團。每一個企業集團的所有權及經營權都掌握在一個家族手裡。企業集團在韓國經濟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以一九八三年來說，排名前三十名的企業集團，總銷售淨額等於南韓出口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三。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像這種資本的高度集中化已演變成爲尖銳的政治問題，一般民衆對企業集團壟斷式的成長以及助長這種不均衡發展的政府政策，紛紛提出強烈的批評。縱使目前韓國政府想減緩企業集團的不斷擴張，但以企業集團在今日韓國經濟所佔有的核心地位，想要改變企業集團的經營方式以迎合政府當局的願望，事實上是困難重重。

相形之下，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是比較有利的，在台灣的經濟成長中能夠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台灣的產業結構沒有韓國那樣的兩極化。在民間，反資本主義的情緒似乎也沒有韓國那麼強烈。這些差異當然主要是他們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所造成的結果。南韓的朴正熙完全專注於快速的經濟成長，對少數企業界的明星，提供超乎尋常的支持，爲的是達成他自己的目標。在台灣，蔣介石比他更關切比較平衡的成長以及社會的穩定。這種發展取向的差異，不純是領導者性格上的差異所致，還因爲兩個社會在過去階級鬥爭經驗上的差異。這裡，一個令人特別感到興趣的問題是，國家的發展如何對主導階級的構成發生作用。雖然台灣及南韓追求的經濟發展策略大抵相似，但在特定的、個別的發展政策上，也有相當大的歧異，因此對階級的構成，也有不同的影響與結果。



●新時代的序曲——大學生的絕對理想性，強化了社會變革的要求。

產業勞工階段，快速擴張

工業化的另一個重要後果是產業勞工階級的快速擴張。在南韓，產業工人佔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從一九六〇年的 13.2%，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 28.2%。以一九八〇年來說，他們佔都市勞動人口的 42.8%。在台灣，產業勞動力的增長甚至更爲快速。產業工人佔勞動



力人口的比例從一九六三年的 18.5%，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 41.9%，並且佔非農業勞動力人口的 51.8%。這種在職業上發生的顯著變化包含著勞動人口大量的普羅階級化。新的普羅階級由年青的工廠工人組成的。在人口的相對數量以及它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上，產業勞工階級，無論是在台灣或南韓，目前已是具有重要性的社會階級了。

第一代的產業工人是否已形成了階級意識以及組織上的連帶關係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到什麼樣的程度呢？他們已經從「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了嗎？有關這方面的經驗研究十分缺乏，不過現有的資料顯示：在南韓，階級形成的發展程度要比台灣高。在這兩個國家，政府透過公司、廠商對工會的控制，積極扮演了壓制勞工運動的角色。不過，南韓工人表現出的是比較不順從的態度。儘管整個七〇年代，韓國的勞工運動仍顯得相當浮動，但進入八〇年代，已對政府當局構成更大的威脅。勞工示威抗議活動主要是由獨立的、草根性的工會所策動。同時，韓國激進學生與草根性的勞工組織之間慢慢地也建立了彼此間的連繫。相形之下，台灣的勞工是比較消極、被動多了。我們很少見到勞工階級公開展現出它的階級組成，台灣的資本家實在要比南韓的資本家更有福享受和諧的勞資關係。

只有作有系統的研究，才能說明台灣與南韓在這方面的差異。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似乎是與政府的政策有關係。台灣的政府是比南韓更為福利導向，也比較重視均等的問題。因而在所得分配方面，南韓是比台灣更為不均等。進一步說，台灣的政府透過工業分散化的政策鼓勵產業界往鄉鎮區域設廠，目的就在避免發生像南韓那種普羅階級化的情況。在南韓，勞動人口不斷地離開鄉村往都市集中，並定居下來，很少會再回到鄉村。另外一個可能的因素是中產階級，特別是知識階層的特質。以韓國來說，自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知識階層與學生就以政治激進以及對政治當權者採取批判立場聞名。一九七〇及八〇年代，教會團體及

激進學生在韓國勞工運動的政治化過程中，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必須重新調整

最後，由於經濟及階級結構的變動，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隨著發生了變化。儘管台灣及南韓政府仍然以強硬、操縱、以及發展導向為基本性格，但現在，管理者面對的是一個日趨複雜、政治變化日益詭譎微妙的新型社會。政府繼續領導經濟發展的能力普遍受到懷疑。大企業也不客氣地提出嚴重的挑戰。當資產階級及勞工階級日益成為強大的政治勢力時，政府當局在六〇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階段，所享有的相對自主性，恐怕有相當程度會喪失掉。資產階級強有力的擴張，已沒有像過去那般容易地受政府的支配。勞工群眾也不再像過去那般溫順、沈默。同時，一個人數眾多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出現，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上，必然會對政府當局形成相當壓力。現在，單只是經濟成長已不能為專權國家提供合法性的基礎。

地緣政治的條件也發生相當大的變化。台灣喪失了國際社會的支持，南韓對美國維持其全球軍事霸權所具有的重要性，已遠不如冷戰時期。可以預期的，這兩個國家受核心國家支持的度將大幅減低。同時，對外經貿關係網絡日趨廣泛，也對政府經濟決策的能力有相當的壓力，以南韓而言，龐大的外債實際上限制了政府擬定新的工業發展策略的可能範圍。在台灣，金額龐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也產生了類似的結構性強制力量。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代，對外面臨日漸不利的國際市場，對內則面對了社會階級日漸增強的壓力，台灣及南韓政府能夠操作的空間已大為減少。當然，在可見的未來，兩個政府在經濟發展上仍可能繼續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仍想對經濟進行干預，並且要與一個日益分殊化的社會，發展新的關係模式，那麼他們已到了一個必須重新調整、轉換的關鍵時刻。

◎文化批判◎

當代馬克思主義 文學批評的雙璧

——詹明信與伊戈頓

■樓亮·李克

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大師詹明信，近月來成了好趕流行的台灣文化界的熱門人物，報章雜誌紛紛登載有關其人其思的文章，然而，詹明信的中心思想或遭簡化或被曲解而其理論的戰鬥性更被閹割殆盡。本文除闡明詹明信理論的精髓外，也介紹了英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師伊戈頓，並指出知識份子用玄虛、艱澀的語言空談批判性的理論，藉此鳴高，既無助於變革體制，且成為既成體制的安全閥。



● 7月中旬詹明信應清華大學之邀至台北演講

七月中，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訪台，一些搞理論的人在報章雜誌上爭先恐後地介紹他的著作及理論，深恐落於他人之後，錯過自抬身價的機會。在這股熱潮中，學院中的專業人士當然自命權威，對詹明信的理論大加分析與評介，殊不知詹明信的理論所批判的正是學院內這種生吞活剝式的術語遊戲，他所打擊的正是自命清高、中立、客觀的文學作品自主論及文學批判至上觀。換句話說，走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大道中的詹明信，正是要揭露學院裡頭的文學批評所蘊涵的意識型態，以及文學作品與現實世界之間的深層關係。

在運動、實踐中反省、學習

除了詹明信之外，在當今英美學界，同以馬克思主義的架構治文學批評理論而卓然有成的，要以英國的伊戈頓（Terry Eagleton）最受矚目。

詹明信與伊戈頓同時崛起於七〇年代初期，都經歷了六〇年代震動世界的學生運動、反

越戰運動、女權運動、及民權運動的洗禮，在實踐中反省社會，體認到馬克思主義才是切合實際的思想，它所指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方向，於是開始在這個領域中研讀、學習、與成長。

這個學習的初步成果就是他們個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一九七一年詹明信發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arxism and Form)一書，向美國人介紹他研讀阿多諾、班傑明(Walter Benjamin)、馬庫色、布洛赫(Ernest Bloch)、盧卡契、及沙特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觀的心得，他特別強調：這一本書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掃除美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一貫的粗淺、錯誤認識及有意醜化，另一方面希望以此書來對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問題，提出理論性的探討。

詹明信認為，按照社會、歷史、生產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環境中會產生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及古巴的農民馬克思主義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便是最好的例子。詹明信也希望，他本人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能在後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相同的作用。

學術研究與社會變革的一體性

伊戈頓的第一本書——「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簡單的勾勒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議題，藉著盧卡契、阿爾杜塞、馬歇瑞(Pierre Macherey)、勾德曼(Lucien Goldman)、布雷希特等人的理論，用歷史分析的方法來探討文學的意識型態作用，指出其產生的歷史條件。伊戈頓一再指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絕不能侷限在學院的宮牆之內，它的重要功能乃在於整個社會的變革，而非學院中的空談。

伊戈頓與詹明信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同樣都是讀書報告式的總結討論，雖然創見尚未完全發展完備，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已踏入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看清了文學研究與社會變革、學院討論與社會實踐的一體性，也以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及相關著作為首要之務。由

於他們的環境及背景不同，伊戈頓傾向阿爾杜塞式的意識型態分析，詹明信則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佛洛伊德主義融合的可能性（這和他研究過衆多法蘭克福學派大師的思想有關）。

掌握好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及實踐原則，詹明信於一九七二年推出「語言的牢房」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投入學術領域的意識型態戰場。詹明信在此書中用凌厲的筆鋒揭露當時方興未艾的結構主義及重新發現的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假設，以歷史的模式為結構主義及形式主義的語言模式重新定位，一方面承認語言模式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侷限性。

在這個研究及批判的過程中，詹明信透過李維史陀及格希馬(A.J. Greimas)的結構研究，深入地認識了新佛洛伊德主義者拉崗(Jacques Lacan)的理論，種下了他的最重要著作的根基。

文學作品是階級潛意識的象徵式表達

一九八一年詹明信發表受學界推崇最力的「政治潛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一書，明白地指出，文學作品是階級潛意識的象徵式表達。當人們想要解決現實矛盾的願望被壓抑下去時，人們的願望就只好曲折地以其他方式表達，文學就是以象徵方式來表達人們(集體的)潛意識中的願望之行動。文學是烏托邦的，因為畢竟是一種想解決矛盾之願望的表達。但文學也是意識型態的，因為畢竟只在象徵層次上滿足願望，而不是真正地去滿足願望。若要真正滿足願望，就要真正地去解決社會矛盾，而這需要以革命的行動來完成。

文學不是願望，易言之，從表面上看，我們察覺不出文學和想解決矛盾的願望之關連，因為這種願望被壓抑下去。但文學是象徵層次上願望的滿足，即，透過象徵的行動，來滿足潛意識的願望。因此文學和夢一樣，都是一種以象徵方式來滿足願望的行動，而不是真正地去滿足願望。

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文學的意識型態

面，使文學變成下層建築的直接反映，詹明信則希望大家也能注意到文學的烏托邦面（這一點可能受到馬庫色影響），不忽略文學的相對自主性。但這並不意味，對作品的分析不連繫到階級衝突與生產方式，而是要明白文學不是願望，因為願望根本不准實現，也甚至不能被意識到。

把作品納入歷史的整體，就有現實蘊涵與政治效果

詹明信認為，若要全面地理解或詮釋文學作品，必須放大我們的眼界到人類活動的空間與時間（即歷史）中，其他在語言、形式、心理、文化、傳記等層面的分析，都只著眼於一個狹窄的視野。從一個片面、狹窄的視野出發，所作的詮釋即使有某種程度的正確性，這正確性也是有局限的，總是見樹不見林的。所以文學作品一定要在產生它的歷史脈絡中去考察。詮釋作品時，一定要把它歷史化，即研究它是由於什麼現實矛盾而產生的，為什麼在那樣特定的歷史時刻產生，等等。但這樣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連繫作品（包括其語言形式）到階級衝突，最後再連繫作品到生產方式，這樣才夠全面，才達到最大最遠的眼界。

或許有人懷疑，把作品連繫到生產方式時，詮釋或分析是否會變成千篇一律。但這是假定了一個社會只有一種生產方式，可是詹明信接受了阿爾杜塞的「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的說法（「社會形態」這一觀念其實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但經由阿爾杜塞發揚光大），認為一個社會中固有一個主導的生產方式，也有其他生產方式，但彼此互相配合，形成一個整體，各種生產方式彼此互補，也互相矛盾，但各有各的功用。所以把作品連繫到生產方式時，詮釋不會是千篇一律的。

總之，我們在詮釋作品時，一定要把它政治化，因為把作品歷史化的同時，也揭露了作品與現實矛盾的關連、現實矛盾的來源—階級衝突、和階級衝突的根源—生產方式，這就是一種政治化。詮釋作品時，從語言形式走向歷史，從微觀到宏觀，不斷地擴大眼界，把作

品納入歷史的整體之中，就有現實蘊涵與政治效果了。所以詹明信在「政治潛意識」一書的開頭便說：「永遠都要歷史化！」在第一章的開頭又說：「文學作品的政治詮釋是最優先的，政治觀點的詮釋不是什麼補充的方法，或另一種可有可無的幫助詮釋的方法，而是一切閱讀、一切詮釋的絕對視野。」

詹明信的「政治潛意識」一書把拉崗的心理分析理論巧妙地嵌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中，為「歷史—社會」層面添加微觀的細節，也為「心理—語言」層面點明其宏觀的意義。同時，在深奧的學術語言及概念討論中不失其與現實世界的緊密直接聯繫，難怪此書會成為各大學心理分析研究、文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範疇內的重要典籍，也使詹明信展露他思想成熟期的見解，成為一派之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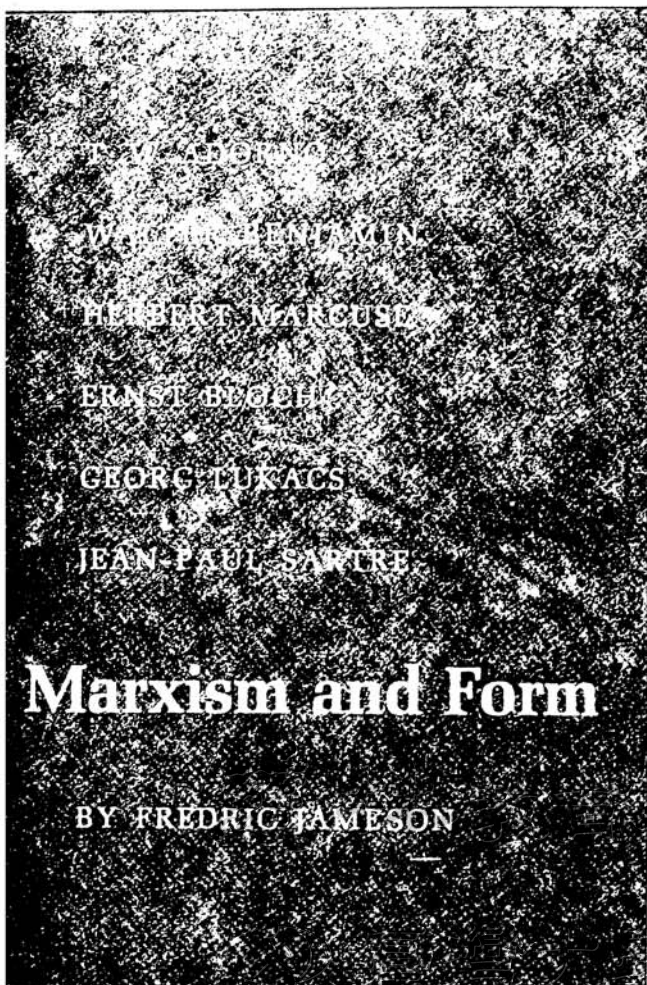
學院中的理論模式，不足以促進社會變革

最特殊的是，詹明信在這些學術研究中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絕不能從事象牙塔式的虛幻構築或學院內的無謂空談，而需做阿爾杜塞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做的「理論中的階級鬥爭」，有這樣的大目標作為前提，也難怪他方向確定、出拳有力，不但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論家挑戰，更為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添加火力。

比起詹明信來，伊戈頓似乎走的更遠些。

伊戈頓一九七三年的小書只是讀書報告式的勾勒，為了更完整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研究方法，他在一九七六年提出另一部重要著作「批評與意識型態」（Criticism and Ideology），具體採用「歷史—社會」的分析方法來審視產生作家、作品、形式等等的歷史客觀條件，將阿爾杜塞及馬歇瑞的理論發展得更為詳盡，建立分析模式，後來且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模型。

伊戈頓和詹明信一樣以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及目標為指導原則，他認為單單發展學院中的理論模式，尚不足以切實地促進社會變革，而必須更主動地參預意識型態領域內的抗爭，因此在一九八一中發展了他的「華特·班傑明—



〔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一書系統地整理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

邁向革命的文學批評」(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藉著研讀班傑明的思想，伊戈頓對當時逐漸成為流行的解構分析及詮釋學派加以批判，同時闡述正統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托洛斯基、列寧等人)對文化及文學的觀點，這個批判的經驗為他最有名的著作鋪下了厚實的根基。

文學理論在八〇年代風行校園之內，各家之說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有鑒於理論市場上的混亂、玄虛、甚至與現實脫節，伊戈頓於是再度傾力投入意識型態層面的抗爭，集過去著作之大成，以一致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各派理論作有系統而一針見血的分析與批判，寫成一九八三年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theory)一書。

伊戈頓不贊成文學理論的玄奧與艱澀傾向，更反對各派理論在文字遊戲中遮掩或略過自身的意識型態，故而在此書中一掃學院式的深奧文字及晦澀的術語，以淺出深入的方式向一般大眾推廣文學理論，陳述理論與建構之間的關聯，揭露理論的實際效果，因而廣受各方學子的歡迎，幾乎人手一本。由於它的敘事觀點不是故做旁觀中立者的客觀簡介，而是統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的洞見與批評分析，故影響至鉅，蔚成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領域的顯學。

文學批評的功能， 在於組織、動員讀者群

「文學理論」的第一章「英文的興起」，追溯了十八世紀以降，英文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發展過程。伊戈頓指出，英國文學研究在各時代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型態架構中扮演不同的功能，但一直是既存體制的維護者及宣傳機構，其中所生產、流行的理論觀點反映出其傳統保守的色彩。這個「歷史—社會」的考察，使伊戈頓特別針對理論及生產理論的階級之間的緊密關聯發生興趣，發展成為一九八四年他寫成的「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一書。

「批評的功能」是伊戈頓對整個文學批評領域的反思，「功能」二字就是此書的關鍵。伊戈頓由整個歷史的、社會架構的角度來看，認為「批評」作為一種實踐，乃是十七、十八世紀中產智識階級在對抗國家的絕對霸權中所產生的言談領域，在當時的公共領域中(包括俱樂部、期刊、咖啡屋等等)逐漸形成政治力量，對當時的既存體制有某一程度的批判力，因此扮演了特定的社會功能。可是，在歷史過程中，「批評」逐步被吸收合併，成為文化建制的一部分，不但喪失原有的批判功能，而且反變成建制本身為不滿情緒所提供的安全閘門，因而理論也傾向於玄想、深奧，只在領域內爭吵芝麻細節，逐漸喪失了對整個社會的批判力。他認為像解構主義這種理論所表達出來的



● 伊戈頓

高度不安定感及懷疑主義，只不過是學院人本主義自身的功能，在周圍更廣大的歷史社會環境中發生問題的跡象。

換句話說，學院中理論的紛爭，只有在更廣大的歷史現實中才找得到根源及解釋。

建立了這個基本前提之後，伊戈頓為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指出一條明路，這也是他個人學術生涯的最成熟言論：「真正的政治活動不能僅止於寫些言論激烈的著作向廣大群眾推廣馬克思主義，而必須努力建立一個有組織、有環境、有協作、而且能採取集體政治行動的讀者群，然後才可能有對話、有共識、有政治力量

」。對伊戈頓來說，這個讀者群不是學者們憑空創造出來的，乃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占據某些特定社會位置的人群。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必須在組織、動員特定的讀者群之後，才算真正存在，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者只不過是一名游魂，在建制中頂多也只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批評的功能」一書顯示伊戈頓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已經把握其精髓，並理解到學院不是改變社會的地方。想要促使社會變革，還得由組織、動員特定的群眾做起。

鬭爭是沒有什麼學術不學術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詹明信從事的是馬克思主義迫切需要的學院內的意識型態抗爭，伊戈頓則深切體認到，這種學院內的抗爭固然有用，而且重要，但是若沒有廣大的、適當的讀者群及政治行動力量，其功效也只會有一定限度。

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伊戈頓有段發人深省的話，可以恰當地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說到馬克思主義是個『學科』，我們得真的小心，這一類的書很可能剛好就成了學院式的東西。不消說，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批評堂而皇之地被安插在佛洛伊德式的文學研究法與神話的文學研究法之間，成為另一種刺激的學術『研究取向』，另一門被耕耘過的學問領域，好讓學生來蹂躪。在這發生之前，最好先提醒我們自己一項簡單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社會及改變社會之實踐的科學理論。說得具體一點，馬克思主義所敘述的，是男男女女從某種剝削與壓迫形式中解放自己的鬥爭故事。這些鬥爭沒有什麼學術不學術的，要是我們忘記這一點，就非吃虧不可。」

◎香江話題◎

九七過渡期內的 台港關係

■章 名

儘管在政治上，台北對香港問題無力置喙，但經濟現實却使台海兩岸在九七年後，可望繼續維持以香港為中介的經貿關係。這種微妙的三角關係，頗堪玩味。

香港在九七年後歸中共統轄的決定，使台北當局陷入兩難。在政治層面上，由於數十年的歷史因素，台灣到時不可能斷絕與中共「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往來。換言之，除非台北在今後十年的香港過渡期內放棄「三不」，或換個自欺欺人的類似的名堂，否則，現已名存實亡的這項政策自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將名實俱亡。

台灣權貴壟斷轉口貿易

更實際的是，香港至今對台仍有相當的經濟價值。其份量雖遠不及頭二號貿易伙伴—美國和日本，但由於其與大陸的獨特關係和地理優越性，對台灣却起著巨大的轉口與跳板作用。一般相信，在對大陸的間接貿易中得益最多的，正是島內的特權階層。故如何繼續在經濟上利用香港，與避免公開接受「三通」中的通商，因而不得不對島內民衆開放這個官商壟斷的黑市，也就是權貴們最現實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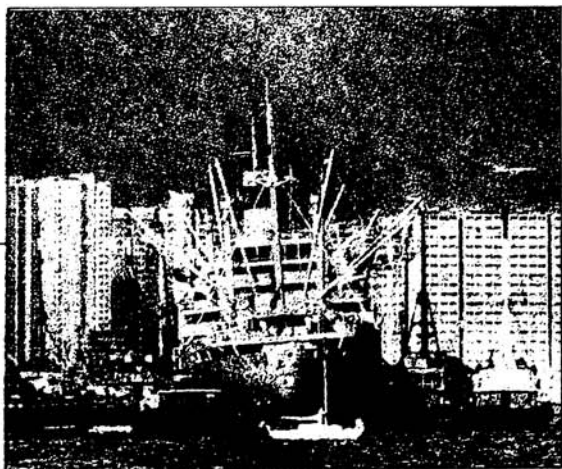
表面上，經濟問題解決不難：只要找到一個有條件接下香港對大陸轉口作用的非共地區，把這筆生意轉給後者，即大功告成。據信這也是行政院長俞國華六月中出訪新加坡的主要原因。然而，新加坡轉口，除了多付運費，加

重對大陸出口的成本外，更重要的是，星洲無法與中共建立起像香港與大陸這種獨一無二的聯繫。對於中共來說，領土香港與外國新加坡，總是「內外有別」。台北若硬以星代港，經濟上必招致不少的損失。相信正是看到這項明顯不過的事實，台北的九七對策在政治上舉棋不定，在經濟上則一如此間英國人的名言，視香港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點」，在試圖物色替代物的同時，繼續盡量利用香港的剩餘價值。台灣兩大公會在香港判歸「匪」後始來港大辦商展，即為明證。

台灣兩大公會在港辦商展

六月底舉辦的這項「台灣產品展覽會」，較去年第一屆不只規模增大，見報率高，且在此間一向極力限制台灣知名人士（影歌星也許例外）來港下，由兩大主辦機構的第一號人物：外貿協會董事長、前經濟部部長張光世和商會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專程來港主持開幕。所推銷的却是這個消費社會市場有限的工業用機械。醉翁之意，不問可知。台灣一位經營此業的熟人穿梭其間，目標也就是工業剛起步的「北大入」。

商展執行長丁楷恩聲稱，明年第三屆遷往



轉口貿易使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站在同一條線。

到時啓用的「香港展覽中心」後，規模當更大。甚至大胆預言，台灣貿易在九七年後縱可能會減少，但不致中斷。他並巧妙地將此中的責任推給到時中共轄下的香港特區政府，暗示台北無意切斷這條財路。兩大公會對過渡中的香港態度如此積極，不可能與當局的對港經濟政策無關。

亟於與台灣建立關係的中共對於台北這種現實的態度，顯然是歡迎的。此間中共兩大半官方喉舌之一的「大公報」一篇評論以數字引證，九七問題出現後，台灣經港轉口世界各地不僅貨值步步高升，其中轉往大陸的比重也節節高升，由大陸剛開放的九七年 1.07 億港元，暴增至八一年的 21.81 億港元，再增至去年的 63.28 億港元；比重由七九年的 11.9%，增至八一年的 64.6%，再增至去年的 72.9%。即目前台灣經港轉口的貨物，將近四分之三資「匪」去也。而且，雙行道的另一邊雖遠不如台灣經港往大陸般熱鬧，但近兩年經港輸台的貨物亦以大陸為首要來源，佔 18.9%，接近二成。雙向轉口互相抵銷後，去年台灣對大陸享有順差 52.03 億港元，即接近七億美元。這與對美順差和對日逆差相比，無疑小巫見大巫，然對於分散台灣出口市場，拓銷難在發達國家立足的中初級產品，不無輔助的作用，且頗具開發的潛力。

台北的現實態度，值得讚許

相信是反映中共切望繼續對台貿關係的心態，大公報這篇發表於香港未來獨立關稅地位公佈前夕的專文更指出，只要香港在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期間內關稅獨立於大陸之外，台灣即可放心地繼續利用香港作為對大陸貿易的緩衝區。

結合丁楷恩及大公報兩方之言可大致推論，台海兩岸均希望在九七年後繼續維持以香港作為中介的經貿關係。

就香港本身而言，由於台灣外匯解除管制，市場逐步開放，民衆消費力強等經濟誘因，港資近月除了湧到台灣作金融投機外，也圖發展零售業等香港擅長的正當生意，「香港王永慶」即決定將屬下的百貨連鎖業務擴展到台灣。不過，可以相信，其十億美元計的資產已遍佈天下的李嘉誠赴台僅屬在商言商，而非藉此推銷他作為中共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也精通的香港「一國兩制」經驗。

和香港維持現有的經貿關係，並進一步發展中轉站外較全面的往來，甚至減少彼此之間的出口競爭，聯合起來對抗西方保護主義，這絕對符合台灣的利益。台北年來的現實態度，值得讚許。今後還宜執行經濟國際化、自由化的政策，對內開放對港貿易的業務，讓各階層分享此中的好處，做到蔣經國期望的「均富」。現政治力場已有突破性的開始，經濟利場的開放沒有理由反落在其後。

台灣在港影響力，日漸衰微

在政治上，台北除了面對本文開頭所指出的「三不」理論死結外，在現實層次上也面對對香港問題無從置喙，却基於國策，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支持香港人抗共的尷尬處境。且由於實力更遜，在這方面較諸沒落的英帝國無力與中共討價還價，但看中十億人市場，可是出於政治尊嚴和殖民傳統，逆中共意而還政於港的兩難，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台灣依附美、日，與英早年斷交，港英為免開罪中共而多方

限制，加上此間親台人士的素質，台灣在港勢力除了大陸難民湧到、國際極端反共的五〇年代初期風光過一陣子外，此後即告衰微。故無論親台人士是如前任港區立委卜少夫所言，為維持香港的自由民主安定繁榮共存亡，還是加入移民行列，對大局均無足輕重。即使其能有所作為，也遭受到源自中共的巨大壓力。鄧小平近年一再警告國民黨和黑社會在港鬧事。港英大捕竹聯幫「過江龍」，據聞即與此有關。香港歷來延宕留難台灣知名人士來港，有人也歸咎於中共的態度。然此說與中共亟於對台接觸，再炫耀經港去大陸的台灣居民激增的事實相矛盾。較可信的解釋是：港英看準弱者台灣沒有報復的能力，甘為主子當其寧枉勿縱的惡犬。不過，除非中共公開表示歡迎台灣居民來港進行非政治活動，否則難免有人猜疑，北京對台灣的人既統戰又鎮壓的兩面手法。

此間較能為台灣發揮影響力的，反而是一些不屬國民黨管轄，却由於意識反共，因而在面對中共下希望台灣插手的老牌文人。此等知名政論家當年九七恐慌高潮中曾組團赴台，要求將澎湖關為反共港人特區。不過，了解了「風櫃」真相後，就沒有再提起這項企圖。這些先生透過香港專欄壟斷制度下所掌管的文字地盤，在阻遏中共對香港的干預，指證中共內政流弊上，起了不少作用。近日並在中共反自由化而台灣政治大開放，此消彼長下，大力刷新台灣的形象。然總的來說，這些以傳統自由民主為大義的文人，思想上已定於一尊，較難吸收新的，即使是右的觀點；故隨著社會的進步，相信不出十年內將為較具現代觀念的新一代知識人所取代。若此，台灣在港的影響力也將告終結。

中共要封鎖台灣？

■ 章 名

演習中的中共軍隊



中共揚言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有沒有能力？恐怕不是主要問題。怎樣才能促成客觀有利的統一條件，更值當權者深思。

中共和葡萄牙有關澳門前途的協議墨跡未乾，北京即表示：台灣將是「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僅餘的唯一目標。接著，僅次於鄧小平的軍事強人、對台工作最高負責人楊尚昆乘著訪美的機會，加緊提高對台的壓力，順應鄧小平「台灣若不收回來，說不定那一天會被美國、日本拿去」之語，重申武力不可棄之說。

和平統一與武力解決的兩難

六月十九日楊尚昆仍在北美訪問期間，中共在香港兩大喉舌之一的「文匯報」刊出的社論提醒說，「在和平統一無法實現時，武力解決將難以避免」。該報接著雖以「台北如果能接受『一國兩制』，其統治將可延續」扭轉語

談笑用兵？楊尚昆會晤溫柏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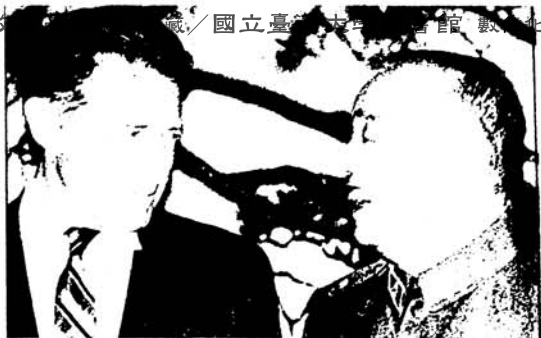
氣，並以四段文字闡釋其中的好處，但台北除了接受此方案，別無選擇的意思，是清楚不過的了。

此間在六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份親北京的月刊「廣角鏡」更以兩篇文章共十一頁，來分析北京軍事封鎖台灣的可能性。其中一文據編者稱「和官方上層有經常接觸」的作者與文匯報的上述說法呼應說，「在和平方式不能達到（祖國統一的）目標之時，北京是會在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推動下，採取非和平手段的」，「北京對台灣實行封鎖的可能性……誰也說不準在那一天會突然降臨……」。最後也一如文匯報一般曉以大義，並借用美國專家的話，要求台灣宣佈不搞台獨，逐步開放「三通」，以排除用武的可能性。另一文則摘譯一位美國退休海軍上校去年中在某一保守智囊機構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認為中共「完全有能力實現（封鎖台灣）這一目標」。

「廣角鏡」在前一期已用了類似篇幅的兩篇文章展望楊尚昆訪美的意義以及介紹楊氏其人。結合中共政局來看，後一文主要為楊尚昆在今秋中共十三大接替鄧小平當第一把槍桿子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任一職，塑造形象。有人說，楊氏這次以鄧小平代表的身份訪美，一來打知名度，二來上現代化課。楊氏專輯中的前一文則明言，這次與美會談的一個重點是台灣問題，希望美國撤去「希望台灣問題得以和平解決」這句暗示反對用武的聲明，最終促使台灣坐上談判桌。

封鎖台灣有利於台灣問題的解決？

中共所要傳達的信息：北京有能力，且必要時不惜封鎖台灣，是明顯不過的了。然而，北京滔滔地引述美國專家之言為己立論壯勢時，却又掉入了將能力和意願絕對化而不計其他可能後果的窠臼。文中引述一位美國中校的話說，「封鎖台灣幾乎可以不流血，不冒任何風險」地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台施壓，從而使台灣問題得到「有利於中國的解決」。三歲孩童皆可想像，中共若封鎖這個政治、經濟日漸開放



的小富島嶼，對其在當地一千九百五十萬居民的心目中，以至國際社會上的形象，將會有何影響。即使賺得了台灣，却賠上了千萬條民心，種下較「二·二八」更深遠不知多少倍的仇恨，這樣的統一又有何意義？盲目地追隨武力論者，炫耀軍力和意願，其荒謬處就如已知某甲痛恨某乙，也有能力拿刀砍人，就認定甲殺乙乃不可免一般。中共的宣傳相信還不至於如此不明事理。

故中共急遽升高姿態，真正的用意，似在於對傾向台獨的反對派在蔣經國時代的尾聲中崛起深感憂慮下，試圖嚇阻獨立或動亂的可能性。若此，則未免反應過度。可以相信，國民黨在可見的將來仍將掌權，因而獨立起碼在名義上沒有可能。國民黨內雖肯定會因爭接班而傾軋，但也只有嘩眾取寵者才會認為有政變的可能。在反對黨方面，其行動表面上仍激烈，實質上內部已開始形成約制力。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的政黨，上街革命，癱瘓台灣，與國民黨同歸於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統一與否，客觀條件遠過於主觀因素

中共的憂慮可以理解，耀武的做法則不足取。在現今的世界，決定一個民族統一與否，客觀條件的份量遠過於感情，掌權者的功業等主觀因素。南北韓、東西德是明證。若強行要求統一，即使形式上能達成，其所造成的裂痕只會導致長遠的動亂。以「三通」為開端，藉此逐步重織海峽兩岸的感情、利益，以至血緣紐帶，順其自然，若此，只要大陸不再動亂，繼續進步，則兩岸的關係終會密切到無法分離的地步，而雙方都覺得結合比保持分割更有利，「大業」也就水到渠成。不過，當今的當權者相信就看不到這一天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迫不及待，甚至偶失章法的原因了。

◎歷史◎

日據時期

台灣勞工運動初探

■王宏仁

一、資料的說明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工運的文獻，資料最齊全的算是《警察沿革誌》^①，但由於是官方出版品，因此記載多所偏頗，例如在其所描述的 12 次罷工中，只有一次成功，其餘皆被描黑成“慘敗、自然消滅、屈服”。雖然如此，要研究日據時代勞工運動史，這仍是一部彌足珍貴的文獻。裏面有關勞動問題的表格（如工場數目、工業指數、勞動團體別、工會團體一覽表……等）共有 53 張，十分利於分析。在罷工過程的描述上也以本書最多（12 次）、最仔細，包括罷工的起因、政治團體的介入，以及經過、結果。但對於日政府插手工運的事，便略而不述，只以簡單幾句“因脅迫被逮捕、因暴行被逮捕”帶過，我們遂無法知曉資本家與日帝勾結的情形。此外，它也傾全力批評文協、民衆黨、台共的內部矛盾與問題，這反而使我們可以看清當時這些政治團體本身的限制及在這些團體指導下的工運呈現何種風貌，當然，它絕對不敢提總督府對這幾個團體的對策

與陰謀^②！縱使本書有如上述之缺點，但它仍是後人研究日據社會運動史最珍貴的資料，後人的著作泰半引自此書。

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謝春木“台灣人的要求”^③。本書論及勞工運動的部分只有兩處：第 1 章“十年來的社會運動”第一節及第 7 章“工友總聯盟”。作者是自東京高師畢業回台之後，擔任台灣民報記者，民衆黨員^④，是工友總聯盟的催生者（沿革誌：1245）。

由於作者本身是參與運動的當事人，因此在掌握整個時代脈絡時十分貼切！他不僅注意到工友總聯盟本身的發展及問題，同時也注意到文化協會與工友聯盟之關係。例如他承認新文協在勞工運動中的啓蒙角色；也看到當時台灣尚未產生足夠的近代勞工階級，工友聯盟本身結構十分脆弱；或許因為看清楚此時工運的難點，因此謝氏才會加入民衆黨以求得民族、階級同時的解放吧！此外，本書有部分的資料與沿革誌有出入。例如對淺野水泥罷工與台灣製塩爭議的描述，多少可平衡沿革誌獨斷的說詞。但本書的缺憾是：對於日本政府打擊工運

①台灣總督府警察局「日本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 2」，1973，古亭復刊本。本書簡稱「警察沿革誌」，以下則以「沿革誌」代之。

②例如第 11 任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對付文協的「上山滿之進關係文書」。此文由若林正文挖掘出來，南方雜誌第 1 期有譯稿。

③謝春木「台灣人的要求——民衆黨的發展過程を通じて」，1931，台灣新民報社。

④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頁 271-296，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台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代表大會

的手段著墨甚少，當然這是因為日帝對言論的壓迫（例如台灣共產黨皆改寫成台灣××黨，而書中也常冒出×××××，讓人文二金鋼摸不著頭！）但也顯示出作者的“自治”思想，即承認日本政府的合法性，在此前提下要求台灣自治，這是當時台灣民衆黨人普遍的思想。本書成於1930年12月，因此台共活潑運動時期的事件並沒記載進去，這是另一個缺陷。

除了此二書之外，其餘有關日據時代勞工運動的著作真如鳳毛麟角，即使有，也都是參考此二書而來！本文即主要根據這兩份資料來探討日據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

二、問題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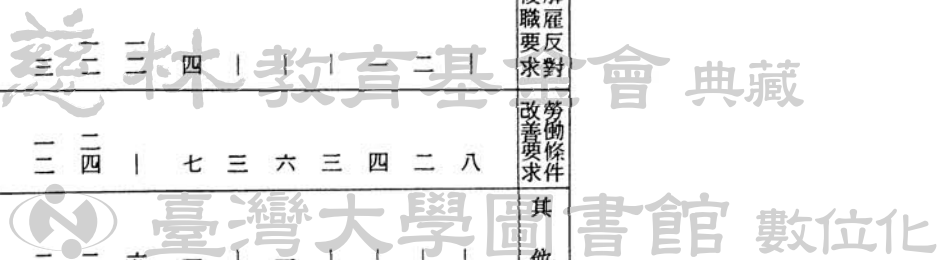
本文依照罷工次數頻率的多寡，將日據時期的勞工運動分為三期：黎明期（1920—26）、活潑躍動期（1927—31）、形骸期（1931—之後）。畫分的依據可參考表一：勞動爭議件數表。我們從此表可以發現1927—31是一段高潮，這五個年度的勞工爭議件數占十

	計	同九年	同八年	同七年	同六年	同五年	同四年	同三年	同二年	昭和元年	同十四年	同十三年	同十二年	同十一年	同十年	大正九年	
五八·一%	三二八	一六	一〇	一九	三三	三八	二五	七九	三三		一六	七	九	一〇	五	二七	臺北州
八·九%	五二	一	二	二	五	六	四	五	二		三	三	一	二	二	四	新竹州 臺中州 臺南州
五·一%	三〇	二	一	一			三	三	一		三	三	一	六	五	四	高雄州
八·九%	五二	一	一	一	一	五	七	四			三	一	二	二	五	四	臺東廳 花蓮港廳 澎湖廳
一五·六%	九一	一	九	六	一	一五	九	二	八		一	四	二	五	三	六	花蓮港廳 澎湖廳
三·一%	一八	一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一	五	二	花蓮港廳 澎湖廳
一〇〇·〇%	五八二四一、一四七	一八	三三	二九	五二	五九	四九	一〇七	六九		二六	一八	一四	一四	三三	五一	計
		一、二九四	一、五七一	二、〇〇三	二、五五九	一、九〇〇	一、四四五	五、四四五	三、三三二		一、二八〇	五三九	四一五	四七六	八五一	一、六二六	加人廳 員數

表一 勞動爭議件數表

計	同 同 昭 昭 大 同 同 同 同 同 大	
	和 和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四 三 二 元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四八	一 二 三 八 九 六 二 四 〇 三 六	賃銀值上
四六	四 四 三 一 一 一 五 八 七 三	下賃反銀對值
四五	六 三 五 一 三 一 四 三 七 三	拂賃銀求不
四八	九 四 一 五 二 一 一 三 三 一	者業主反監督
三四	三 二 二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復解職雇反對
六九	二 二 四 一 七 三 六 三 四 二 八	改善勞働條件
一二	二 二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其他
四〇一	四 〇 六 二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五	計
	九 七 九 六 八 四 四 三 一 一	

表三 勞動爭議要求別調



的工會團體幾乎不存在，因此要全面動員工人參與工運不太可能！例如1922至1926的5年間，每年勞工爭議次數比工會還多，除非是一個工會每年挑起2~3次的爭議，否則勞工的爭議並非是由工會來動員。況且當時的工會多半是日人的工會團體，其宗旨為“親睦互助”，怎麼可能策動台人勞工去示威抗議呢？（沿革誌：1218）

不過令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何此時期的工運是以這種方式出現？其發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又如何？可惜討論此期間工運的文獻只有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的《警察沿革誌》，因此我們只能討論日本官方如何看待此時期的工運！

一九一九年華府召開一項勞工會議，日本國內因此對勞工問題極關心，伴隨著日本工業的發達，勞工數目的增多，勞工團體如雨後春筍冒出，勞工運動逐漸蓬勃。當時指導工運的理論有逐漸從第二國際或工團主義（syndicalism）轉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一九一九年中國大陸發生京漢鐵路、唐山煤礦工運，中國勞工運動逐漸上軌道；1920年又創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的工運漸漸地蓬勃起來。但是在當時的台灣，由於缺乏人力與組織的指導，因此尚未受到日本、中國工運的直接影響（Ibid：1217-18）。

計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昭 元 年	大 五 年	同 四 年	同 三 年	同 二 年	同 一 年	同 十 年	大 正 九 年	
二 九 三	四 五	八 三	四 七	一 五	一 四	一 一	一 二	二 〇	二 〇	二 六	同 盟 罷 業	
三 一	一	六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同 盟 怠 業	
五 二	四	五	八	七	一	一	二	二	二	六	其 他 的 關 爭	一 八
一 六	一	八	三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罷 怠 業 協 議	
一 〇	一	五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暴 行 示 威	
四 〇 二	四 九	一 〇 七	六 九	一 六	一 八	一 四	一 四	二 三	三	五 一	計	

表四 勞動爭議手段別調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昭 元 年	昭 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同 年	大 正 十 一 年	年 次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五	十	十	十	十	十	
六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五	七	七	一	八	七	團 體 數
一 六 、 八 四 七	二 一 、 九 五 七	二 一 、 二 〇 三	二 一 、 二 九 五	二 五 、 一 九 〇	二 一 、 九 三 九	一 二 、 〇 〇 八	八 、 一 七 五	一 、 七 三 〇	一 、 六 〇 八	一 、 二 三 〇	一 、 〇 一 五	一 、 〇 一 五	八 二 五	團 體 參 加 人 員	

不過歐戰所帶來的繁榮以及物價上升^⑤，還有漸次傳入的大陸、日本工運影響，促成當時初步、自然發生的勞工爭議。但隨著戰後的不景氣，原先攻擊性的工運轉向成為消極性、防禦性的運動（如陳情怨嘆）（Ibid:1218）。

1925 年以後，左翼運動指導者逐漸開始活動，但由於台灣的工人及左派人士尚缺乏實戰經驗，無法調整步伐來進行勞工運動指導，因此仍停留在宣揚階級意識覺醒的階段而已！

日本官方在描述此時期的工運活動時，態度尚稱負責，由於沒有其它的資料可加以否證，我們且暫時接受此種看法。

四、被剝削壓迫的勞農大眾，奮起吧！

(一)反帝、反霸的工運

一般相信，工會的發展與工業化條件有相當的關聯，但我們看到自 1927 年之後，工會數目突然增加很多，而當時的工業產值却沒出現跳躍式的上升（見表二），況且 1927 年是景氣蕭條的一年，按常理言，勞工數目應會減少，工會的組織會削弱才是！可能有人會認為正是因為景氣不好產生了大量的產業預備軍，因此勞工們才會團結起來對抗資本主。但據表三資料顯示，1927 年的爭議要求主要是提高

⑤ 涂照彥提及當時由於米價及地價暴漲，造成一般人生活的不安定，見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430，1975，東大出版會。

計	其 它	日 本 人 團 體	中 國 人 團 體	文 協 系 團 體	民 衆 黨 系 團 體	區 分	
						數	人員
一〇三	?	五	?	三〇	六五	數	一九二八
?	?	三六五	?	三、六八六	七、八一六	人員	
一二四	?	?	二三	二九	四四	數	一九二九
二二、九三五	?	?	一、八八六	?	?	人員	
一〇九	四	一一	二三	二五	四六	數	一九三〇
二五、一九〇	四三二	六四	四、三七六	四、五三四	一五、二二五	人員	
一二四	一一	一〇	一八	二四	五一	數	一九三一
二二、九五五	一、三八一	五七〇	一、三四六	三、二五六	二四、七四二	人員	
二〇	一六	一三	一九	一七	四五	數	一九三二
二二、二〇三	一、五五六	八九〇	一、九五	二、五四三	一三、二八九	人員	
二七	一九	一一	一六	二〇	六一	數	一九三三
二二、九五七	三、三七三	七三三	一、二二一	一、五七〇	二五、一五〇	人員	
六一	一三	三	二	一〇	二三	數	一九三四
二六、八四七	二、三七六	三三六	五五一	六九八	二、八九六	人員	

表六 勞動團體年別增減表

年以後的工會組織多半不是獨立於政治團體的單位。例如1927. 2. 19創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是屬於台灣民衆黨系統，而左翼工會團體多隸屬文協系統。我們就1928年的資料來看，當年全台灣的勞工團體共103個，屬於民衆黨系統者65，屬於文協系統者30，這兩者所屬的勞工團體加起來即占全部勞工團體的92.2%，可見當時勞工團體與政治團體的密切關連。今天我們所能見到關於日據勞工運動的文獻也多半持此種觀點：工運的風起雲湧與當時的社會、政治運動相互提攜並進，是反帝運動中的一股支流，主要不是階級分化後所產生的階級運動。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當時政治局勢的推移過程談起！

(二)與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共同攜手向前邁進

誕生於一次大戰期間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以其革命的熱情“扶助”世界弱小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於一九一九年成立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也相繼隨之成立；另一方面，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十四點原則”也獲得殖民地人民廣大的迴響；再加上1919年朝鮮三一反帝獨立革命，日本大正民主運動等事件，在在衝擊著整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留學於東京、上海、北京的台灣青年想起自身處境的惡劣，紛紛組織團體，要想爭取台灣人應有的權利與尊嚴（張炎憲，1984：271）。在台灣島內，日帝懾於朝鮮獨立革命的震撼，自1919年田健治郎上任總督時，統治方針開始由以前的武官治台改為文官治台（張炎憲，1984：274-75），因此島內的政治團體才得合法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團體當以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最具影響力。文協成立於1921年，標榜“啓迪文化”，而最終目標則是喚醒台灣人的政治覺醒、鼓動民族自決的風潮（張炎憲，1984：278）。在1921-26年間，文協主導了整個台灣的政治運動。但台灣的政治思潮多半是受到外來思潮的引導，1927年文協的分裂就是受中國、日本社會運動的影響而發生的！

工資及對業主的反感，而反對解雇及要求復職的件數只占17.4%而已！這種「產業預備軍」的說法並不能使我們信服，我們還必須在經濟以外的因素中找尋1927-31年工運蓬勃的動力。

我們再從另一條綫索來觀察當時的工運。由表六：勞動團體年別增減表可以看到1927



● 1927 年台北木工工友會茶箱部會員大會



● 1927 年台北木工工友會建具指物部成立大會

(三)來自日本、中國大陸的鼓舞、刺激

1924 年 1 月，廣州國民政府決定採行容共聯俄的策略，當然這對國共雙方皆有利（謝春木，1931：51）。1925. 5. 30，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餘波震及全國，特別是廣州的沙面事件，充分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的革命性格；此外，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學生常勇敢地與民衆運動站在同一條陣綫對抗極權政府與帝國主義，使當時在上海留學的台灣青年有莫大的感觸。此種種現象都刺激著台灣青年赤熱的心靈，1926—27 的文協改組，上海大學派的學生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謝春木，1931：52）^⑥。

來自日本方面的影響則是日本勞動總同盟於 1925. 5. 24 分裂，運動方向轉為無產革命，以前的山川社會民主主義被摒斥，取而代之的則是極左的“福本主義”，自然而然，受到這種情勢影響的東京台灣留學生，回台之後對持「民主」意識型態的文協感到十分不滿（謝春木，1931：53）。

除了外來思潮的影響外，台灣島內的農民運動也影響文協逐漸由“日、台”民族問題轉向農民問題的批判，這已露出民族運動轉變為階級革命的徵兆（張炎憲，1984：285—86）；再加

上台灣總督府的分化策略，將從事台灣政治運動者畫分為穩健派、激進派，對前者以利誘之（包括政治、經濟），對後者則設法導之入罪，然後加以逮捕監禁（張炎憲，1984：288—89），因此 1927 年文協的分裂勢成大江東流擋不住了！

五、階級鬭爭是我們的目標 ——新文協的工運

分裂後的「新」文協，指導原則由原先的民族鬥爭轉化為階級鬥爭。這可由其宣言書上寫著「文化協會永遠是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戰鬥團體」看出（沿革誌，1973：1218）；亦可由其領導人連溫卿所提的報告論文《1927 年的台灣》看出其方向^⑦。

新文協運動方向轉為階級鬥爭之後，便傾全力於勞工運動組織上，其工運的範本是以上海總工會為準，組織、鬥爭方法亦學自該處（謝春木，1931：41—42）！它一方面致力組織全島機械工友，又引發一連串的爭議事件，如日華紡織大罷工、嘉義營林所爭議、高雄鐵工所爭議，這一連串大大小小的爭議對於全島勞工階級意識的覺醒具有啓蒙的作用，民衆黨系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即是承其餘蔭而發展的（謝春木，1931：42）。新文協的全盛時期在 1928

^⑥當時上海的台灣青年受中共影響的情況，詳見張炎憲（1984：286—87），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1983）第 2 篇第 2 章，研文出版，東京。

^⑦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351，1971，自立晚報出版。



● 1927年台北木工工友會細木部會員合照

年，指導的爭議高達23件（沿革誌，1973：1272），但在新竹事件與台南墓地事件之後，重要的幹部如王敏川、連溫卿都被逮捕下獄，而上大系統的人為逃避逮捕也紛紛避走大陸，一時之間，文協的指導幹部幾乎全部消聲匿跡，使其指導工運的力量為之一挫（葉榮鐘，1971：351）。

除了上述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外，文協本身尚存在著許多問題：

(1) 幹部之間的思想對立嚴重，主要是日本福本主義與山川社會民主主義之爭，以及大陸共黨“李立三清算運動”的影響。結果是連溫卿代表的「社民派」於1929年被鬥倒（沿革誌，1973：1263）。

(2) 幹部不諳台灣實情，常常直接採用外來的戰術，因此指導爭議時常慘敗（沿革誌，1973：1272）。

(3) 在爭議指導失敗之後，不能妥為處理善後（謝春木，1931：42-43）。

因此，文協所屬的工會會員漸次為台灣民衆黨系的工友總聯盟所吸收。在1929年，由於日帝全面取締逮捕台灣農民組合（即二·一二事件），並且杜絕台共的連絡，左派陣綫全面衰微，文協也隨之呈現頹勢，在本年度指導的勞動爭議僅4件而已！1930年以後，新文協的工運指導幾乎停止，逐漸為台共的“赤色

工會組織運動”所取代，就此打上休止符（沿革誌，1973：1272）。

六、溫和的改良 ——民衆黨的工運

讓我們再看看另一勞工運動的重鎮吧！從台灣文化協會分離出去的舊幹部在1927. 7. 10另籌組一個新的政治團體“台灣民衆黨”，其組成分子多半為地主、資本家，因而其政策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革社會制度之缺陷」（謝春木，1931：95），與新文協的「永遠為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後盾」大異其趣！由於民衆黨領導人的階級利害關係，因此在處理工運時，其標榜的口號為「全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同時進行」「本黨顧及農工的利益，對階級問題加以合理調和，以免妨礙民族運動的前進」（沿革誌，1973：1219）。據說這靈感還是得自於廣州的國民政府哩^⑧！

在民衆黨成立之前，已經有一些工友會的組織存在，有的是勞工們自己籌組的，有的則是民衆黨幹部們進行籌組的。在工友總聯盟成立之前，這些工友會都是靠民衆黨內有力幹部的個人關係來聯繫（謝春木，1931：217），這對於民衆黨而言，並不是一批容易動員的力量，因此民衆黨試圖進一步組織並強化他們與民衆黨的關連，由蔣渭水等人倡議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並且說服各地工友會幹部的同意，正式於1928. 2. 19成立，工友總聯盟的綱領規約取材自大陸的勞工團體與日本內地的左派勞工團體（沿革誌，1973：1244），與文協的指導原則取自上海總工會一樣，都是做

⑧：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的警察」頁238，1932，台灣總督府出版。

效外地團體而進行其勞工運動。

工友總聯盟指導下的工運以 1928 年最為蓬勃，總計 19 件，而 1929—31 年分別指導了 7、4、2 件^⑨，1932 年以後，總聯盟幾乎就停頓不前了！決定總聯盟興衰的重要因素除了民衆黨被禁之外，另外就是台灣共產黨的活動。總聯盟於 1930. 1. 2 召開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之後，其方針有逐漸激進的傾向，這正反映了民衆黨內部權力逐漸為左派人士（以蔣渭水為首）掌握的事實（沿革誌，1973：1250）。另一方面，由於台共「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的活動，以及共產黨員逐漸滲入工友聯盟之中，因此左傾的味道十分濃厚（沿革誌，1973：1255）。總聯盟本來打算於 1931 年的第四次大會時修改規章，但開會前一日（2. 18）民衆黨被禁，因而擱置不開，同年八月蔣渭水去世，聯盟實際上已瓦解。

除了民衆黨與台共的因素外，總聯盟本身的體質也十分脆弱，其構成份子很少是屬於近代產業的勞工（只有 3 個機械工友會及三個印刷從業員組合而已！而其它的工友會多半仍帶有基爾特〔guild〕的味道。）因此，在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時，便常顯得力不從心！（謝春木，1931：220—222）而這正彰顯出與文協工運相同的結構性限制——台灣尚未工業化至某種程度，因此無產階級的工人甚少，它們並不是強大到足以構成一個階級而進行階級運動。這可由當時罷工失敗後的工人多半又可找到其它工作，或者歸鄉種田而看出，這是人民尚未完全普羅化時才會見到的景象（沿革誌，1973：1229）。

七、再接再厲，

奮鬥前進的台共工運

當新文協、台灣工友總聯盟逐漸走入衰頹之路時，台灣共產黨却異軍突起，成為指導工運的新興生力軍。謝春木在其書中寫道：共黨



指導下的國際運動下已逐漸年年取得優勢，這是無可掩蔽的事實，也是無法避免的命運！在將來台灣解放運動上，不應忘記它給予敵人致命的影響。（1931：47）因此我們不能忽略台共在工運後期所扮演的角色。

台灣共產黨 1928. 4. 15 成立於上海，其工運的指導方針「勞動運動對策提綱」明載著：「在文化協會指導下的左翼勞動組合，受到福本主義的影響而陷入派系主義的謬誤；左翼工會受到民衆黨幹部改良主義的欺瞞而誤入歧

^⑨：這是沿革誌的數據，此數據與謝春木的數據有出入，謝氏的數據是 1928 / 15 件，1929 / 10 件，見其書 P. 230—236 頁。



● 1928年台北石工工友會罷工勝利紀念

誌，1973:1279—80）其後的運動策略完全根據此提綱來進行！

1928.8月，台共黨員林木順由上海潛行至東京，與日共中央恢復聯絡，並於10月成立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又與從台來東京的林日高會面，聽取島內狀況，而於1928.

11月及1929.2月分別傳達日共中央的指令，以後台共的「赤色工會組織」即是據此二月號文件而活動（沿革誌，1973:1280）。

但在1929年之前，赤色工會組織運動並無甚大進展，這種停滯的情況直到1930年台共實力擴大之後才稍見起色！赤色工會的實際運動方向就如其綱領所揭示，從三條路綫同時進行：

(1)組織新的工會。1929.4月由東京學術研究會回台的左派人士蘇新、蕭來福滲透入一些以前工會從來沒有開拓的產業。首先是基隆礦工組織，接著著手組織鐵路局的工人、高雄交通運輸工會的籌組，但在工會尚未成立之前即因日帝取締台共而崩潰⁹⁹。

(2)奪取左翼工會的指導權。

(3)促使台灣民衆黨、工友總聯盟的工會左傾。對於聯盟的幹部，表面上台共黨員倡議共同戰綫，但暗地則派遣工會組織者潛入，逐漸奪得指導權（沿革誌，1973:1289—90）。

雖然台共有如此完善的奪權計畫，但據沿革誌的記載，其指導的爭議只有4件，時間集中在1930.12月至1931.4月，這也是台共最活躍的時期。但自從1931.4～9月的瘋狂

途。因此本黨將派遣黨員至勞工運動的前綫以克服左翼工會的謬誤、暴露右翼工會指導者的欺瞞〔性格〕而使其工會成員左傾，展開左右兩翼的共同戰綫、促進台灣總工會的組織。〔我們〕依產業別、地區別而組織工會，設置支部，將之置於黨的領導下以進行日常鬥爭，並吸收優秀工人份子入黨。所有的鬥爭都是朝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向進行，〔我們〕加盟赤色職工國際，進行無產階級的國際任務。」（沿革

⁹⁹：日帝逮捕台共始於1931.3.24，至1931.10.29，提起公訴告一段落。（沿革誌1973：735—37）

本表係根據沿革誌頁1220—1223的「勞動團體累年調」「勞動團體系統別（昭和三年末）」「勞動團體員數及系統表（昭和三、四年）」「支那人勞動團體の業態別表（昭和四年）」等表所做而成。

● 1928年台北木
工工友會同盟罷
工勝利紀念



大逮捕之後，台共所有的成員皆身繫囹圄，其領導的工運也就一蹶不振了！

八、一頁振奮，但滄桑的歷史 ——總回顧

由以上三派別所指導勞工運動來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此時期工運的幾項重要特徵：

(1) 台灣的社會運動必須擺在世界史的潮流下觀察。我們由前頭的討論中，很清晰的看到新文協受到中國大陸工運、日本勞工運動思潮分裂的影響，台灣民衆黨的工運方針引借自廣州的國民政府，而赤色工會組織運動更是直接聽命於日共中央的指揮！這在在都顯示出台灣社會運動的特殊性格——受外來思潮的影響。

(2) 台灣的工運要放在社會運動的脈絡中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工運是隨著政治組織的變遷而興衰，而這正顯示此時期的工運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的，因為它被整合至文協、民衆黨的反對運動中，其本身的發展並非是源於台灣人

民的普羅化所自然引發的爭議，當政治上有任何風吹草動時，工運也立刻受到波及。我們看看1930年台灣工人（礦業、工業）只占全島就業人口的10.0%就知道當時尚未存在龐大的工人無產者（沿革誌，1973:1203）；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當勞工被解雇之後有辦法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就知道當時台灣人民並非完全無產化。由此可知，當時工運的蓬勃並非是累積了龐大的產業預備軍才引發的運動。

(3) 日帝要打擊的對象並非工運，而是文協與民衆黨，它所害怕的無寧是反日獨立運動。例如總督府警務局寫道：雖然在文協、民衆黨的指導下的勞工團體有75個，一萬多名會員，但由於職業別相差太大，並不見得有多龐大的勢力（1932:239-40），因此我們看到日帝打擊的對象並非針對工運而來！但是當時社會運動的領導人又有幾人能認清此點呢？文協與民衆黨的惡目相向只不過讓日帝有機可乘，個個擊破而已！



●新玻員工聲援彭如春

◎工人廣場◎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解嚴後的工運

■張力雁

——從新玻事件談起

7月15日，新玻公司臨時管理委員會主委彭如春被判刑六月，顯係官商聯手打擊新玻的工人自治行動。這一事件顯現解嚴後的工運仍是前途多艱。

解嚴之後的台灣工人的命運，會不會有所改善呢？那日日匍匐於工作枱上、生產線上的勞工，能否因擁有團結權、罷工權而改變其可悲的、被操控於股掌之上的宿命呢？會不會在政治的禁令解除後，早一日奮起呢？

審視新玻員工最近的爭議事件，將有助於看清勞工運動未來的阻力與壓力。

「彭如春無罪」

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半，台灣新竹地方法院下了一道判決：「彭如春共同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他人之財產，處有期徒刑六月，緩刑貳年。」

這一道對新坡公司苗栗廠廠長、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彭如春的判決，立刻引發起一陣強烈抗議。原本集聚在法院門口的二、三百名員工立刻拉開布條，寫着「私法毒立」，「彭如春無罪」等標語。

以目前法院的諸種判決來看，緩刑二年已算是相當輕的量刑了。然而，新坡員工要計較的却不是刑「量」的多寡輕重，而是「質」的是非黑白。「是無罪就無罪，不必假惺惺。」

然而，最令新坡員工不平的是：「任和鈞捲款幾億潛逃國外，騙去我們多少血汗錢，却能夠逍遙法外，也沒有被列為經濟罪犯。憑什麼要判彭如春六個月刑呢？」幾乎每個員工都這麼說。

事實上，新坡員工的問題與彭如春的官司都是資方與勞方長期鬥爭中的一環而已。

打從一九八五年新坡董事長任和鈞宣佈凍結員工存款並出國行踪不明之後。新坡即陷入停工困境。員工為了自救乃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成立「自救委員會」，並於十二月十日成立「臨時管理委員會」，為公司的復甦而慘澹經營。

正因為臨管會是新坡員工自治自營，也是唯一要回積蓄與工資的希望，建立在「勞工自治」的生產型態上的新坡公司逐漸恢復營運，有了盈餘利潤，股票也由當初跌入谷底的一元多，爬升到目前的六元左右。同時，工作人數雖然減少，但生產量却增加 10% 左右。

此一由虧轉盈，由倒閉中又站起來的公司，遂引起某些股東的覬覦。於是而有馬志玲、余先達等人的行動。他們試圖將「臨時管理委員會」取消，要求恢復「正常營運」但在股東會議沒有通過。

另外，為了重新控制公司，遂開始以法令，以官司對幾個重要臨管會幹部進行控告。首先是於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新竹市地檢處主任檢察官林朝榮告訴彭如春（臨管會主任委員）莊博榮及林胡銘（臨管會副主委）將被起訴，原因是拒絕移交經營權及臨管會不合法。

司法淪為資方工具



●「痛哉司法！資方有錢！操縱司法！」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二日，主任檢查官林朝榮又告知彭如春，五月一日勞動節發放慰問金一事，係犯了背信、侵佔罪，檢查官將提起公訴。同時還要求彭如春回廠告知員工，將經營權交出，等資方無法經營後，再進行第二次接管。

然而，「臨管會」却並非如林朝榮檢察官所說的「不合法」，而是由省社會處長趙守博主持、歷經六小時的爭論，始協商成立，並立有管理辦法。

檢察官林朝榮的偏頗態度導致新坡員工的反感，他們要求他「迴避」。原因是：「1. 外傳檢查官林朝榮在本案中收受紅包一千萬元。2. 林朝榮為新坡公司董事會董事賴源河教授的學生，而賴源河是新坡公司重整的監督人，亦屬於資方，林應予迴避。3. 林朝榮將帳冊提供

- 新玻員工在新竹地方法院前抗議司法不公。



給有利益關係的對方閱覽抄錄，顯屬違法。且每次開庭傳訊被告，均公然要脅交出代管的經營權。」

從林朝榮檢察官的態度即可明白司法的公平與否，有待質疑，同時，林朝榮公然要脅新玻員工「交出代管經營權」其意圖已昭然若揭。可見「官商勾結」的可能性是何其大。

為了迫使臨管會交出經營權，股東方面以馬志玲為首，不僅控告彭如春，更要該公司人事室主任控告臨管會委員謝淵雄。為什麼是彭如春和謝淵雄呢？因為目前經營權以三個人為主體：彭如春為廠長暨臨管會主任委員，謝淵雄為會計部主管，負責財務帳目，另莊伯榮則為臨管會副主任委員，兼營業組組長。

資方如能拖下其中一人，狀況便非常容易控制了。於是而有彭如春被告，謝淵雄被撤辭、調職之事。彭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謝之整理舊日爛帳、重估公司資產等對欲要把持財務的董事而言，更是一大阻碍。這就是何以官司頻生的原因了。

從彭如春的官司，我們可以看到資方的真面目。在公司倒閉邊緣，無人聞問，却又在「勞工自治」而恢復生產時，企圖攫奪成果。其手段也並不光明，所謂「背信侵佔」就只是因臨管會通過發放五一勞動節慰問金。這八百餘萬元，事實上也與資方無關，而是勞工自動自發在生產線上「自治」生產的成果，是份內應得的一點獎勵，每個人分發下來，剛剛好上萬。連彭如春也僅發到三萬。

然而，只是分享一點自身的勞動成果，卻要揹上「背信罪」，難怪員工不服了。

勞工須團結一致，為爭取權益而奮鬥

當然，資方的目的不在於將彭如春、謝淵雄投獄而後快，而是想將經營權收回，以便賺錢。然而，每一個員工都知道，經營權一旦被收回，諸董事、總經理的爛帳會不斷出現，屆時新玻員工又重臨任和鈞潛逃海外時的悲慘局面，這是誰也不願見的。因此，新玻員工只有團結一致，奮力一搏，自力救濟一途。

新玻的問題，恰恰可以作為解嚴後勞工運動的借鏡。質言之，資方可以結合金權、黑道勢力、特權、關說等等手段，並運用官僚及司法機構，使勞工在繁瑣、不公的法令條文及行政命令下逐一屈服。

然而，新玻事件也給了一個奮鬥的方向。在生產線上的勞工，基於命運一致的認識，較易組織動員，堅強地團結起來。以七月十五日在新竹市地方法院的情況來看，舉布條、點燈籠、送麪包、送飲料，顯得井井有條，遠比民進黨群眾運動更為組織化，這是其可敬佩之處。

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愈益深刻，且官僚與資本家深度結合，工人抗議事件會日漸增多，工人反抗的對象，也將不僅止於資方，而可能是某個法院（司法系統）、行政單位（縣市政府科局）、甚至是經濟結構。

◎工人廣場◎

這樣的勞委會 能為勞工謀福嗎？

■張望

8月1日成立的勞工委員會，主委鄭水枝不諳勞工業務，較為勞工講話的勞工司司長湯蘭瑞與立委謝深山反被排除在外，不論從人選或組織上看，勞委會都難寄予厚望。

隸屬行政院的勞工委員會在八月一日正式成立，這是多年來首次有中央級的勞工行政單位，然而從籌劃成立過程及組織人選來看，未來勞委會能夠為增進勞工福利與保障勞工權益盡多少力？實在很難寄予厚望。

去年底，國民黨提名的勞工團體候選人，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裡大敗，加上這一年多來經常發生的勞工自力救濟事件，迫使國民黨無法不面對勞工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事實，但是在心態上，顯然一仍故舊，因此，在勞委會的組織及人選仍然充滿「淡化勞工問題、資方佔優勢」的色彩。

主任委員鄭水枝，曾任省建設廳長，現任內政部政務次長，對勞工業務一直相當陌生，籌備以來也發表了不少驚人語，諸如：「委員人選有資方代表，不會影響決策」、「雖然解嚴了，但是勞工仍然沒有罷工權」之類的話。

相信大多數的勞工寧願相信這是鄭水枝個人的外行話，而不是代表政府的勞工政策。但是不管怎樣，一個甫成立的，大家希望能夠突破以往窠臼的政府機關，由這樣的人來領導，的確令人擔心。



●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工，却不能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

而副主委的人選，數度被考慮的有洪慶麟、湯蘭瑞、謝深山、徐學陶，最後決定職訓局的洪慶麟與勞保局的徐學陶；捨棄了對勞工行政有長久經驗的現任勞工司司長湯蘭瑞，與表現還算稱職的執政黨籍勞工立委謝深山。

理由不外乎湯蘭瑞與謝深山「太為勞工講話了」，使行政院高級長官不甚喜歡。其實湯蘭瑞這些年在勞工司的表現，只是還算敬業，並不積極，也少開創性，連這樣的人選，當局也有所忌諱，那麼，對增進勞工福祉，當局到底有多大的誠意呢？



熱衷於「升官發財」的工會領袖，為她們說過多少話？

國民黨沒有照顧勞工的政策

勞工保險、職業訓練，甚或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固然都相當重要，但這些屬於監督與技術上的層次，是做與不做的問題。除了這個層面之外，勞資關係、勞工團結權的行使、勞資爭議處理方式，才是更核心，更重要的問題。

從人選與組織上看，勞委會似乎偏重勞工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比較不考慮結構性的調整；這個中央級的勞工行政單位，似乎對這些勞工結構性的問題，沒有具體的主張，而國民黨多年來只有經濟發展政策，沒有照顧勞工政策的做法，在這上面完全表露。

當初行政院堅持「八部二會」的原則，未能將勞委會提升到「部」的單位，改以委員會的型態成立，已使不少冀望勞工問題全面改善

的人，感到失望，現有的人選與組織結構，又使人對未來的可能績效打了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各級工會在這個過程裡表現得很特別。在台灣由於執政黨有意壓制，工會的功能非常萎縮，該為勞工講話時，往往聽不到聲音。而這次籌組勞委會時，但見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錫琪，及駐會常務理事路國華，數次率領工會會員四處拜會，要求須有一名勞工代表當副主委，並多增加勞工代表在勞委會的席位。

這些工會領袖，對「職位」爭取的熱衷，遠超過平日對勞工事務的關心。最後行政院決議設三名勞方代表的委員，都出自工會，副主委的職位卻落空了。如果按照以往在工會的表現，來看未來勞委會的勞工代表，情形實在也不樂觀。

◎世界思潮◎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導論(上)——

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理論自馬克思以降，迭經流變。從盧森堡（Rosa Luxemburg）、布法亭（R. Hilferding）、布哈林（N. Bukharin）、列寧、巴蘭（P. Baran）、弗蘭克（A. G. Frank）、雷（P. P. Rey）、阿里吉（G. Arrighi）到伊曼紐爾（A. Emmanuel）、阿敏（S. Amin）對帝國主義理論都有所發展並賦予新的解釋。英國 Bristol 大學經濟系教授 Anthony Brewer 1980 年出版了“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一書，對各家理論有要言不繁的評介，本刊將陸續刊出。——編者

■陳宗文譯

■Anthony Brewer 著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近兩、三百年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居統治地位，生產率的水平大為躍昇，但也造成帝國主義勃興，世界不同地區的財富與權力空前不平等。

國家在政治上獨立了，並不保障真正的平等。一些所謂獨立的國家却幾乎像直接受殖民統治一樣深深陷入不平等、剝削的統治體系中，飽受帝國主義的宰制。要瞭解歐美帝國主義一定要把它放進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中去考察。

帝國主義

近二、三百年來，發生了完全改造了世界的兩種相互關聯的發展。首先，生產和生產率所達到的水平在以前似乎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想像的，工業以及許多產品的全部性

質都變得面目全非了。我們的前幾代人如何可能想像在自己家裏收看從月球上播向廣大觀眾的繪聲繪色的彩色電視節目呢？第二，世界不同地區的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也增長到了空前的程度。美國工人可以觀看電視，而非洲和亞洲的工人却營養不良。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我們傾向於把這些事實看作理所當然的，而忽視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決定著當代世界的全部性質。只有考慮這些事實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在幾個世紀時期內演變的歷史過程，人們才可能理解並分析它們。

這個世界還有不大顯著的第三種發展，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升到了統治地位。在這種經濟組織形式下，生產活動是由在市場上出售其產品和僱員工資勞動者的許多不同的私人企業進行的。在發達國家中，資本主義幾乎完全取代了早期的組織形式（農民經營的農業、封建土地所有制、奴隸種植園）。在不發達



• 「大魚吃小魚」是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

的國家裏，農民經營的農業仍然支持著大多數居民的生活，但是這些地區已被納入世界市場和世界範圍的產業化體系，這種體系把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徹底破壞了。

只有在這種不平衡發展過程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歐洲列強所開闢的殖民帝國，以及在二十世紀初期達到了高峯的歐洲和美國對世界的軍事和政治的統治。軍事霸權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先進的技術意味著先進的軍事裝備和把武裝人員運送到世界各地的能力。有了先進的經濟組織，就有可能支付武裝力量的經濟費用，並且為取得破壞性的效果而部署他們。帝國擴張的動機主要也是經濟上的。目前，某些歷史學家企圖否認這一點。然而東印度公司的職員、西班牙的征服者、南非的礦山投資者、奴隸交易者清楚地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他們要發財致富。他們為了經濟上的收益而殘酷地剝削殖民帝國，把它們當作廉價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來源，當作壟斷化的市場。帝國的富於浪漫色彩的形象（旗幟飄揚在遙遠的前哨，等等）是有誘惑力的，但是嚴肅的研究工作則須集中於更為根本的經濟問題上。

我並不認為帝國歷史上的每一件事件都可直接從經濟上得到解釋。經濟利益是通過政治過程實現的，政策是由複雜的國家機器實施的，而整個制度產生了它自己的衝力。例如，大

英帝國的歷史大部分取決於確保通向印度的道路的需要。比如，英國的地中海政策不應該只是用在地中海地區得到經濟利益的說法來解釋，而應該從維護整個帝國的需要的角度來解釋。一定要把帝國擴張的總趨勢解釋為資本主義發展全過程的一個因素。

同樣，各正式帝國的創立（在單一的旗幟和單一的政治當局統治下）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且或許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式的政治獨立（有國旗、航線並在聯合國有席位）儘管可能是真正獨立和發展的前提，但並不保障真正的平等。一些國家從來沒有正式被吞併，而且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正式獨立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但是它們却幾乎像直接受殖民統治地區一樣被深深地拖進了一種不平等的、剝削和統治的體系中。不發達國家仍然按照極不平等的條件來參與貿易和投資的世界體系。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範圍內提出的關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各種論述，我不想探討非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也不想探討前資本主義帝國或者蘇聯的擴張主義，這並不是否認這些主題（尤其是最後一個主題）的重要性；而只是想劃一條線，擬定一個合理的首尾一致的論述範圍。

我認為，一定要把帝國主義（按照這個詞的幾個不同含意的任何一種來說）放到世界範

國內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中去考察。與此相適應，任何帝國主義理論，只有在把它當作整體來考察時，才有意義。這就決定了本文的結構。每一個主要作家的著作都必須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因為正是他們對整個體系的“看法”，才決定了他們對這個體系的各個具體方面的態度。因此，本文的主體是按大體的年代順序考察相繼出現的主要理論家。在每一部分中，我都把重點放在強調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經濟理論的邏輯一貫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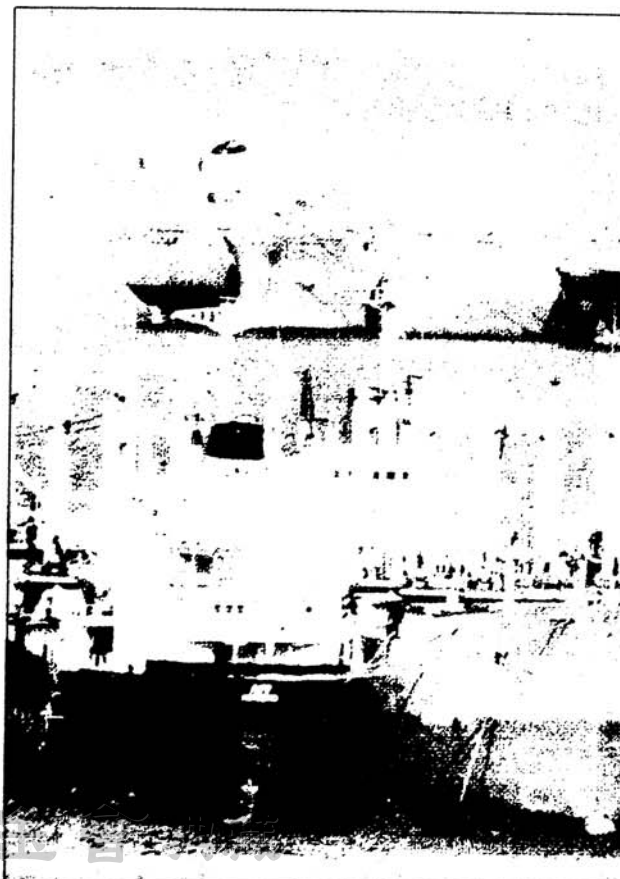
歷史概況

重商時期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國以掠奪美洲的貴金屬和販賣奢侈品及非洲黑奴為主，並未觸及社會制度和生產體系。重商時期的貿易和生產方式，到底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還是一個由前資本主義社會所構成的體系？此一歷史階段描述的分歧，是關於資本主義定義的爭論的一部分。

在探討這些理論之前，我想非常扼要地、有選擇地概述一下歷史的發展。這種概述必然是不充分的。

我們最好從十五世紀開始談起。那時，歐洲與印度或者中國相比，並不富有，技術也不先進。阿拉伯城市統治著那時存在的遠距離貿易，控制著歐洲和亞洲之間的貿易聯繫，以及印度洋的主要航道。然而歐洲某些地區在武器和船舶製造業方面處於絕對的領先地位，而且具有利用它們的能力和刺激因素。這就是海上帝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爆炸性擴張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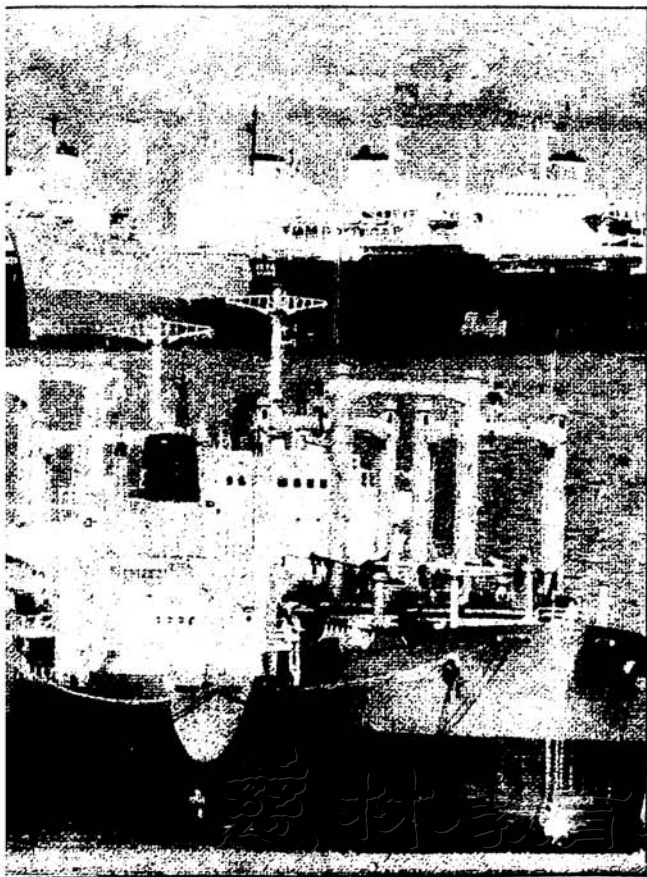
在重商時期（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的前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佔據著統治地位。西班牙帝國是以中美洲和安達斯山脈的貴金屬採礦業為基礎的；貴金屬經過巴拿馬運往西班牙，沿途在“南美北海岸”一帶受到海盜的夾擊。礦山以及為礦山供應食品的農業，是靠強制勞



●現代化的油輪及貨櫃輪

動來開發的。葡萄牙帝國更像是一系列貿易站。它們控制著香料貿易，後來又控制著非洲奴隸買賣，相對地講，它並未觸及社會制度和生產體系。同時，西歐商業城市的不斷擴大，有賴於穀物的進口，這些穀物是由普魯士和波蘭的農奴生產，從波羅的海的港口運來的。

在十七世紀，重點轉向了加勒比海地區和巴西的奴隸種植園的食糖生產，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繼失去了對海洋和帝國主要地區的控制權，這種控制權首先落到荷蘭人的手裏，後來又落到英國人和法國人手裏。在適宜於產糖的地區勞動力不足，於是便出現了“大西洋三角關係”，這就是將製成品（特別是槍支）運往非洲，將奴隸運往美洲，然後再將糖運回歐洲。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貿易站被擴大為領地，而且在歐洲出現了一些將發生更深刻變化的跡象，這些變化在下一個



了後期資本主義的交換功能。

世紀中得到了發展。

在重商時代，儘管洲際貿易中所交換的貨物主要仍然是奢侈品（糖、香料、烟葉等等）、奴隸和貴金屬，但歐洲商業開始統治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南美和中美洲的社會組織和生產組織被徹底的、強制地改造了，全部居民被滅絕或被取代，歐洲對非洲和亞洲的影響，一般說來或者是表面性的，或者是全面地破壞性的（奴隸貿易、對印度的掠奪，等等）。

應該如何描述這種貿易和生產的形式，是有爭議的。法蘭克和華勒斯坦堅持認為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而其他人士，如巴納吉、勃列納和雷則把它描述為主要是由前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一個體系，它們由交換連接起來，並且包括著正在發展起來的歐洲資本主義中心。這種分歧是關於資本主義定義的大爭議中的一部分。

一八〇〇年前後，是劃分重商時期和古典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主要標記。在經濟領域，已經建立了以商品經濟和僱傭勞動為主要特點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政治方面，美國、尤其是法國的革命，提供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同時，以英國為中心的產業革命，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這是資本主義的主要中心區進行持續的資本積累和發展的時期。

到十八世紀為止，以為市場而生產的私人企業僱傭自由工資勞動者為特點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美國已經完全建立起來；在西北歐的其他地方，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也已建立，但程度較差。生產率提高得相當快（不過不像以後時期那麼快），並且已經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水平。這種普遍的技術進步的一個因素是在國家支持下的科學發展。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科學革命”時期。它與軍事和商業的需要有著密切聯繫。天文學和時間計量對於航海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科學是牛頓的物理革命的核心，從而也是嶄新的自然觀的核心。

一八〇〇年前後的幾十年是劃分重商時期和古典的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標誌，在政治領域內，美國革命，尤其是法國革命創立了新的政治概念。英國取代了法國成為主要的殖民國家，而且卓有成效地控制了印度，使印度成為大英帝國的關鍵部分。

以英國為中心的產業革命，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它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場革命延續的時間很長，但是總的來說，的確應該把它看作人類歷史上意義最重大的突破。它給人民大眾可能帶來暫時的倒退，但是從此以後就有可能設想借助於生產的機械化來消除貧困和苦工。馬克斯關於社會主義可能性的看法公正地以工業化所創造的潛力為依據。

產業革命之所以在它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發生，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結合的結果（哪個因素比較重要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到了這



●美國在西德佈署潘興飛彈——軍事霸權意謂有先進的技術將先進的軍事裝備和武力運送到世界各地。

個階段，英國的生產組織已經全部資本主義化了，這種生產組織是以廠商為基礎的，這些廠商的規模比較大（按以前的標準來衡量），數量多，有彈性，而且受它們之間激烈競爭所驅使。這些企業可以從大量的城市無產階級中招收具有它們所需要的熟練程度的工人，而且當市場狀況發生變化或者當節省勞動的革新使工人多餘時，企業又可以同樣快地解雇他們。英國控制著世界市場，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優勢，因為最重要的原料（棉花）必須進口，而大部分產品要出口到國外市場。英帝國的利潤使投資的取得更加容易。這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世界的其餘地區都以驚異的目光注視著它。

廣義的產業革命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這是資本主義的主要中心區進行持續的資本積累和發展的時期。新的工業方法在一個接一個工業部門中得到了採用，同時傳播到歐洲其餘地區和北美。這就是馬克思寫作時所處的背景，到十九世紀末為止，德國和美國作為英國在工業上的主要競爭對手而興起，日本也開始了工業化。

日本的情況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歐洲和歐洲殖民地以外資本主義得到發展的唯一例子。那些主張受歐洲支配是其他地區不能發展的原因的人可能指出，日本是不受歐洲控制的大多數地區中的一個。那些主張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敗主要取決於內部的社會結構的人可能指出

，日本崛起的社會結構和歐洲的封建主義有許多共同之處。

世界一旦被瓜分完畢，進一步的領土擴張就不得不以犧牲敵對的殖民帝國為代價。壟斷資本、資本輸出、以及帝國主義內部的對抗，這些相互關係的發展，終於導致了兩次大戰的爆發。

在十九世紀，那些被合併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區大大擴張了。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取得了正式獨立（在英國的某種支持下），但仍處於英國的非正式的控制下。亞洲這塊幅員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陸，為資本主義敞開了大門。英國人有效地控制了整個印度次大陸，並且以武力迫使中國允許進口鴉片。法國人得到了印度支那，荷蘭人控制了東印度群島。俄國人穩步地把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邊界線向前推移。非洲的一部分地區被殖民化了，結果，剩下的一部分地區在這個世紀末成了爭奪的場所。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並被開發了（淘金熱、放牧者等）。

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最終被劃分為「發達的」和「不發達的」地區，確立了目前世界經濟的這種基本型式。新的貿易形式的出現，取代了標誌著重商時期特點的奢侈品貿易。發

達資本主義的中心區出口製成品，換回進口的糧食和原料。雖然進行交易的貨物的實物量大膨脹起來，然而運輸工具與其他工業部門一道已經革命化了，能夠應付這一局面。

十九世紀末標誌著另一個重大轉折點。這就是開始了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在列寧之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仍然用“帝國主義”的術語來描述二十世紀的狀況，而用其他術語來描述前幾個時期的擴張主義。我將沿用即將探討的每個作家的用法。

這時，廠商的規模迅速擴大，而且採取卡特爾、托拉斯等形式的壟斷迅速擴展。二十世紀是“壟斷資本”的時期。同時，資本輸出也大大增加了，增強了而不是取代了商品貿易。它首先採取向政府和公共事業貸款的形式，但越來越採取向生產企業“直接”投資的形式。在二十世紀初期，大部資本投在有資源基地的工業部門和有關的基礎設施中。全球的自然資源都被開發，供發達的資本主義中心區的資本主義廠商利用。

同時，還剩下少數地區（尤其是在非洲）仍沒有納入殖民統治之下，爭奪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權的鬥爭還在進行者。拉丁美洲逐步從英國的勢力範圍過渡到美國的勢力範圍。世界一旦被瓜分完畢，進一步的領土擴張就不得不以犧牲敵對的殖民帝國為代價了。主要列強，尤其是德國（正在興起的強國）和英國（最大的帝國）之間的緊張形勢急劇發展，終於導致兩次世界大戰。

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同意：壟斷的出現，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內部的對抗的爆發是聯繫在一起的，但關於這種聯繫的確切的性質還有較多的爭議。這就是那時由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寧所闡明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主題。

萎縮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區域更加一體化的結果，便是資本主義世界更為明顯的劃分為“發達”與“不發達”這兩個極不平等

而又相互補充的部分。

二十世紀內，又出現了幾種發展。第一，由於開始減去了俄國，接著減去了中國、古巴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等，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控制的地區縮小了。總之，這些地區的脫離或者是戰爭的結果，或者是劇烈的國內鬥爭的結果。這些國家存在對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國際貿易比生產總量增長得更迅速，（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大廠商的國際投資甚至增長得更快，從而形成了在世界範圍內活動的“跨國公司”。尤其由於“歐洲市場”的發展，流動貨幣資本的市場也國際化了。儘管大多數不發達國家取得了正式獨立，但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緊縮了的地域內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緊密地一體化了。如果孤立地考察一個特定的民族國家，就不可能理解這個體系。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非常明顯地劃分為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他們不僅在收入水平上彼此不同，而且幾乎在經濟社會結構的其他各方面都彼此不同。如同前幾個時期一樣，也有少數難以確定的情況（南歐的半發達國家，以及像以色列和南非那樣的特殊情況），但是眾所周知，他們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那麼小。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把一個國家歸於這一類或那一類，決不會有什麼困難。這樣明顯的分裂顯然是世界體系的一個主要的結構特徵。

發達國家（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日本）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逆境和三十年代的蕭條，但後來又經歷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長期繁榮”。總之，生產率水平在整個世紀中大大提高，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幾乎完全取代了其他形式。發達的“中心”區內部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增長得尤其迅速，所以它與不發達的“外國”的貿易在全部貿易量中比重是比較小的。在典型的發達國家的經濟中，比較大的工業部門占統治地位，同時，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按照現代資本主義方法組織起來的服務部門。農業占僱傭勞動力中的很少一部分，但它採用

了現代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在某些情況下，農民是靠補貼生存的。）大多數居民是掙工資的勞動者。工會組織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却也至少保障工人階級能分享由於提高生產率所帶來的利益。具有自由選擇和保障個人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完善地建立了起來。發達國家包含著主要跨國公司的總部，並且是技術發展的主要中心。

這些國家生產和出口品種繁多的製成品和初級產品。它們從不發達國家進口的商品，主要是在自然條件最有利的地方生產的初級產品和由廉價勞動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

再談不發達世界，“三塊大陸”（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大相逕庭。在拉丁美洲，土著社會在幾個世紀以前幾乎被完全破壞，具有歐洲文化的白人或混血人統治階級在同樣長的時間內形成，而現代國家機構幾乎與歐洲同時建立起來。拉丁美洲一些較大的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非洲和亞洲國家的要高得多，但比歐洲國家的又低得多。同時，它們具有不發達的所有結構特徵。

在亞洲，主要的前資本主義文明被納入資本主義勢力範圍的過程更加緩慢，而且時間也晚一些。較大的亞洲國家具有牢固的確立的土著統治階級，相當大的技術能力以及就絕對量來說十分巨大的工業部門（儘管與人口數量相比還很小）。然而，平均收入水平却很低，廣大農民和工人處於飢餓水平，或者更低一些，失業人數很多。另一方面，某些較小的亞洲國家却相對地工業化了。當然，日本完全屬於另一種類型。

非洲承受了歷時幾個世紀的奴隸貿易的破壞性後果，但是歐洲人直到“帝國主義”階段才真正進入這塊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這要比進入亞洲和拉丁美洲晚得多。這是最不發達的大陸，工業部門很小，收入水平很低。

儘管存在這些差別，人們仍然可以談論“典型”的不發達國家。其特點是：在現代工業中就業的人數很少，存在著經常性的大規模的失業和就業不足，而且農業和服務部門規模大

、生產率低。工資和收入都很低（除了一小撮特權階層外）。除生產出口商品的種植園外，農業主要由小農經濟構成。農民所有的農場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糊口”經濟，而被納入了市場體系。對外貿易一般在全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相當大，基本上進口資本貨物、中間產品和原料，而以出口初級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型的製成品來償付。出口所得還必須支付外流的股息，利息和專利權稅。不發達國家一般與發達國家發展貿易，而不在不發達國家相互之間進行貿易。這種型式顯然非常不同於“未被觸及的”前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由於他們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果。

不發達國家的階級結構也顯然不同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和發達國家。那裏的工業規模小，而且受採用節省勞動的生產方法的外國廠商支配。這就是說，發達國家的基本力量，即產業工人階級和地方的產業資本幾乎不存在。由於不存在這些基本力量，在這種制度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跨國公司的當地代表和子公司、貿易界和地主。農民階級和失業或半失業的城市“流氓無產階級”是人數最多的階級。

這樣，發達與不發達國家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相互補充的兩個部分。這個世界體系是過去延續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的產物。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地區，它採取了非常不同的形式。一個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應該說明所有這些形式。

歷史唯物主義

一種生產方式是一個簡單的、基本的社會關係結構，這種關係結構是分析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出發點。然而，每一種生產方式的穩定都是相對的；每一種生產方式都導致生產力發展，並且在過程中變化自己的職能，從而導致現存的結構崩潰，為下一種生產方式所取代。

本文考察的各個作家在許多問題上都持有

不同意見，但是他們有一種共同的認定。他們都認為經濟制度的演變起主要的作用，也都同意，帝國主義一定要用“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解釋，這種方法當然來自馬克思。在這一節中，我想簡短地概括馬克思的方法，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幾個要點。

馬克思從生產社會的這個觀點入手；魯濱遜的故事是神話。從技術的、自然的觀點（生產力）來看，或者從勞動的實際活動（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是人類作用於自然環境，改造自然環境滿足自己需要的活動。然而，作為一個社會過程，生產還包括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即（社會的）生產關係，它們支配著生產資料的佔有和商品的使用。這些關係並不是有意識地選擇的結果；比方說，歐洲今天的生產組織，並不是人們自覺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工廠中的雇傭勞動比中世紀的農奴制或古代的奴隸制更好而進行決策的結果。這是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的產物。

馬克思主張，社會分析一定要從社會關係的結構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選擇或動機出發：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而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馬克思斷言，經濟“基礎”最終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是他的著作中最有爭議的觀點之一。我認為，一般地討論這個問題，是無益的；檢驗的方式在於：通過對具體事例的詳盡分析，能否證明它是合理的。我打算把它始終看作進行研究工作所允許的一種假設，採用它是為了進行論證，並且觀察一下從經濟結構出發進行分析，可以走得多遠。

馬克思堅持必須用抽象法。因為社會非常複雜，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握住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相反，我們必須把最簡單的和最基本的社會關係獨立出來，抽象地論述它們是怎樣發生作用，又是怎樣相互配合的。然後，我們才能用由此形成的種種概念來分析現實的（或者“具體的”）世界。

然而，單獨的一套抽象概念並不能用來分析所有的社會。馬克思稱贊“古典”經濟學家（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作家，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圖），因為他們認識到使用抽象法的必要性，但又批評他們，因為他們把適用於分析他們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概念應用於各個歷史時期，從而不能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特徵。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特定的，不同的結構，而對每個發展階段都必須有一套單獨的抽象過程。抽象地說，一種生產方式是一個簡單的、基本的社會關係結構，而這種社會關係結構是分析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出發點。這些基本的形式只有有限的幾種，這對於馬克思的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

每種生產方式（除最簡單的、原始公社方式和未來的最高級的共產主義方式以外）都決定著一對對立的階級，即生產者階級和剝削他們的非生產者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關係是生產方式的主要的、決定性的特徵。在抽象的這一層次上，不應該首先把階級看作人們的集團，而應該把階級看作在社會關係結構中的對立地位。尤其不能孤立地考察一個階級，因為只是由於它同另一個階級發生的關係才構成一個階級；沒有被雇傭者便不可能有雇主，沒有奴隸便不可能有奴隸主，如此等等。

在這裏，有必要說幾句話，請讀者注意。我認為，最近“結構主義者”對馬克思的理解已經脫離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儘管馬克思主要強調的是社會關係的客觀結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結構是操縱著其“承擔者”的幽靈般的“實體”。這些結構僅僅存在於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中，而純粹形式的生產方式僅僅存在於分析者的頭腦中。如

果我說：“資本主義發展了生產力”（或者某種相似的公式），這就是用簡短的語音來說：“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所描述的那種社會組織促使人們採取這樣的行動方式，以引起產量和生產率的提高”。

馬克思原來的思想是簡單明瞭的。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繼起的諸階段。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的結構，都可能使自己“再生產”，這就是說，既維持生產力（通過替換已經消耗的生產資料等），又維持生產關係（使一個階級從屬於另一個階級的狀態持續下去）。當然，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再生產機制是有區別的。然而，每種生產方式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每一種生產方式都導致生產力發展，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引起它自己職能的變化，從而最終使現存的結構崩潰，並為序列中下一種生產方式所取代。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成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進行對帝國主義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分析不同的社會之間的互相作用，這些社會是以不同的佔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為特徵。

根據這種論述，社會是從（有些模糊不清的）原始公社階段開始，經過古代階段和封建階段，演變成馬克思（也是我們的）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古代生產方式由奴隸和占有奴隸的自由民之間的對立來決定。而古典式的封建生產方式包含著不自由的農民或農奴階級為了當地的使用而進行的生產，他們控制著自己賴以糊口的小塊土地，但在超經濟強制下，不得不養活封建地主階級。

人們研究得最為經常的生產方式，即馬克

思詳細分析的唯一的生产方式，是資本主義的方式。這種方式的特點是普遍的商品生產，即許多互不協調的不同生產單位為了市場而進行的生產；同時，加上財富的兩極分化，因此，生產資料所有者階級與沒有財產的自由的工人階級相對抗。除非按照所有者可以接受的條件，不然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把非所有者（工人）排斥於生產過程之外。工人不得不把勞動力（工作能力）出賣給資本家，以取得工資，用來購買生活所需的物品。

馬克思認識到，不能把非歐洲的歷史塞到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各階段繼承性的框框裏去，他提出了另外一種方式。即“亞細亞的”方式來說明這個問題。亞細亞方式的要點是：它的發展不會走向更高的階段，而且除非被外部力量打斷，就會持續地存在下去。他還承認，各階段的繼承性可能會由於外部的影響尤其是征服而遭破壞：

“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

他堅持的是必須把對生產方式的分析放在首位，而不是各個階段按照某一種順序相繼出現的必然性。

無論如何，實際的社會不可能被歸結為一種單一的抽象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具有幾種生產方式的特徵的關係可以在一種「社會形態」中結合在一起，而以其中的一種占統治地位。這種解釋最近已經復活。這種解釋有許多優點，其中之一是他可

以包括小商品生產方式，這種方式從未佔據統治地位，因而沒有列在各階段的清單中。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是佔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的獨立的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

我們可以把生產方式看作基本的組織形式，這些組織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以用多種方式結合起來，並且構成複雜的事物。只要我們這樣認識，那麼各種可能性的範圍幾乎是無限的。我們可以（從概念上）單獨地、小心地分析有限的幾種方式，然後用以構成若干複雜的事物，以便對豐富多采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這是一種科學的方法，簡單思想的發現可以澄清複雜的問題。

簡單來說，馬克思留下的並不是對歷史的全面解釋，而是對歐洲歷史的不完整的概述，對生產方式的分述以及一些關於如何展開他的分析的令人感興趣的簡短指示。把馬克思的作品奉為「聖經」是愚蠢的。在研究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中心問題是分析根本不同的社會之間的互相作用，這些社會是以不同的佔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為特徵的。馬克思的幾篇論述印度和愛爾蘭的著作並不特別有幫助。另一方面，如同我將要表明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

國家

作為統治階級意志表現的國家機器，必須能夠滿足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基本需要，否則就會招致混亂和經濟倒退。

在對帝國主義的任何分析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活動都必定起著重要的作用。國家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即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利益而行動，這幾乎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原則。儘管馬克思很少用詳細的分析來支持這種觀點，但是在馬克思著作中，關於這方面內容的論述却很多。國家是他計劃研究並寫出著作的（許多）主題之一，但終於未能如願

以償。

國家為什麼要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的一般原則，換句話說，維護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這個道理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在正當情況下，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利益是組織得很完善的，而且國家機構中的高級人士（政治家、官僚、軍官等）顯然也與維護現存國家組織較休戚相關，而在社會制度的大變革中，這種國家組織，不大可能有倖存的希望。總之，在不能滿足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如果不輔之以積極的替代措施，就會招致混亂和經濟倒退。支持現存制度並不一定意味著不動腦筋的保守主義。相反，這需要經常適應於變化著的環境，並且可能意味著違背統治階級中某個特定部分的利益。其結果也不一定是國家會在這個任務上取得成功；客觀情況可能使國家無能為力，而且也不應當低估愚昧和錯誤的歷史作用。

在這種結構中，仍然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政策和不同程度的自由。這裡關於國家的行動會增進「統治階級」利益的斷言並不是自明之理，甚至還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實際上，資產階級內部總是存在著不同的利益，所以整個階級的利益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似乎相信，有一種天意指導著政治家，使他們的行為必然與「擴大再生產的客觀需要」相吻合，或者其他類似的說法。這種分析當然是不恰當的；政策是在特定的政治和思想結構內進行政治實踐的結果、階級衝突的結果、以及階級內部和超越階級界線的各個局部利益衝突的結果。人們常說國家具有某種「相對的自主權」。在這一方面已經進行了一定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一般理論的建立尚處在早期階段。

這就在帝國主義理論中造成了一個空白。本文所探討的大多數理論，都把重點放在說明某些國家政策為資本家階級（主要部分）的利益服務的經濟分析上，並以此解釋有關的政策。我將遵循文獻的主要趨向，著重論述帝國主義經濟學。經濟分析即使不是其全部內容，至少也是其重要部分。

（待續）



• 除了做一個稱職的母親、妻子之外，女性還有能力做別的事情。

◎世界之窗◎

請聽，尼加拉瓜婦女 解放運動者的呼聲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九日，在加州的聖荷西，召開了一個由當地教會、工會和婦女解放組織聯合舉辦的會議。下面是代表尼加拉瓜婦女的馬格大·安力吉（Magda Enriquez）的講話：「我們學會我們能做些什麼」（We Women Learned what we were capable of doing）。

■會喜珠譯

婦女投入戰鬥

要談今天尼加拉瓜婦女之前，一定要先談一段她們參加尼加拉瓜解放運動的光輝戰鬥史。

西班牙人佔領尼加拉瓜的時候，當地的印地安婦女爲了不願給西班牙人生下「一個」奴隸而拒絕生育。後來的人承接這個傳統，繼續戰鬥，直到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四年，桑定 領導赤足游擊隊抵抗佔領

尼加拉瓜的美國海軍，在這場戰鬥中，婦女不再以洗碗、洗衣服的方式幫助男人，而是也拿起武器，投入戰場。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桑定民族解放陣綫推翻獨裁政權，當時，很多婦女自組游擊隊，加入戰鬥行列。

在這之前，我們一直無法發起婦女運動。雖然一九六九年我們在Chanatles的Juigalpa小鎮召開過一次全國婦女大會，但只有三位婦女露臉，其中一位早已在山區打游擊的

婦女，力主會議應繼續進行，她就是現今仍倖存的第一位桑游女隊員 Cladys Baez。

那一次，我們進入戲院，她跳上舞台，對着我們兩位婦女聽衆，講起演來，她說：這一天，對尼國婦女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因為，第一，有生以來，我們頭一次召開會議，討論婦女在尼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這空蕩蕩的劇院擺明了：還有許許多多的事等着我們去做。

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九日，我們在 Managua 的巴瑪教堂 (Las Palmas) 集會，婦女磨肩接踵，擠滿會場，尼加拉瓜婦女面對國事協會 (Association of Nicaragua Women Confronting the national Problem)

就這樣誕生了。這個協會由 FSLN 的男女成員共同建立，雖然參加桑游組織的女同志很多，但我們並沒有成立所謂桑游婦女支部。

AMPRONAC 不是一個黨派組織，而是有各種不同政治派別參加的開放團體，大多數婦女會員也根本不屬於任何黨派。

男女須一起解救

AMPRONAC 由男人和婦女共同組成，這表示我們認為婦女問題不單純只是婦女們的問題，而是男女的共同問題，所以我們要一起工作，一起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組織起來，並不只為婦女問題而奮鬥，因為歷史證明，我們不能在談及女性解放時，而不涉及男性解放，至少在尼加拉瓜——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受到壓迫的社會裏，就是這樣。

我們要團結成一股勢力，為解放而奮鬥，我們確知要為 AMPRONAC 的政綱而奮鬥，首要之務，就是推翻獨裁政權。

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不坐牢、不受刑、不被殺就不能組織起來的社會，所以我們成立人權團體，到一個個監獄，和律師一塊把政治犯弄出來。我們絕食抗議，佔領教堂，領導示威，打街頭仗。也學會了如何擊退國民兵，更重要的是，我們學會了如何祛除恐懼，並聯手作殊死鬥。



游擊隊的創始者，奧古斯托·桑定(中立者)揭開了尼加拉瓜反美鬥爭的歷史序幕。

尼加拉瓜這個非常的經驗，使身為女人的我們知道，除了做一個稱職的母親，妻子以外，我們還有能力做別的事。

在婚姻市場裏，要成個好母親、好妻子，就得夠溫柔、夠女性化，而這特質，在當時，又與蜜司佛陀 (Max Factor)、露華濃 (Revlon) 分不開。尼加拉瓜的女人把棕色頭髮染成金黃色，一九七一年熱褲、靴子在美國流行開來，尼加拉瓜的女人在華氏一百度高溫下也跟著穿起靴子。只有少數的女人能抗拒得了蜜司佛陀、露華濃、熱褲或靴子的媚力，而那些受不住誘惑的多數女人，就顯得極平凡了。

不管在城市或鄉間，墟邊或木造樹房裏，女人在她們丈夫的眼裏，只是個僕人。在農村裏，未經先生介紹，太太不會過來跟你說話。她甚至連工人都不如，她作工，而她的丈夫領她的薪水，如果他高興，他再施恩般地給她一點。

農村的婦女幾乎百分之百不識字，如果家裏只供得起一個孩子念書，就送男孩去，因為他將來得照顧一家子的生活，而女人只要能嫁個丈夫，學會煮飯、洗衣和照顧小孩也就夠了

。這是一九七七年，當我們開始組織婦女戰鬥力時的情形。

婦女參與艱苦建國

在拉丁美洲的幾個獨裁政權中，我們的經驗大概最慘痛，我們受政府軍蹂躪，還得看著孩子們——游擊隊的未來成員被砍殺。我們終於體悟到，如果沒有全國半數人口——女人的加入，革命就不能成功，於是，我們開始行動了。

首先，我們學習如何組織群眾，學習如何帶頭打仗，後來，又學著帶領衝鋒陷陣。當時的西部戰線——桑游革命的重要戰線之一，就是由一位女性同志德列（Commander Dora Maria T'eliez）所統帥。由實際行動中，我們的婦女不但發揮了各種潛力，我們的形象為之改變，老百姓也開始對我們刮目相看了。

我們不高談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種種理論，而在戰場、路障中、山區、城市間，實地行動。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的勝利，不只是尼國人民的首次勝利，也是我們婦女的一次重大勝利。

現在請各位想像一下，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大勝利的時刻，那時，處於權力真空狀況，政權剛由一群精於游擊戰的青年接收，你們想，這會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當時，我們既年輕又沒有民主的歷史背景，根本不懂如何組織民主政府，甚至不知道所謂民主國家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我們得先面對經濟問題，我們的經濟破產，不值錢的紙幣充斥銀行，蘇穆薩（Somoza）洗劫國庫，盜走黃金，只留下三百萬，另外，原料、技術也依賴美國。還有一個更大的打擊，就是戰爭耗損了衆多人力，有五萬尼國人戰死——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1.5，製造了四萬個孤兒。

我們在談論婦女問題時，為什麼要談這些呢？因為我們也是參與者。如果我們要建設一個民主國家，婦女也必須透過政府組織，得到應有的地位。此所以我們要爭取國會（Council



勝利後，FSLN被支持者擁進尼國大城馬達加坡

of State) 席次、爭取一間辦公室、審議各種嘉惠女人的計劃。我們也處理女性勞工問題，這樣，婦女的合法權力才得以保障。

要求婦女實質的參政

尼國獨裁政權的法律，採自歧視女人的羅馬法，因此，我們必須改掉那種族長式的法律，給家庭每一份子同等的權力，更得肯定婦女在解放戰中的角色。

我們在社會安全和福利會議上討論：兒童照顧中心應該建在哪兒？中心該如何建？我們最關切的是如何安頓二百個孩子，不像技術人員一意只想建個可容納八十個小孩的美麗大象建築。最後，我們建好中心，決定教育計劃，我們希望孩子在開放的環境中成長，所以要小男孩、小女孩一塊兒玩坦克、積木、鍋子、鏟子、洋娃娃，也注意課本內容，不要孩子們對女人有錯誤的刻板印象。

對我們而言，這都是實踐民主，當我們討論在哪兒建兒童中心時，我們參與了實務；當我們爭取到了我們需要的婦科醫院，也就是向民主邁進。我們利用一個星期六為二十萬兒童

注射疫苗，義工們花了二年時間根除百日咳、麻疹和小兒麻痺，識字的老百姓教不識字的老百姓讀書寫字……，這都是在為民主植根。

另外，在工廠，我們計劃成立一個AMNLAE的工作委員會，委員會的婦女將帶動其他婦女，並且要讓領導人認清，我們不但能為男性工人的領導，也能為男性、女性工人們的領導，這樣，女性工人才能在勞資交涉過程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些，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得教婦女勞工法、勞工運動，以免她們被迂腐的領導者愚弄了。不論在農場、合作社、工社、職業團體、學生團體等等，我們都以此法紮根。

我們反對只重表象，而無實質，我們不要一個象徵性的女政府官員，說什麼：「哦！我們終於進了國會了。」除非有人能讓我相信：英國婦女的地因柴契爾而改觀了，或者，因最高法院有一位女性法官，美國婦女的合法地位就確立了，否則，我們絕無法效尤。

美國不斷侵略尼加拉瓜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為了保護辛苦的革命成果，而無法善用能促進民主的種種資源於建設工作中。美國政府對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威脅，日甚一日，有五千個美國海軍駐紮宏都拉斯，十二艘潛艇航行於我們外海，我們的情況真的很危險。別以為我們患了妄想症，你們看，從一八五五年，美國侵略尼加拉瓜，華克（William Walker）海盜自己登上總統寶座，立下奴隸合法制，想把尼加拉瓜納入美國版圖，之後，一共就侵略了尼國十二次。

我們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現在武器已全在老百姓手中，我們要保衛每一寸土地，在這樣的時刻，民主已是另一課題了。

目前反革命分子不能奪走一寸土地，但是他們能帶來痛苦、創傷和毀滅。他們打擊我們一下，回到宏都拉斯，美軍訓練團再組他們，供應武器，他們就能再出發。

去年十一月，別人的小孩忙著迎接耶誕節，而我們的孩子却忙著玩一種遊戲——如何以



美國在宏都拉斯訓練尼加拉瓜叛軍

最快的速度從你家跑到防空洞。我們不喜歡這樣，但我們不是戰士，不得不這樣。

我不喜歡再披軍裝，離開孩子，奔赴戰場。我不願見我十四歲的男孩，正當該玩足球和籃球的年紀，却得從軍，現在他已是大隊裏的小隊長，我以他為榮，却不以為喜。

當然，我不要我的孩子死在戰場，我也不希望因為疏忽，我們的努力成果遭到破壞，所以我們要繼續奮鬥，像格瑞那達島那樣的事件也就不會發生在尼加拉瓜了。

我們相信人民，希望一切能更好，這信心使我們一九七九年得以大勝，也使我們能繼續堅持下去。

對你們的老百姓，我們有信心，我們希望你們從事健康、教育、兒童福利計劃的社服工作人員能看清你們的稅收正一塊塊的用在槍殺尼加拉瓜老百姓的子彈、大砲上。而這時，尼國却在教育老百姓，給他們健康和福利。

當然我希望你們的外交政策能改變，彼此有些聯繫，這樣，有一天，我們就能以兩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秉持像貴國祖先一樣重視人權、人性尊嚴的原則，並肩而坐。這不僅是為了那個國家的男女，也不僅是為了那個社會的男女，更是為了整個民族的尊嚴。

譯自：Nicaragua: The Sandinista People's Revolution by Sandinista Leaders", Pathfinder press, 1985年出版。

◎世界之窗◎

美國華爾街的醜聞

■黃雁

最近一年多來，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最惹人矚目的話題之一是 Insider Trading（即圈內人利用圈內消息作股票買賣非法得利。）戰後，美國的股市是擔任著調節資本的機能。雖然，華爾街的 Insider Trading 向來存在，但並不是常態（絕不像台灣的股市，除了投機外，不具幫助資本運轉的功能）。但是從去年 5 月至今，不斷有華爾街的頭面人物因 Insider Trading 被起訴，其地位一個比一個高，其中包括年輕、前途無量的“雅痞”、數名在大投資公司負責企業合併業務部門的高級主管，以及有名的華爾街大投資者如 Boesky 等。Boesky 同意付給美國證券管理處一億多美元的罰款，牽涉金額數目之龐大可以想見。

民衆在驚訝之餘，開始感嘆年輕一代缺乏職業道德，為此，證券管理處處長募捐了三千萬美元給哈佛商學院，捐款的目的是要加強商業道德（Business Ethics）的訓練和研究。

職業道德的衰落雖是事實，但這當然不只是個人道德的問題，它也反應了美國社會經濟的一些變化。簡單來說，這是因為近年來美國資本運作愈來愈短期性，愈來愈具投機性，這對華爾街人士的影響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客觀方面，（尤其是在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Deregulation〕之後），金融市場投機風氣愈來愈盛，投機工具及方式不斷翻新，原有的競賽規則很多被打破了，違規賺錢的機會增加，獲利率及誘惑性急劇升高。譬如說，在華爾街的投資公司生意中，企業合併（Merger &



●華爾街的中心——紐約證券交易所。

Acquisition）在短短幾年之間已成為利潤的主要來源。就主觀的人的方面來說，一般公認年輕一代急功近利較上一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不僅是華爾街，而是整個社會生產體系發生劇烈變化的具體表現，是整個社會運作規則愈來愈短期性的具體表現。

由此一事件所暴露的這些問題，令人不得不感嘆美國社會人力資源分配上的浪費。在這個以金錢為一切度量標準的社會，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投到最賺錢的行業，因此華爾街，尤其是投資公司的工作，已成為最具高社會地位的工作。最有希望的年輕人紛紛走入華爾街，但是他們在做些什麼呢？大部分是有組織的、非生產性的投機行為。或許有人會辯解說這些投機行為還是必須的，是仍擔任著潤滑的功能的。或許，他們是必須的，但是如果一套制度愈來愈需要更多的高級腦力來潤滑它的運行，不正表現這套制度的“效率”也正在衰落之中。

◎文 藝◎

錢，可不是白來的

■張辛欣·桑擘

蘭州市。孫中山先生在反映了他的經濟理想的「建國大綱」中，把這個位於中國版圖正中的城市設計為全國鐵路交通的中心樞紐。

武賢勝，三十九歲，甘肅省建築公司工人，黑瘦的臉上透出一股精明勁兒。在朋友的帶領下，我們來參觀他那「已經八個現代化」的家。

什麼「八個現代化」，純粹是大家合着伙逗我，等到咱們國家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我這「八個現代化」的家，夠不夠小康之家的水平，難說。咱們國家，拿了工資不正經出力的人多，聚在一塊兒嘮，想編出個花色品種，就編排我「八個現代化」唄！（囑，陝北、甘肅方言，意即聊聊天——作者注）

你們也都瞧見了，我這家裡到底有什麼。論住房，和普通工人一樣的面積，而且我這六樓是冬天冷、夏天熱，算是最沒人愛的。這房建得有問題，根本不夠工程標準，樓頂還漏雨呢，就驗收合格了！你們看看我家的天花板，和小娃子的尿布片子似的，全是漏雨鬧的。就這活兒，在國外，敢？！沒好房子，有什麼好傢俱全白扯。全沒用。

不怕你們見笑，我這八大件，也就是他們編的「八個現代化」，全是從嘴裡省出來的。在國外，烟不捨得抽，酒不捨得喝；到城市裡轉轉，進一家餐館，出來，再進一家快餐店，又出來，看什麼，什麼貴；乾脆不吃中午飯，回工地吃食堂的晚飯。就這樣算著省，分派着錢，這一群第納爾（DINAN，伊拉克等國貨幣——作者注）是電冰箱，那一伙兒費爾斯（FILS，亦是伊拉克等國貨幣，一千FILS合一DINAN——作者注）夠一件尼龍衫……才能

帶回東西來。嗨，別管怎麼省吧，我們這批出國的，沒一個空手回來的，冰箱、彩電、收錄音機、照相機、縫紉機、自行車、手錶、電子計算器這八件洋玩意是全齊了，也有人買了摩托車，就差買個槍或者原子彈了。在國內，你別說工作兩年，就是幹半輩子也難置齊了這麼多。

不，不是。我們可不是「援外」，不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支援亞非拉的窮哥們兒。我這次出國，發現人家「亞非拉窮哥們兒」的日子，並不都比我們差。我們是勞務輸出，純屬勞動力出口；轉包發達國家的工程項目，到發展中國家去幹活兒。我去的國家是伊拉克，工程項目是化工廠的土木建築，老板是法國人，領工是德國人，小工頭呢，是日本人。夠花俏的吧？其實，別管哪國人，在伊拉克方面看，全是法國承包商弄來的勞動力；而法國人呢？又是他們弄來的勞動力；一買一賣，沒什麼誰支援誰，誰是誰的盟邦、親戚之類的說頭。

我是八二年到伊拉克去的，先是工程隊裡傳出一股風，說是有出國任務，大家全挺高興的。你得知道，我們四百多人的工程隊，連坐過飛機的都沒有，誰不想看看美利堅、大日本什麼模樣？後來，說得貼譜了，是第三世界，

到伊拉克去。大家就涼了，多數人不想去，且不說天氣壞，熱；單是三天兩頭地開仗，鬧「兩伊戰爭」，就夠可怕的！再說，沒吃過豬肉，咱還沒見過豬跑嗎？前兩年，援外的事情，誰不知道？援助越南，養了個打咱們的，援助阿爾巴尼亞，餵了個罵咱們的，還有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錢花得流水似的，換來什麼呢，包袱！咱國家有能力行了，自己本就窮，還盡心竭力地拿錢換累贅。而且，援外的工資低，什麼也買不回來，頂多是手錶、自行車，犯得上嗎？！後來，領導開會動員了，先講了意義，能給國家掙外匯，能有活幹——我們工程隊長期開工不足——等等，接着說：「這一回出國，不是援外，是勞務輸出；原則是利國家、利單位、利個人。明說吧，這一次是叫大家往回抱彩電、電冰箱去的；誰去了，保證提前實現家庭現代化！」這，就炸了鍋了，報名的人真不少！

到挑人時，有些報了名的人又打退堂鼓了，說家裡有困難、老婆病、孩子小，自己身體不好之類，就是不去了。爲什麼呢？三件事：頭一件，伊拉克和伊朗的戰越打越凶，怕死在那裡，站望鄉台，當異鄉鬼；第二條，怕領導說話不算數，將來弄出個紅頭文件（即黨政機關的正式文件——作者注）來，一推了之，抱不回彩電，白讓太陽晒兩年；十年浩劫，弄得當官兒的取信於民成了難題；第三條，那幾天正演一個外國電影『三樓以上是青天』，講在外當勞工如何苦，大家當它是前車之鑑。我不怕死，也捨得家；更不怕苦呀累呀的，人是苦蟲兒，不累不成麼！所以我還是堅持去。是啦，咱們誰也別瞞著誰，我那時的家庭關係不好，老和老娘們兒吵；願找個遠地方散散心，去去穢氣。現在？現在離啦。我出國，她跟別人

亂搞；我不要她了！

政治審查咱不怕，我一點兒疤也沒有，技術也合格，咱是四級水暖工嘛！按規定，二級工就行。臨出國，辦了十幾天學習班，學習外事紀律什麼的；有後來用上的，也有根本沒用的。比如「不得到黃色場合活動」、「不得擅自代表國家發言論」之類，根本用不着；有妓院，你逛得起嗎？不想抱彩電回來啦？！「代表國家發言論」，我倒想代表呢，有人拿我當國家代表嗎？除非那人是傻子。當然，學習學習好，省得丟咱中國人的臉。衣服費也發下來了，弄套光光鮮鮮的中山裝，叫他們看看，別看咱不代表國家，咱還代表著民族呢！準以爲咱們是混不下去了，跑到他們那出賣勞動力的。

我們隊一共六十八個人，一個隊長、三個組長、一個黨支部書記、六個支委、三個黨小組長。除了隊長算「中方領班」全脫產之外，別人全是不脫產的幹部，和工人一樣幹活。對外介紹，也說是工人，你要是說：「這位是黨支部書記，是領導」，洋鬼子才不聽呢——黨派幹部，在他們看來，還不如工會幹部呢！可後來，德國領班有事也知道找我們的書記講了，明白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黨了。

出咱們海關，連護照的相片也沒對，數數多少本，數數多少人，就上飛機了。

坐飛機，原以爲是件騰雲駕霧的美事，真的一飛，很沒勁！還不如火車呢！什麼也看不着！到拉瓦爾品第，飛機加油，同機的外國人在機場買點巴基斯坦貨，我們呢？一個外幣也沒有；瞧瞧，算了。到了巴格達，嘿！這就是首都？還不如蘭州哪！駐伊拉克使館的人接我們出機場，又沒查箱子。海關的人一個一個數

，數一個，拍一下我們的肩膀：「朋友」。「朋友」——六十八下拍完，朝我們招招手，還是「朋友」。使館人說，那位是關長高級助理，說是懂中文，其實光會兩個詞：「朋友」、「好得很好」——後一個還是錯的，改不了啦！我當時就想：他們海關就這水平，穿得却和元帥似的，咱們的海關人員咋就不能穿好點兒，幹什麼非穿得和棉包似的呢？等我回國，嘿！咱們的海關員們也是「元帥服」了。

休息兩天之後，到工地去。坐汽車，跑了兩天路，到了。到了？就這？咋和北大荒似的呀？那工地可真荒涼，從此我們叫它「南大荒」。「北大荒」冷，零下四十度，「南大荒」熱，零上四十多度。（他所說的是攝氏度折合一百一十度F——作者注）天冷可以多穿，熱可真沒辦法，又不能把皮剝一層下來。

工作是真累。在國內，大集體小自由地幹慣了；到人家那，還真累呢！可是累也累慣了，而且愛加班多幹，國外那加班工資可高！不靠加班工資，那「八大件」也買不齊！工資，每月是折合八百美元，國家拿大頭，個人分小頭。分到手裡的，除了國內工資一份照發，再發一份和國內工資一樣數目的外幣工資，再加上五花八門的補助什麼的，月收入差不多一百美元吧。所以，得加班多賺錢。這得看怎麼說，比起國內工資，我仍掙得夠多的了。和國外比，也得看跟誰比。是不是？

和工頭的關係不好。他老想打人。可咱中國人心齊，他要打，真不是對手呢！他頭一次打人，我們就都不幹活了，也不說罷工，就是不幹。結果，領班說他是豬。此後，他不敢動咱們一手指頭，但還是罵人——聽不懂，光知道是罵。愛罵不罵，聽不懂，白費他的唾沫星子。慢慢地，咱們也感覺到咱們也有不對的地

方，確實是懶散，不如日本人、香港人下死力氣幹活。後來，黨支部書記說話了：「咱們『大陸隊』要是還幹不過『港台隊』，可夠丟人的！」於是我們就悄悄地賽開了，勝者當然是我們。香港人、台灣人也包了一個工程施工，工資比我們高，工效也比我們高，所以叫他們「港台隊」嘛！不，總工效確實比我們高一點兒呢！因為他們人少機器多唄！

施工是全面立體施工。咱國內全是先蓋房子，再搞水暖，最後是進機器設備並且安裝，他們不是，他們同時幹。所以，剛和「港台隊」比賽時，還鬧了個笑話：那天的工程進度表上是砌牆一米七十五公分，下午四點就幹完了，我們一商量，超額完成任務吧！於是到下班時，又砌上兩層水泥磚。第二天凌晨兩點，領班來敲我們的門，說：「把超額的那層拆下來！」我們氣壞了，這小子，為什麼見我們多幹活反而生氣？！他解釋說：「今天凌晨四點，安裝機器的吊車要從牆頭上把吊臂伸進去吊機器，你們砌了一米九十公分，吊臂進不去了，不拆不行！」原來，人家竟這麼科學！只好拆，拆到三點五十分才完工。四點，吊車來了，吊完活，剛好七點半，又輪到我們重新砌。從此以後，總結了一條經驗，不能瞎超額完成任務！人家的工程進度表是電腦算的！

我是水暖工，但我沒有工作時，就給瓦工們當小工；我們水暖工作忙時，瓦工也幫我們。我們也科學着呢！團結協作嘛！這，就看出咱們祖國的優越性了；別的國，咱不是笑話他們，確實是極端自私！他們的施工隊，誰也不幫誰。咱們的老鄉們，也不錯，他們「港台隊」也互助。台灣人和香港人相比，當然是台灣人互助精神強，有人性、講義氣。外國人，一般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咱中

國人，多數是「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少數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咱中國人頂好，也頂壞，少數人頂壞。不，我是講工人們，外國的資本家，比咱們的少數人還可惡呢，他們還不是靠拿大家發財？！

我們和台灣人關係挺好。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大，但是哥兒們還是哥兒們。有一回，「港台隊」有個人說：「你們大陸人聰明，會修長城呢！」我說：「長城是咱中國人的，不光是大陸人的。」他說他是「阿山」，不是大陸跑過去的。是真正的台灣人。我一聽，喝，這位是「台獨」吧？他還說既不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不信共產主義統一台灣。我想，這有什麼好爭的，說：「咱哥倆全是工人，甭爭政治，咱倆先統一在一塊兒幹活兒，等着瞧吧！」少談政治，不傷和氣。

說真的，沒一個地方的工人和咱們的似的，他們整工頭、領班的招術很多，多少年練出來的本事啦。我們沒給資本家幹活的經驗，招兒少。但我們有一招很靈，就是剛才說的全體

不幹活，泡着磨洋工。我們是集體行動哪！

錢，可真不是白來的。那熱，你們準受不了！露天地裡，哪都燙手，那汗，流得跟洗澡似的。但是，宿舍裡有冷氣；吃得極好。這兩條，可比國內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棒。

臨回國，東西也買齊了，有的是現貨，有的是國內提貨。可是，聽說不叫出海關。大家弄了張他們的出關限額單，一對照，真是超額了。後來，台灣哥兒們說：「他們的海關，專門吃賄，送點東西就行。」送什麼呢，台灣哥兒們講：「原來我們回去探親時，送他們清涼油；現在，『老虎油』不行了。建議送他們中國扇子。」結果，還真行！

回國以後，我就成了富翁啦！

我是寡婦媽養大的，獨苗一根兒。慣壞了，嘴飄，胡瞞。媽死了，習慣却改不過來了。我初中畢業之後，先是在劇團裡燒鍋爐，受不了劇團的氣，調進了工程隊。

我？我當然算生活好的。今後的打算，當然是娶個新媳婦唄！

（轉載自美國華僑日報）

詩潮 再出發！

〈第五集〉要目

高 準 主編
一九八七年 月出版

- 偉大的鄉土詩人陶淵明（編輯部）
- 我對新詩的看法與期望（皮介行）
- 浪漫主義的新高潮（邱振球）
- 東風夜放花千樹（古露琴）
- 民族詩選（古典詩）康有為、高準等 9 人 13 首
- 中年代詩人作品（鄧權、藍采等 6 人 11 首）
- 台灣當代青年詩人大展（廖漢等名家名派 48 人 55 首）
- 五十年代大陸新詩（高準選新）蘇辰等 16 人 20 首

廿五開二〇六頁，重磅複透紙精印，定價一四〇元。
函購處：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六二巷四六一二高準收，掛號發書。
台北市讀者歡迎電話：七八二二七六〇訂購，當面交書只收二二〇元。

◎文 藝◎

七十年代

大陸新詩選析 (中)

■高準

(七)流沙河

《傳略》

流沙河(一九三一—)本名余勛坦，四川金堂縣人。他的生平已詳見五十年代部分。(見〔詩潮〕第五集)他於一九五七年因《草木篇》一詩而被打成右派後，經過了二十二年的鎮壓，到一九七八年五月被宣布摘帽。年底調到縣文化館工作，開始重拾詩筆。七九年夏，他特意的又寫了《草木新篇》與《草木餘篇》兩組詩。《草木新篇》共八則，茲選錄四則。

《詩選》

虞美人

不幸的紅顏，
有幸的紅花。
從來無花名呂后，
百姓愛憎分明。

梧桐

葉出聽夜雨，
葉落舞秋風。
何必枝棲鳳凰，
但願身經斧鋸，

化作一張張的薄板，
嫁一條條的直弦，
好將陽春的回憶，
去向人間彈奏。

牽牛花

左旋左旋左旋，
爬高爬高高，
種子入藥，
又名黑丑。

楓與銀杏

一個說秋天是紅色的，
一個說秋天是金色的，
畫家說秋天有各種色彩，
秋天說我沒有任何顏色。

(一九七九年伏夏於沱江之陽)

(選自《流沙河詩集》，一九八二)

《作品簡說》

《草木新篇》與《草木篇》之撰雖相隔近二十三年之久，精神上却遙遙相貫，都是托物諷刺之作。稍不同的是，《草木篇》五則有較緊密的連繫性，各則單獨抽出來看就不免單薄而有不完整之感；《草木新篇》則其八則可以完全各自獨立。現在未

選的四則，是筆者認為比較弱的。

第一首《虞美人》，雖極短而諷刺得却很有味。他借楚漢之際紅顏薄命的虞美人（虞姬）在後世被用為花的名稱一事，而聯想到「從來無花名呂后」，緊接着銳利的轉出了「百姓愛憎分明」的結語。「呂后」所指為誰，當然大家都知道。令人發會心的微笑。用語似隱還直，似直還隱，可說是雋永有味之作。

第二首《梧桐》，是諷諭而兼言志之作。杜甫詩云：「碧梧棲老鳳凰枝」，傳說裡梧桐是供鳳凰來棲息的，可見其清高尊貴的風貌。然而時至下世，梧桐却只能「身經斧鋸」。但作者立刻聯想到梧桐也是製琴用的材料。故寧可「身經斧鋸」，但願「嫁與直弦」發出正直的聲音，並將轟立時所吸取的「陽春的回憶」，傳播給人間。

第三首《牽牛花》，大陸學人呂進在其近著《新詩的創作與鑑賞》一書中曾加以引用並有精要的申述，茲錄於下：

「《牽牛花》是『托物言志』的咏物詩。全詩一開頭僅以兩個詩行、十二個字就含意無窮地畫出了『牽牛花』的詩歌形象：『左旋左旋左旋／爬高爬高爬高。』靠『左又左』而上爬的人世間的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牽牛花』浮現在人們眼前。接下來，以兩個詩行、八個字結束全詩：『種子入藥／又名黑丑。』『黑丑』，在中藥裡是一種清熱解毒的藥物。把『牽牛花』的存在與得勢，作為一種教訓，作為一種苦口良藥吧，把鬱結多年的病患統統瀉出去。『黑丑』這個名字特地入詩，可能因為這兩個字容易給人造成不美的印象。《牽牛花》充滿詩人對『左旋』『爬高』者的痛恨、鄙棄之情，對它終於被除掉而變為中藥店裡的『黑丑』的歡愉、興奮之情。而體現在『牽牛花』形象中的，還有詩人對時代的深入思考與真知灼見。情，是深刻的情；意，是感情化了的意。」（呂進：《新詩的創作與鑑賞》，pp. 331-332，一九八二，重慶）。

第四首《楓與銀杏》，呂進同書中另一處也有申論。他以此詩來作為多義聯想的說明之例。他指出：「這裡的詩歌形象有多意性，不同的讀者即可以有不同理解。理解之一：有感於主觀主義，『楓』因自己在秋天是紅的，便以一概萬，說秋天是紅色的；『銀杏』因自己在秋天是金的，便以偏概全，說秋天是金色的；『畫家』因自己作畫要用多種色彩，便以己推人，說秋天有多種色彩。他們，都是以主觀代替客觀、以片面代替全局的藝術形象。理解之二：有感於極左年代。在極左的政治運動中，一個善良清白的人便會得到花樣翻新的罪名。『楓』、『銀杏』、『畫家』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從自己心中的隱私出發，隨意去向『秋天』潑污水，以致他們羅織的種種罪名無比雜亂、極其矛盾。理解之三：有感於捧場之風。『楓』、『銀杏』、『畫家』都以自己色彩的語言對『秋天』說着溢美之詞。而『秋天』却始終保持着樸實與謙遜。等等。」（呂進，前引書，p. 344）。

我們先後選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與《草木新篇》，但流沙河並不是專以「草木」為題材而已。他的後期作品尚有不少佳作，如同樣寫於七九年的《太陽》，及八〇年所寫的《妻頌》等（分別長達二百餘行及一百五十餘行），都是內涵豐富而極有功力之作。《書魂入我夢》一詩，寫文革時所有的書籍被送進「紅衛兵總部」去焚燒的悲劇，也寫得細膩動人，永留歷史見證。

（八）雷抒雁



《傳略》

雷抒雁（一九四二—），陝西涇陽人，出生農家。一九六二年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一九六七年畢業後到寧夏青銅峽工作了三年。一九七〇年參軍。一九七四年起任《解放軍文藝》詩歌編輯，出版了詩集《沙海軍歌》和《漫長的邊境線》。一九七九年，發表《小草在歌唱》一詩，寫文革中無辜而慘遭酷刑殺害的女黨員張志新的悲劇，引起了廣泛矚目，繼即以該詩獲得「一九七九—八〇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獎」。一九八〇年，復以《小草在歌唱》為書名出版了詩集。

《詩選》

種子啊，醒醒

你這地球的良心，
泥土的思想，
世界的生命！
種子啊，種子，
醒醒，你醒醒！

呼喚你的，
是金色的溫柔的陽光；
是熱淚盈盈的脈脈的春雨；
是輕輕的急切的東風……
這塊土地上呵，
早該茂林蔥蔥！
可是，我們碰到的
是多麼討厭的一片土層：

它是沙子、石頭
和鹼性的泥土組成。
這裏是這樣的光滑，
這樣的平靜，
沒有花朵的誘惑，

也沒有草葉的騷動！
像沉睡一樣，靜！
像死亡一樣，靜！
風是無法把它們搖醒的，
誰知道，
那僵化的頭腦裏，
是一片怎樣自私的夢！
難怪這兒，
空虛得令人惆悵，
惆悵中一片寂靜！

呵，難道這塊土地就此陷入絕境？
白茫茫的世界，
再不會有花，有草，
有大樹、森林，
有綠的色彩，
有不息的生命？
呵，難道這塊土地就此進入洪荒？
鬧嚷嚷的世界，
只有冰冷的雨，
只有沙子、石頭、鹼性的土
及其家族和親朋？

我嘲笑你，
堅硬的土層！
看見了嗎，
那是誰，已頂開了一道裂縫？
那是誰，已在你腳下蠕動？

黃黃的，嫩嫩的腦袋，
白白的，瘦瘦的身子，
那是誰的生命，
已經在土層的黑牢裏覺醒？
是一株小草嗎？
是一棵白楊呢，
還是一叢渺小的刺蓬？

這樣新，這樣嫩，
水靈靈的，通身透明！
好呵，種子，
我歡呼你從沉睡中猛醒！
這一片萌芽，
才是這個世界的希望，
才是理想、未來、光明和繁盛！
才是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翁！

哈，從那土層的縫隙中，
陽光不是滲進來了嗎？
雨水不是滲進來了嗎？
呼嘯的風，
簡直就是春天的命令！
長起來吧，長起來！
不能再久等了，
我們甚至把血，把汗，
都澆進了這道裂縫！

可別小看這一片萌芽呵，
嫩生生的，通體透明。
不，那是從黑牢裏沖出來的勇士，
那小小的兩片子葉，
掙脫了種子的堅殼，
那片葉子上有不卷刃的刀鋒，
才如此勇敢地頂起僵硬的板層，
呵，那是壓不死的生命！
也只是因為有它們，
地球才不會像月球，
或別的星斗那樣荒涼和冰冷！
它們是應春天之召而來的，
世界已厭倦了寒冷！
在這個季節，
禁錮，封鎖，專制……
已經不再時興，
世界要繁榮，

一切沉睡的種子，
都要覺醒！

我的歌，唱給明天，
（雖然，此刻還有痛苦的鬥爭！）
明天，
這裏將是一片草原，
將是一片森林，
綠葉和花朵，
在讚美陽光；
一根根枝幹，
像琴弦，
任風的手指去撥動！
那時，板層已經鬆軟，
鋪在草根上，
真正像“公僕”，
在服侍着綠色的生命！

呵，我在如此痛苦地、興奮地呼喊：
醒來吧，種子，
種子，醒醒！

1979年7月草於蘭州
8月改於北京

（選自雷抒雁詩集《小草在歌唱》，一九八〇）

《作品簡說》

文革時期雷抒雁廁身部隊，似乎沒有遭到什麼麻煩。他早期的詩，大致也是以隨順潮流的頌詩為主。到四人幫打倒後，他開始反省，及至張志新事件揭發出來後，他終於在思想上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張志新是一個忠貞的女黨員，在文革期間却在完全無辜的情況下被她的黨處以極端殘暴的酷刑而後

槍決，在獄中被拔光頭髮，並遭獄吏強暴，處決前
先被割斷喉管，而後殘酷殺害。這一冤獄被揭發後，
無數一向盲目信從共黨的黨員都受到極大的震撼。
雷抒雁可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這首《種子呵
醒醒》作於其悼念張志新的《小草在歌唱》一詩之
後不久，全詩為青年代的人性覺醒而呼號。他指出，
「我們碰到的／是多麼討厭的一片土層」，「那
僵化的頭腦裡／是一片怎樣自私的夢！」然而，必
需「從沉睡中猛醒！」必需「從牢裡沖出來」。
「禁錮、封鎖、專制……已經不再時興，／世界，
要繁榮，／一切沉睡的種子，／都要覺醒！」全詩
情感真摯熱烈，反覆的叮嚀，熱慮的呼喚，是呼籲
別人覺醒的祈禱，也是自我覺醒的宣言。

當我還是一株青松的幼苗，
大地就賦予我高尚的情操！
我立志作棟樑，獻身於人類，
一枝一葉，全不畏雪劍冰刀！

不幸，我是植根在深深的峽谷，
長啊，長啊，卻怎麼也高不過峰頭的小草。
我拚命吸吮母親乾癟的乳房，
一心要把理想攀上萬重碧霄！

我實在太自不量力了：幼稚！可笑！
蒙昧使我看不見自己卑賤的細胞。
於是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迎面撲來曠世的風暴！

(九)葉文福

《傳略》

葉文福（一九四四—），湖北蒲圻縣人。他於
一九六三年畢業於蒲圻師範，當過小學教師。一九
六四年參軍，在工程兵部隊當風鑽手與爆破手，後
在營、團、師當宣傳員。一九六六年開始寫作，一
九七二年任工程兵文工團創作員。一九七八年出版
了詩集《山戀》。

一九七九年，他發表《將軍，不能這樣做》一
詩，指責一個為自己蓋樓房而下令拆掉幼兒園的高
級將領，震動一時。隨後，又發表了《祖國啊，我
要燃燒》一詩，於八一年以此獲列為「一九七九—
八〇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獲獎作品。」

一九八三年，中共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他受到抨擊。現況不詳。

《詩選》

“祖國啊，我要燃燒”

—— 痛極之思

啊，天翻地覆……
啊，山呼海嘯……
偉大的造山運動，把我埋進深深的地層，
我死了，那時我正青春年少。

我死了！年輕的軀幹在地底癱瘓，
我死了！不死的精靈卻還在拚搏呼號：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
我的理想不是蹲這黑的囚牢！”

漫長的歲月，我吞忍了多少難忍的煎熬，
但理想之光，依然在心中灼灼閃耀。
我變成了一塊煤，還在捨命吶喊：
“祖國啊，祖國啊，我要燃燒！”

地殼是多麼的厚啊，希望是何等的縹緲，
我渴望！渴望面前有一千條向陽坑道！
我要出去：投身於熔爐，化作熊熊烈火，
“祖國啊，祖國啊，我要燃燒！”

1979.4.16 於北京

（選自《1980 新詩年編》）

《作品簡說》

以被深埋於地底的煤自喻，而期盼着為理想、為祖國而燃燒自己、閃放出光與熱，這樣題材與構思的詩篇，在中國往代文學中非無其例。明代愛國政治家于謙就寫過一首《詠煤炭》，說：「…燭火燃回春浩浩，洪鐘照破夜沉沉。…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郭沫若的《爐中煤—眷念祖國的情緒》和艾青的《煤的對話》也都分別表現了類似的心意。茲分別摘引於下：

爐中煤

……………
 啊，我年輕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怎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燦到了這般模樣！

這詩作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是郭沫若早期作品中較好的一首。艾青的《煤的對話》則作於一九三七年春：

……………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
 從地壳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裡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着——
 請給我以火，請給我以火！

和這些詩比起來，葉文福的這一首可說是對這種感情與志節作了最新的表達，寫得也最細緻些。詩開頭寫他本來並沒想到會變成煤，原是「立志作棟樑」的，然而他的處境却是那麼壞，「植根在深深的峽谷」，以致「怎麼也高不過鋒頭的小草」。而更糟的是竟遇到了「天翻地覆」，終於被「埋進深深的地層」。但儘管「吞忍了多少難忍的煎熬」，而仍渴望着為祖國而燃燒。「渴望面前有一千條向陽坑道！」要出去「投身于熔爐」而「化作熊熊烈火」。全詩緊扣着在中共專制下遭受長期鎮壓的青年代的身世，熱烈的期盼着走出「黑的囚牢」，去燃點起光明。副題「痛極之思」，正充分表達了這一題旨。

中共在文革時常常宣傳說「祖國現在已經過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意思是已與前大不相同，不知有多好了。然而「翻天覆地」固然是真，而「翻天覆地」的結束都是把不知多少人「埋進深深的地層」，到處是「黑的囚牢」。所以，大陸廣大人民的願望首先是要「有一千條向陽坑道」，突破鎮壓與專政，走出「地層」與「黑牢」，才能有機會去燃燒。葉文福這詩，正典型性的說出了廣大人民的心願，所以也勢所必至的成了傳誦一時的詩篇。

(十)北島

《傳略》

北島（一九五〇—），本名趙振開，籍貫未詳



。七十年代中後期曾在北京市建築公司任開風鑽的工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與友人在北京合辦了油印民刊《今天》，出任主編。該刊副主編芒克也是詩人，當時在造紙廠當工人。編委還有北師大學生及失業知青。他們自稱沒有政治要求，只是一心追求藝術。《回答》一詩即刊於《今天》第一期。同期刊出的還有舒婷的《致橡樹》等詩。《今天》自第二期起改鉛印，為綜合性文藝刊物，由於態度較溫和，所以在民刊中壽命稍長，到一九八〇年九月停刊，共出九期。

與黃翔不同，北島後來獲得了中共的容納，《回答》一詩於七九年三月號《詩刊》獲得刊出，成為「後來出現的一系列青年代批判性詩篇」中最早的一首。繼而在八一年出版的《一九八〇年新詩年編》中也選入了他的作品。而他也在北京一家雜誌社獲得編輯職務。

北島的詩，據稱已編成詩集《陌生的海灘》與《峭壁上的窗戶》二種，是否已正式出版，尚無確訊。但他發表的詩篇，已相當受到國際的注目，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他的詩選《太陽城札記》，瑞典也出版了一本《北島與顧城詩選》。

《詩選》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鎊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已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裏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一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苦水都進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峯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擋的天空。
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976年4月

（原載《今天》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選自《大陸地下刊物彙編》第四輯）

《作品簡說》

北島的詩，被認為是大陸青年代帶有「現代」傾向的詩風的新起點，他與同屬青年代的舒婷、顧城、江河、楊煉、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亞、駱耕野、傅天琳、孫武軍等同被稱為新的「崛起的詩群」。這些人，大概都生於一九四七—一五七年間，除了一九四七年生的傅天琳外，北島要算其中比較年長的一個。

《回答》一詩是北島較早的作品，也是那「崛起的詩群」中帶頭的一首。儘管首先刊出此詩的刊物《今天》自稱該刊「沒有政治要求」，而無疑的這是一首政治性很強的詩——它充滿了強烈的抗議與對現實的憤怒。在它刊出之後，也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與共鳴。徐敬亞在其所撰《崛起的詩群》（即此名稱之由來，一九八一年撰，一九八二年底發表）那篇雄辯滔滔的四萬多字長文中指出：「我永遠不會忘記，在苦難過去後，在人們痛定思痛的中國七、八十年代之交，《回答》、《不滿》、《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這也是一切》、《紀念碑》、《土地》等，給予了一代青年多麼強烈的思想震撼與藝術震撼！我在古今中外的詩篇中找不到一首能與我們這樣『共鳴』、這樣親切的詩。」為什麼呢？「它最開始被人們感受到的特點是什麼呢？」同一篇文章中指出：「這類青年詩的最大特點是撲面而來的時代氣息——痛切中的平靜，冷峻中的坦然，時代的大悲大喜被他們轉換為獨白式的沉吟。他們以一個現代中國社會中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現，感受生活的角度與建國以來的傳統新詩迥然相異。他們的詩細節形象鮮明，整體情緒朦朧，內在節奏波動性大，類似小說中的意識流手法，節奏奇兀閃跳，類似電影中的蒙太奇，使用着一套似乎只屬於他們的語言。人們注意到，在他們的詩中，看不到五十年代郭小川《向困難進軍》中『你們應該…』和六十年代賀敬之《雷鋒之歌》中『我們如何如何…』等字樣。一個平淡而發光的字出現了，詩中

總或隱或現地走出一個『我』！」

然而，他們的「現代」傾向却絕不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翻版或模仿，針對此點，徐敬亞繼續作出了明白的申述：「研究和評價任何藝術潮流，我們都應該面對它的真正靈魂——主導思想傾向，不能僅憑藝術手法上的鳳毛麟角作輕率的歸類。的確，在藝術手法上，它們與西方現代詩歌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注意：是契合），主要藝術主張是表現『自我』，但他們的『自我』是什麼樣的『自我』呢？只要稍作一下對比，我們就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它是中國的！富有強烈的中華民族的氣息，在他們的詩裏有對於十年非人生活的控訴，有對於幾千年民族艱苦歷程的痛苦回味，有對於人性解放的追求和呼籲，有對於現代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追求，一句話，縱貫在一代新詩人作品中的主導精神是民族自強心。詩中的自我形象是要鞭笞黑暗！是要葬埋過去！是重振民族的新一代中國青年總體形象！《回答》、《也許》、《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不滿》…（按：原文還有六個詩題，茲從略）都充滿着這種精神。…他們的『自我』是『個人』對一代人的兄弟般的呼籲！是以一個民族的一代人對外在世界的產生強烈變革慾的面目出現。」因此，「從詩的表面上看，他們對我國古典詩歌和民歌採取排斥態度，但他們却無形中吸收和繼承了這一文化傳統的靈魂——我們古代文化中那種『耿直、剛烈、鄙薄功名、蔑視權貴、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獻身真理與正義、熱愛生活、珍重友誼的中國詩歌中最可寶貴的精神基調』（以上引文見《公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並吸收了民歌中的溫暖、明朗的色彩。這些都使他們的『自我』不是一個簡單的『我』！使他們的詩在人和社會的關係上，人與人的關係上、人與自然和人與自我本身的關係上根本區別於西方。」

更有甚者，即使是從藝術手法上看，也不能與所謂「現代主義」劃等號。徐敬亞繼續指出：「青



年們的詩的語言是建立在中國現行的口語基礎上。在結構上，他們的詩較好地利用了方塊字的特點，象徵手法的運用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托物言志的創造性繼承。他們的詩在節奏、韻律各方面都不超過現代漢語規範標準，怎麼能說是西方的呢？」

至於很多人把這些詩概稱之為「朦朧詩」，則更為不妥。因為「絕大多數詩的內部結構都保持着思維的明晰度，即使是顧城、北島、舒婷、江河等走得較遠的青年詩人的作品中，邏輯線索也都相當清晰。」而還應該注意到，「在北島的象徵性、顧城的意象詩中，象徵含意都富於社會振動性」；「他們的思維圖象」則仍是「理智的曲線，實感性較強」，並不是「西方現代詩歌中的隨意性想象」。他們雖然「主張感性的跳躍和意識的流動」，然而「基本是把完整的理性式構思通過一些變化表現出來，而在以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為中心的精神分析基礎上產生的某些西方現代作品則主張『文學即夢幻』，二者之間有着本質的不同。」（以上引文均見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評我國新詩的現代傾向》。全文收入壁華、楊零編《崛起的詩群——中國當代朦朧詩與詩論選集》，當代文學研究社，香港，一九八四）。

事實上，北島這首《回答》，在任何一个讀過一些台港的「現代詩」的人看來，本來就一點也不算朦朧的。明白的，他以格言似的精警的語句，宣示了對他所見到的文革以來的種種暴行與黑暗的悲憤，以及他對於那欺人的「美好理想」之信念的澈底破滅，決心要向它「挑戰」。終於則對一個全新的不同的未來（新的轉機）抱着期盼的信心。其中每字斷開的「我—不—相—信！」四字，尤其顯得分外有力，令人有力重千鈞的驚心動魄之感。較難理解的可能是最後一段的倒數第二行，它也許可以構成不同方向的解釋，但它應該是與該段的第一行相承應的。所以，這就象徵了對中國傳統優良文化的信念，並且，當再連讀下面的最後一行，就又顯示了「歷史終將作出公正的判斷」的意義。

(二)駱耕野

《傳略》

以《不滿》一詩一鳴驚人的駱耕野（一九五一—），四川重慶人。兒時隨祖母在成都唸書，稍長，就讀於內江縣白馬鎮。文革時期，作為「知青」在農村勞動。一九七一年開始學習寫詩。一九七六年，考入溫江地區藝校學習舞蹈專業。一九七九年四月開始發表詩作，五月，在《詩刊》上刊出《不滿》一詩，立刻受到廣泛矚目，並獲得好評，被列入一九八一年頒授的「1979-1980 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獲獎作品之一。

一九八〇年起，他在四川溫江文工團創作組工作。

《詩選》

不滿

“從任何一項成功，
都產生出某種東西
使更偉大的鬥爭成為必要。”

——惠特曼《大路之歌》

像鮮花憧憬着甘美的果實，
像煤核懷抱着燃燒的意願：
我心中孕育着一個“可怕”的思想，
對現狀我要大聲地喊出：

——“我不滿”！

誰說不滿就是異端？
誰說不滿就是背叛？
是湧浪，怎能容忍山洞的狹窄，
是雛鷹，豈肯安於卵壁的黑暗。

不滿激揚着對海洋的神往喲！
不滿蘇生着對藍天的渴念！

生命創造多麼痛楚而偉大喲，
請賜給母親以滿足的甘甜：
“不！還是祝福孩子儘快成長吧，”
嬰兒問世已叩響了母親不滿的心弦。

呵，誰能說不滿就是不愛？
呵，誰敢說不滿就是抱怨？

哥倫布不滿鉛印的海圖，
才發現了大洋的彼岸；
哥白尼不滿神聖的《聖經》，
才揭開了宇宙的奇觀；
刻卜勒不滿“日心說”才去發展真理、
亞里斯多德不滿柏拉圖才能“青出於藍”。

呵，誰說不滿是背棄拔類出萃的先人？
呵，誰說不滿是褻瀆德高望重的聖賢？

不滿：茹毛飲血的人猿才去尋覓火種；
不滿：胼手胝足的祖先才去摸索種田；
不滿：雄麗的趙州橋才取代了簡陋的木橋；
不滿：“精巧”的石斧才讓位於青銅的冶煉；
不滿：才產生了妙手回春的華陀，
不滿：才造就了巧奪天工的魯班。

呵，不滿正是對變革的希冀，
呵，不滿乃是那創造的發端。

我是電流，我不滿江河的浪費，
你白白流逝的，乃是我生存的乳泉；
我是高爐，我不滿地球的吝嗇，
你深深藏匿的，正是我生命的火焰；
我是庄稼，我害怕自然褻母的任性，

變幻莫測的風雨使我忐忑不安；
我是市場，我嚮往琳琅滿目的富有，
陳列單調的櫥窗叫我滿面羞慚；
我是年邁的城鎮，我的服飾多麼古舊，
請為我披上高速公路的飄帶，
請為我戴上摩天大樓的皇冠；
我是拘謹的生活，陳腐的習俗多麼惱人，
請不要過多地責難服裝和跳舞，
請不要過多地干涉青年的愛戀；
我是低產的田地，我不滿蹣跚的耕牛喲；
我是發紫的肩頭，我不滿拉船的繩絆；
我不滿步槍，不滿水車，不滿帆船，
我不滿泥濘，不滿噪音，不滿污染。
不滿像艦隊告別港灣的頭一陣笛鳴喲，
不滿像雄雞嚮往黎明的第一聲啼喚。

我是規劃，鎖在保險櫃裏多麼窒悶，
我要走下監園，我要和新興的工地團圓；
我是革新，躺在功勞簿上多麼可恥，
我要摸索新路，我要攀登記錄的峰巔；
我是政策，我不滿躊躇的“伯樂”，
為什麼不立刻啟用朝野的遺賢？！
我是創造，我不滿夜郎自大，
快為我打開與世隔絕的門門；
我抗議馬拉松會議，以時間的名義，
你隨意糟踐的，乃是我生命的內涵；
我控訴宗教式的軟禁，以真理的呼喊，
我是花，我要生長，要獻蜜，
我要求助於實踐園丁殷勤的刀剪。

呵，不滿像胎兒在母腹裏的陣陣噪動喲，
呵，不滿像母性的痛楚而偉大的分娩。

我不滿官僚主義，
輕浮地蕩盡了先烈的遺產；

我不滿文化水平，
至今還托不起四化的航船；
我不滿軟弱的法制，
英雄碑前有民主的淚浸血染；
我不滿大話和空想，
睡在海市蜃樓上描繪縹緲的明天；
我不滿抱怨和牢騷，
躲時代的堤岸上指責湧進的波瀾；……

呵，不滿就是一個絕妙的議事日程，
不滿就是一部嶄新的行動提案；
不滿已催生出偉大的戰略轉移喲！
不滿已催掛起新長征的戰鬥風帆！

噢，河床在不滿中伸直了脊樑，
石油在不滿中湧出了海面；
科學在不滿中衝破了禁區，
指標在不滿中跨上了火箭；
思想在不滿中睜開了慧眼，
真理在不滿中延伸了戰線；
貧窮在不滿中緊追着富強喲，
現狀在不滿中疾速地登攀！

啊，不滿像兩個矛盾間過渡的橋樑喲，
不滿像一粒細胞中產生的裂變；
不滿便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喲，
不滿將通向繁榮，通向幸福，通向完善！

像鮮花憧憬着甘美的果實，
像煤核懷抱着燃燒的意願；
我心中溢滿了深摯的愛喲，
對現狀我要大聲地喊出：
——“我不滿”！

（原載《詩刊》1979年5月號）

《作品簡說》

文革後大陸青年的一代，一方面以「我一不一相一信」的心態「回答」了原有的支配性思想與政治束縛，一方面則以「不滿」的呼籲要求着對現狀與體制的改革。以此，前面北島的那首《回答》與現在駱耕野的這首《不滿》，不能不正好成爲最精萃的代表性選樣。相對於北島咬牙切齒的迴聲，駱耕野的《不滿》雖然高舉着抗議的旗幟，却顯示了積極的建設性的精神。

這首《不滿》，整篇是一首雄辯滔滔的議論詩。議論詩原是很不容易寫好的，以致於歷代都有些詩論家認爲議論根本不可入詩，然而這詩無論在內容上或藝術處理上都相當完整成功。它無疑純然是一首詩，而不是一篇議論文；然而它又純然是議論的。但其議論却又完全能溶合在雄健的詩情與豐滿優美充滿跳動的活力而毫不抽象枯澀的詩句之中，這就是它藝術上最成功的地方，全詩長達九十九行而全篇氣勢緊勁爽朗，絕無拖沓或衰竭之處，一再湧現的連續不絕的排比句法，不但不使人感到單調，却造成了如層層白浪無止的撲向海灘般的壯觀感。它壯而不暴，威而不怒，充滿了希望的熱情却不會使人灼傷，洋溢着變革的豪情却結合智慧的推論。

從這詩裡，我們不但看到作者爲「不滿」之應受允許作了有力的辯護，我們也看到作者很具體的羅列了其所生存的中國大陸的許許多多缺點：從工農業的落後到市場的蕭條，從生活的陳腐到噪音與污染，從建設規劃的不能進行到人才的難於起用，從社會的閉塞到政風的拖沓，從教條迷信的頑強到官僚主義的充斥，從文化水平的低落到法制的不健全……。但作者在每一項對現實的「不滿」之後又都引向了對現實的改進，而歸結於「通向繁榮，通向幸福，通向完善。」所以它一方面固然充滿了批判的精神，但其整個氣氛，則迥然不同於《回答》的悲鬱憤激，而是昂揚而樂觀。它運用自如的達成了批判的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的良好結合。

駱耕野其他一些詩篇如《杜鵑》、《沸泉》、《葦箭》等，也都有相當高的水準。

◎來函聲明◎

本刊上期所刊游賢達君「訪台大教聯會籌備人黃武雄教授」一文，未徵詢黃教授意見，逕予刊出，特向黃教授致歉。今將黃教授來函及游賢達君之道歉及說明函，同時披露，以明事情原委。

黃武雄教授來函聲明

貴刊第二期登出“訪「台大教聯會」籌備人黃武雄”一文，完全出我意料，請貴刊以一篇幅中顯著的地位，登出如下聲明：

(一)此文並非訪問稿，係作者游賢達先生藉我與朋友聊談之便，在旁搜得我談話大要寫成訪問稿的問答形式。事前事後皆未徵得我個人同意採訪而逕投貴刊登出，迄文章登出為止，游先生亦從未言明他是貴刊採訪記者或代表貴刊來採訪。

(二)那次聊談日期是六月五日選票事件之後兩天，正值教聯會籌組一年以來所遇挫最深之時，我個人連日為內部整合奔走，心力交瘁，無意也不願對外發表談話。

(三)所載文字中，確有我在閒談時說出的話，也有我未說，或言而未盡的話，由作者加以揣摩寫成。部份文字與我一貫看法不一致。

(四)台大教聯會已於六月底正式成立且開始運作，籌備會亦已解散，此際再翻無聊舊事，並加誇大，顯然無識於大體。我個人十分為此自責。對於一年來共度困厄，却因此文登出而受傷害的同事，尤其深感愧咎。籌備會中，賀德芬、陳師孟看法雖同我偶有出入，甚至爭吵，但我一直認定他們皆「志行高潔」。耗費十個多月的心力，籌組教聯會，最大收穫之一便是結交了這樣的朋友。

(五)年近半百，時感飄零，世道多變，唯知情義兩字。

黃武雄

76.7.13

又：另文“「台大教授聯誼會」為何難產？”所提複雜曲折的籌備過程，亦有多處不符事實，文中有許多想像與多餘的延伸。

向黃武雄教授道歉

本人於海峽雜誌第二期發表有關「台大教聯會」報導與訪問文章後，黃武雄教授頗表異議並刊登聲明。今願借貴刊一角表示本人態度與解釋：

(一)黃教授聲明第一、二、三部份，本人承認確有其事，在此向黃教授鄭重道歉。

(二)此訪問稿係本人在參加談話之後兩小時內追記所得，措詞用字或未盡符黃教授之所言，然論其大要則無偏失造作。

(三)台大教聯會之成立為本人所極關切，因此決意披露所見所聞於社會大眾。若因而對備嘗艱辛始成立之聯誼會招來事端，甚至有害大體，初非本人所欣見。

(四)關於「台大教授聯誼會為何難產」一文之產生，本人除自黃教授處獲得部份訊息外，主要來源係於六月十三、十四得自包括兩位籌備會教授在內之其他關係人，各說各話，見仁見智，本屬難免，而不必由黃教授一人負全責，望讀者諸君明察。

游賢達

76.7.16